

致中国读者

这本书涉及社会主义波兰的最新历史，确切地说——涉及波兰70年代。为了理解促使我写这本书的种种原因，回忆那些在1970—1980年人民波兰所经历过的事件是必要的。1970年12月政府提高了食品价格。造船工厂的工人起来反对这一决定。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造船工厂里爆发了罢工。一部分工人走上了街头。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决定使用武装力量和警察来平息示威游行。发生了流血冲突，数十名工人被打死。这些事情我写入了题为《十二月转折》一书中，它于1984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①。罢工和示威游行确实被平息下去了，但是在华沙发生了政治“地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符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必须从自己岗位上离职，他的位置被当时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的爱德华·盖莱克所取代。著名的波兰政治家约瑟夫·西伦凯维茨也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离职，新的总理是当时担任副总理的彼得·雅罗谢维奇。

新的政权要求工人们给予谅解，并向人民提出了加速国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贷款的计划。70年代

^① 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

初期，呈现了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个人和集体消费增长的景象。波兰人曾经赞扬过这一时期。在70年代中叶出现了一些困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停滞阶段。这不可能不对由于购买大量西方工业机器设备而同西方产生联系的波兰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

建立在获取贷款，而只在很小程度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劳动组织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导致失败。在群众中已经膨胀起来的消费愿望不断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把取得的相当大部分的贷款往往用在消费上。换句话说，我们开始了靠贷款过活。我们的消费超过了我们的生产。盲目自以为是的当局，不愿意修正当时的经济政策。而按照人民的利益，理应迅速决策缩短投资战线，并限制消费。1976年6月，曾决定通过提高食品价格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其结果是，波兰几个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提高物价的公告被取消了。在全国组织了各种大会，会议谴责了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并宣布支持党的领导和爱德华·盖莱克。但是这都是遵照当局的旨意而组织起来的虚假的支持而已。事实上，无论是当时所发生的罢工，还是那些“热情洋溢的”大会都不可能还有其他任何含义，而是反映出政治危机的公开化。社会对于国家经济形势的观点，同当局领导人谈话中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来越明显地大相径庭。在上述事件的影响下，同时也根据对社会主义模式弱点以及党所犯的错误的思考的结果，我于1978年秋起草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这些意见正置于中国读者的手中。

在此书出版以来的那些岁月里，我不止一次地重读了它，并且经常从中探索到一系列我迄今依然认为是并非过时的观点。我想，当前波兰的社会主义正在改革的进程中，波兰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信仰者正在努力使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变得更加完善。在这样的时刻，我在自己著作中所提到的那些看法，对于地缘上遥远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亲近的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说，很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

米奇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

1987年9月16日于华沙

译 者 的 话

米·弗·拉科夫斯基是波兰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也是波兰当代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之一。他生于192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科夫斯基怀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对德国希特勒军队的铁蹄蹂躏波兰深感悲痛，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波兰解放初期，1945至1949年他参加了波兰人民军，成为一名军官，积极投身于捍卫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1949至1952年他调任党中央政治部门工作。1955至1982年拉科夫斯基先后担任了波兰《政治周刊》的副主编、主编，这使他成为波兰最有权威的政论家之一。1982年，在波兰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严重关头，拉科夫斯基出任政府副总理，授权处理当时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工人运动有关的事务。他运用自己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知识界中的广泛影响，为波党的复兴、为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为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做出了许多贡献。1985年秋，他在新选举的议会中担任副议长，成为波党在最高人民权力机构中同波兰联合执政的各个政治派别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同社会进行对话、协商和合作的重要代表。拉科夫斯基是波兰老共产党人，1964年迄今一直是波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发表了关于美国、联邦德国、印

度等国和有关地区重要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出版了许多著作。

《回顾与展望——波兰向何处去》(原书名为“跨入80年代的共和国”)，是他1979年写成、1981年正式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这一书中对70年代到80年代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一系列错误方针政策、种种弊端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针砭，对即将爆发的“1980年夏季危机”提出了警示，同时又怀着对波兰党的命运和波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高度责任感，为80年代波兰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初步设想，阐述了克服波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方案。拉科夫斯基在此书中所阐明的观点、意见和结论，可供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王荃卿、顾茂萱两位同志曾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目 录

前言	扬·什切潘斯基	1
作者的话		13
第一章 经济		16
我们的王牌		16
主要环节		20
讨论题		36
令人不安的综合平衡问题		52
克服困难		57
集中化的界限		64
结构		74
第二章 政权问题		81
我们的国家		81
令人深思的十年		105
宣传成就		116
反对派		127
伙伴关系		135
第三章 立场和习惯		153
教育的成果		153
知识分子队伍		158
责任问题		164

会议和委员会	169
活动方式	173
冲突如何形成	176
第四章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各种不同观点	183
结束语	206

前 言

本书成书于1978—1979年期间。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撰写这一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叙述在波兰党内、经济上和国家政权及公众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中出现的形势,并揭示那些应当克服的东西——如果要使80年代的形势变得好一些的话。那么,在1981年应当如何来看待这本书呢?如果认为,1980年7月开始的、同年8月和秋后变成尖锐政治冲突的社会抗议和批评的强大运动已经确认了作者的正确预见,那么,他可能会得到痛苦的满足。现在当然只能根据令人难忘的(1980年)下半年发生的情况来看待他提出的观点,而不能是别的方法。

但是,不能忘记,他的这一研究首先是叙述和分析70年代政权和社会状况,以及导致产生危机的活动机制的根源。作者清楚地看到了即将来临的危机,他的思考是心灵的呐喊,也是一系列良言忠告。本书的打字稿曾于1979年提请某些党政领导人参阅,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只有他的几位朋友作出了某些积极反应。我也是得到手稿者之一。也许值得给本书增加一个附录,辑录各种人对本书分析所作的反应,从党的领导人、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直到普通党员和非党政治工作者。这本书或许是探讨政权与专家之间关系问题及探讨掌权

者关于个人知识的设想形成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或许是了解政权同专业人员之间那种毫无希望的对话的一份参考材料。须知，在危机发生几个月之后，那些继续担任经济领导职务的政权代表人物仍然执信，他们懂得的东西比批评家和改革家所懂得的东西要多，而且更能经受住考验。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正是他们那种“懂得较多”，才导致经济的崩溃。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本书提出的问题上来。我想解答以下几个问题：本书在我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占有何种地位？书中可以指出哪些具有特殊信息意义的东西？它对危机前夕的政权和政治状况的判断作出了哪些有用的暗示？作者叙述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哪些基本内容可以使人们预见到即将来临的这场动荡所波及的范围和强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从书中得到何种启示，以解决被我国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浪潮推向突出地位的那些迫切问题。

—

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著作可以被放在下列作者的政治著作之列：15世纪扬·奥斯特罗卢格的著作、16世纪中叶弗雷奇·莫杰热夫斯基的著作、16世纪末叶彼得·斯卡尔加的布道演讲以及后来18世纪许多改革家的著作和19、20世纪丰富的政治文献。我对全部政治文献的情况并不深知，然而只要对随便哪一部文献史教科书或百科全书的概貌稍加浏览，就可以断言，本书所列举的问题与它们有许多类似之处。首先提出的

是政权问题：掌权者的素质，对待民族和民众事务的态度，对蕴藏在国家和人民之中的现有力量和手段的利用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发展经济等。拉科夫斯基在该书第一章中首先正是以这一角度来评价政权的。正象以往几个世纪的政论家一样，拉科夫斯基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阶级”，即同所谓属于党和国家执政集团的那些人——用古老的波兰语来说——“发生齟齬”。然而有趣的是，如同天主教政论家一样，这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把对国家和民族境况的责任首先推到政权身上，这就与那些新教派政治思想家不同，他们是把这种责任首先推到公民身上，把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寄托于公民的勇敢精神、应变能力和主动精神上面。但是，战后的短暂时期，与新教派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的波兰天主教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未能得到改变。波兰政治著作家的主要目标是完善政权，其次才是完善公民。但19世纪是个例外，那时许多著作家将提高波兰人的道德修养当作政治复兴的条件。

因此，这一著作首先是关于政权的论文，同时也是讨伐政权的檄文。当然，拉科夫斯基也明白，要使一个好的政权能够在公民们的帮助下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富裕的经济，公民们必须做到什么。但是，70年代的政权状况，政权无视社会中蕴藏着的力量和“王牌”，挑选领导干部只局限于党员，不关心党员的道德修养，领导集团作风涣散——这一切使作者着力描述掌权者们所起的作用。拉科夫斯基把“结构”，即所谓机关及其组织、活动原则和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的能力、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不断变化着的条件等，放到了次要位置。

从这个角度看，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处于“组织者的思想方法之中”的。这就是说，作者以那种头脑聪明、情况熟悉的组织者们在观察世界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相信他们能够有效地计划和调节社会进程。19世纪各个自由社会依靠了有知识和懂行的公民、企业家为自己创造了幸福，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内不得不对一切千变万化的形势作出理智的反应，以求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然后再为民族创造财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社会和西方的技术至上都十分强调计划工作者、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人员的作用，他们承担了为国家繁荣昌盛、为整个经济的顺利发展和每个公民的幸福创造条件的责任。当然，拉科夫斯基在本书中也强调了民主化的作用，即所谓使公民有主动的发言权，发挥蕴藏在人民中间的一切聪明才智，利用那些有教养者的知识。不过作者一刻也没有忘记“党的领导作用”，没有忘记中央计划者和政府所承担的义务，他们在广泛的范围内努力取代家庭中父辈对子女所应履行的义务，保证子女获得住房、受到教育、享受卫生保健和娱乐休息的条件——即还在我青年时代，我父亲必须为我安排的一切。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叙述共和国现状和使之完善的著作，是一部几个世纪以来波兰政治文献都有的相同后果的著作。以往几个世纪的著作者没有能够挽救共和国使之免遭衰亡，库伊尼查·科翁塔依出身的改革家们没能防止国家第2次、第3次被瓜分，那些反对派文人也没有能够改变军人统治的性质，没有能够改变政权状况使1939年的灾难得到减轻，就连本书中提到的请愿书、专家论证和分析也没能对改变以盖莱

克为化身的党的领导作风和以雅罗谢维奇为化身的政府的领导作风发生影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些始终都是掌权者们个人品质的缘故吗？难道执政机制的“本性”就该如此？这类著作在政治上毫无效果的现象一再重复的原因是否更深刻地存在于政权与公民、政权与专家之间的基本关系之中？存在于不同的思维方法和不同的角度观察政治外界的差别之中？也许存在于社会本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社会向掌权者们——甚至在用“极权方法”执政时——所提出的要求之中？

二

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让我们先看一下本书的内容及其信息价值。对本书的目录和作者的主要论点无须赘述，我只想提出几点评论性和解释性意见。正因为如此，我首先想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的历史层次。诚然，本书所叙述的是70年代下半期波兰社会的情况。因此，根据历史学家公认的关于现代分期的定义，这是一本真正现代的书。但是，1980年下半年发生各种变化之后，书中所描述的许多现象、过程和状况已经成为历史。虽说是历史，但历史也会重演——1956年、1970年两次“革新”命运的教训之后，人们学会了这样小心谨慎地说。本书的许多提法、观点、写作方法，甚至在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时却采用了70年代所特有的手法，这在1980年夏秋危机时刻为人们所不齿。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70年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信息。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在书中首先发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运动的心理状态起着重要

的作用。此外，本书证实了70年代党内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用敏锐的目光看到了，那种执政方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挫折；也证实了党内不乏变革和改革的建议。

本书有分析性价值，它对导致发展势头遭受挫折的那些现象和过程的原因和表现进行了分析研究。这种发展势头是以许诺实施1971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提出的纲领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社会学或经济学著作，它没有系统采用这些学科的要素。但是，它的分析细致入微，这种分析首先依据的是《政治》周刊编辑部收到的信件所提供的资料和这位活动家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直接的政治经验。他借鉴了可供对比分析的广泛国际经验。作者很少直接罗列事实，很少摘引信件的片断。他主要是对一个比较广泛的现象和规律性的东西给予概括性的叙述。从1980年下半年的事实来看，应当指出，作者的分析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在动乱的岁月中被事态的发展所证实。

本书还包含了预测性内容，这在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随处可见。警告、预言，这些都是对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描述合乎逻辑的结果。再补充一点，这些预言是用含蓄的语言说出来的，表现作者的激情和责任感。有些地方，作者似乎是带着绝望的心情来叙述的，事情是如此显而易见，如此一目了然，不必具有特殊的想象能力就能理解，然而却没有能够得到“政治阶级”的重视和理解。当然，作者并不认为危机会来得如此之快，而且会采取如此尖锐的形式，它超出了一切预见。毕竟70年代下半期提出的关于危机将要发生的其他一切预测也都没有能够预料到危机会以1980年7月开始的那种

形式出现。

最后，作为分析和预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本书还包含了有关改革建议的内容。虽然作者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政治纲领，没有明确地说出政治和经济结构需要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需要按照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去做等等，但是作者在批判分析中指明了应该用一种可取的办法来取代现在的做法——尽管这只是用对照的手法勾划出来的。也许这明明只是一种幻想，以为反对现存状况就是解决危机的办法，因为往往完全相反的做法，恰恰是正确的解决方法。然而本书是对改革的大声疾呼，呼吁在灾难来临之前快点实行改革。因为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的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不会有效果的。

三

1981年的本书读者将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假如执政当局按照作者提出的要求去做，那么是否可能避免1980年的危机呢？换句话说，读者将会把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建议同革但斯克、什切青、雅斯切别地区及上百个其他工厂的各种工会所签署的协议内容作比较。这里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解释。就善意的解释而言，拉科夫斯基在本书提出的一切建议和分析性预言就是后来这个“社会协议”的内容。要是作恶意解释，那么可以指责他对这一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书中没有预料到；也可以指责他在作出分析时没有预见到蜂拥而起的社会运动的力量，而把党视作唯一的政治力量。除了党

以外，他也看到了教会的力量，但没有以同等重视的态度对待那些在当时尚未组织起来，尔后在动乱中形成了自己组织的、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股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潜在力量。这3股力量在革但斯克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如此明显地显露出来，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他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正是入木三分，并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对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群众、党和工人阶级、政治领导和社会问题等相互关系的形成方法也作了深刻的分析。1980年夏秋季节发生的事件对这种分析的检验证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作者对政治和政权，也就是作者本能爱好的事业，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作者还有未分析到的重要社会组成因素：家庭、教育体制、地区性问题、同事关系、职业范畴及其他集体生活的形式，毕竟这些都应该是政治家塑造的社会具体内容。因为作者没有对社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反应作出分析，而只是局限于记录社会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一般表现，也许由此产生了对政治方法有效性的某种默认。一个不满的社会创造着一个政治阶级，亦即社会的不满情绪创造着轻视而又在继续执行一种不被人赞同的政策。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些政治领导集团并不是“撒旦的产物”，这些数以千计的党政官员都诞生于波兰家庭，同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公民一样在同样的学校中接受过教育，他们知道并熟悉社会不满情况，但对改变政策却无能为力。

除了分析以外，作者还指出了一个特别的事实，在政治阶级的那些代表人物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所谓人数不多的一批决策者应对这样的政策负责。常有这样

的现象，政权的高级工作人员，在危机岁月甚至是政权的最高级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他们作出了这样错误的决策”。这种现象是不能用集体思维的特殊性和集体决策的心理学观点来解释的，这种心理状态会使甚至是由很有头脑的好人组成的参议院也会变成一群“恶魔”。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应该好好分析。某个政治阶级“脱离”社会，这就是说不考虑社会的意见、要求、态度，不听警告和批评，把自己关在小圈子内，尽管大家异口同声地多次重复说这个阶级走向绝路，但却毫无能力去改变自己的政策，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

这里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某些领导人已经看过这本书，有些人还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为什么在危机之前的1979—1980年它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呢？我认为，这本书的命运同其他一些分析、预测、警告和好建议的命运一样，因为在这本书的后面根本没有一支执政集团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我的假设十分简单：政治党派、上层执政集团、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听从的是基本的政治法则：政治靠的是操纵实力。谁不掌握实力，谁就不能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政治靠实力来创造，而不是靠良好的设想、良好的建议和深刻的分析来创造。只有当政权察觉到提出建议的后面存在着或者有一股社会势力时，才会听取这些建议。想要用科学分析来创造政治的知识分子忘记了公元前4世纪的

一条古老遗训：柏拉图想要叙拉古城邦的暴君狄俄尼学会实行“科学政治”，但这位沮丧的狄俄尼决定向这位哲学家炫耀自己不靠科学照样可以搞政治，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关在牢中，然后把他当作奴隶卖给了别人，幸亏他的朋友及时把他赎了出来，他才又回到了雅典。

在掌握政权时，特别是长期实行极权方式执政，就产生了某种扭曲的心理，那些掌权的人们深信比别人高明，深信自己所代表的方向“正确无疑”。这样，任何一种与他们的想象不相吻合的分析当然被作为不正确的东西而加以贬斥，把批评当作来自政权的竞争者们毫无根据的攻击，把呼吁健康的理智当作是敌意的幕纱。这种思想并不难理解。因为政治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斗争是不会在任何虚伪、诽谤、指责和谣言面前后退的；1980年夏秋季节在充满激情的批评者中间，正象许多国家竞选运动所表明的那样，流传着多少——除了那些确有实据的以外——荒诞不经的指控。实事求是分析往往被集团利益和反对党的利益所掩盖。正因为如此，在一切上层政治集团中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把批评视作要将他们拉下台的敌对行动，或者不理睬那些背后并无一股足以将这个上层集团推翻的政治力量的批评者。难道这样的机制就不能在波兰起作用吗？起作用的，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著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一部论述极权方法执政会带来危险的政治著作，采用这种方法掌权的人们绝对相信自己正确，并认为可以不考虑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借用命令和指令就能领导社会，领导经济。本书也说明了靠“演说”不足以领导社

会。它证明了公民对国家和政权的看法不是靠鼓舞人心的号召就能形成的，这种看法是一切层次的政权机构在处理公民事务的实际表现、商店售货员和工厂内上级领导人员的表现所决定的。本书还说明了阿谀奉承对政权退化过程所产生的作用。我认为，从70年代和1980年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应向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下一道命令：“立即将已经3次对你吹捧的人开除掉，因为如果他第4次来吹捧你，你就会相信他了，那么你的末日也将来临。”

本书也是对危机时期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即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责任应由第一书记、总理及其顾问、专家来负。作者在本书中已经分析了“专家论证和决策”、“政治家和专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我想，公布70年代这两种相互关系的其他材料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时这些问题将进入经验的政治科学大门。

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著作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政治科学史上的一个事件，我认为，在此书之后很难创立政治实际的思想模式并把这种模式看成经验实际的表现。1980年已经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许多书籍、教科书、论文和观点提出了疑问。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著作告诉人们，政权的某些心理学机制和社会学机制，在这个制度下同在其他任何制度中一样起作用，执政的人们同样是一些本质虚弱的、天真无知的、学识浅薄的人物，而不是赋有神仙般素质的超人领袖。它还告诉人们，这个党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是人的集体形象，如果不受监督和批评机制的约束，甚至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有容易产生质变的危险。

五

最后，波兰人民共和国新的一届党的执政集团是否会更好地理解 1980 年事件的意义？是否会改变做法，变得理智一些呢？是否会从这个新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结论呢？我想，阅读过本书的读者，用本书的论据和分析武装起来后，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本书给读者了解党的运转机制和党的领导人的心理学提供了完美无缺的参考材料。

扬·什切潘斯基

1980年12月25日

作 者 的 话

在叙述我对即将进入 80 年代的共和国的看法时，我远没有要把 70 年代我国社会经济情况作全面介绍的意愿。这只是一个积极投身于实施 1970 年 12 月之后制定的波兰发展纲领的人匆匆落笔的思想和观察。整个著作的主线主要是围绕政权如何发挥职能的问题。首先就是关于党对保障波兰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党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

我认为，无论今天还是明天，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始终都是首要的政治目标。

我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我有意缩小了我所关心的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各个不同方面，我只是点了一下。我在这些问题上的克制态度也是由于我缺乏职权造成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正如别人常说的那样，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一家刊物的编辑，这一刊物在我国的政治地图上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这一著作提出的意见可能不仅使人们沿着我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并赞同我的观点，而且还会引起一些人指责我要修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基本真理等。这种反应也是可能的，因为多年来我国的政治性批判思想很少涉及这样一些社会经济领

域，对这些领域分析得出的结论——说得轻一点——对我们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传统上我们已经把政权的主要机构纳入这些结论之中。如果有人对这些机构写点什么，那么通常都是采用含混不清的、吞吞吐吐的语言。指名道姓具体报道的是政权的下级机构。读者应当猜想得出我们说的是谁！但是，要对乡长的工作进行无情的分析就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可是大家都明白，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决策不是由乡长一级作出的。因此，我们如果想要避免犯错误和遭受严重的挫折，那么对政权的最高级机构进行批评性分析是正当的、必要的。但是，在实践中眼睛盯着上面往往会被认为是要“啃塌”政权或者推翻政权。也有这样的事，对党政主要领导机构个别提出批评的尝试，就会受到统一的一个标准的对待，这就是“他想捅谁一刀？”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就被束之高阁。为了神圣的安宁，可以同意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批评，但这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然而问题在于，采用神圣安宁的办法就不容许对许多确实重要的、往往是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出批评性分析，而不作批评性分析则不会有进步，就会出现停滞不前和腐化堕落。

关于对即将进入80年代的共和国的意见，我想按我所看到的问题作出介绍。我希望这种对每一项正直的政治活动的基本要求不至于被看成是越轨，越出了“对某些事情简直是不能谈论的，至少是不能大声谈论的”原则。

我对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负全部责任，我认为还应补充一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在着手著书前几个月我曾同党、政、经济部门中的中央负责同志多次谈过话，听取

了他们对我所感兴趣的问题的看法。因此，也许他们能在本书中不只一处找到自己的思想。

本书第一稿是在1979年1月写成的。现在这一稿采纳了第一稿的少数读者提出的意见。

1979年9月7日于华沙

第一章 经 济

我们的王牌

1979年人民波兰庆祝自己成立35周年。鸟瞰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民波兰，同世界众多民族相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令外国人十分羡慕的国家。客观上讲，我们所拥有的王牌应该使我们感到满意，使我们始终如一地保障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并在扩大我国经济实力、丰富民族文化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方面保障我们不受干扰地前进。这种王牌颇多。仅举几例。

首先，我们周围存在着与我们友好的人民和友好的国家。70年代，我们卓有成效地发展了我们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他关系。苏联领导人以充分理解的态度对待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在十二月(事件)后所执行的政策给波兰所带来的变化。对此他们曾多次表示过，并且当波兰有需要时，他们将很乐意及时地给予援助。无须作过多解释，波苏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是由思想的一致和政治利益所决定，而且也是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和他的许多同事对波兰人的诚挚态度和同情心所决定的。这种类型的关系对我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贵的财富。

波兰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使我国在欧洲和世界上有着稳定的政治地位。我们知道，在我国边界内我们可以感到安全，可将我们的全部精力、知识和才干用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无论是在西欧地区，还是在其他各大洲，本10年内的波兰外交政策的积极性明显地增加了，这不仅是客观形势（缓和）造成的，同时也是爱·盖莱克亲自参与所造成的。在欧洲国家的许多首都，爱·盖莱克都被作为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而积极活动的政治家而受到欢迎。70年代，还为我们扩大有利的经济、文化、科学、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把“自由欧洲”（电台）这种类型的颠覆中心和因为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活动排除在外，那么今天在西方世界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和政治家希望看到我们国家笼罩着诸如纷乱和动荡的景象。总而言之，世界祝愿波兰好。任何人都会承认这是一张非同寻常的王牌。

现在让我们看看位于布格河和奥得—尼斯河之间的我们这个国家吧。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一个富有的民族。500公里长的海岸线及沿岸港口——什切青、格丁尼亚和革但斯克，给了我们通往世界的出口。数百年来，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形势。在广阔的平原上，有着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波兰人民的肥沃耕地。尽管我们没有石油和铁矿砂，然而，经过勘探证实的煤矿、铜矿和硫磺的储量及其开采和生产水平使我们在范围很小的世界原料大国俱乐部中占有位置。在70年代，我们给已有的生产能力增添了巨大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别于60年代的新内容。工业中60%的固定资产，即机器和设备，是5年之内新增加的。本10年内，建成了数百个用最现代化机械装备起来的新工厂。这是一张非同小可的王牌。但这并非一切。在70年代，现有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工业。造船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制造工业，某些农用工业部门（著名的波兰“野牛”牌联合收割机），实现了现代化的纺织工业，正在大规模扩建的冶金工业——这些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波兰的橱窗。

应当属于70年代的毋庸置疑的王牌还有：数百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不仅反映在其收入增加，而且也反映在住宅建筑速度加快以及更容易买到现代化的耐用品。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免费保健及退休制度，在社会福利方面取消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增加了对母亲和婴儿的保护——这些又是一类王牌。

再一张十分重要的王牌是在民族生活中形成了一支在人民波兰出生的并受到教育的创造者大军。为对付现代文明发展所提出的挑战，这一代人较之人民波兰的创建者一代人更加训练有素。

还有对波兰人现在和未来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最后一张王牌。尽管我们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存在着世界观，乃至政治的差异，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有着明确方向和积极目标而团结起来的社会。无论是在公众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我们通常都避免持极端态度。我们的社会具有值得受到最高赞扬的特点。它十分爱国、准备作出牺牲，是可以信赖和具有耐心的社会。

我远非想取代那些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会以完全肯定的态度去详尽而细致地分析爱·盖莱克作为一位领袖的活动，我认为，现今的波兰人在评价这一人物时亦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性。

如果从保持和加强波兰人的民族特性的角度来看待爱·盖莱克的活动，那么毫无疑问，他的活动是极为有益的。在70年代人民生活中遭受的众多挫折，甚至明显的消极现象，都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这一事实。正是在盖莱克执政时期，我们的国家同60年代相比，对外变得更加开放，给现代化敞开了大门，不惧怕同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立场、潮流和倾向作长期的对抗。

考虑到在我们的制度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应该把明显地扩大了的同官方理论并非相一致的那些观点的宽容限度，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民国家对天主教会的政策合理化，因而为在实践中确定波兰人真正的平等和团结开辟了道路。这一点也应记在他的功劳簿上。

当我们总结上述所有王牌时，我们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和感到幸福，并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后期波兰社会中出现了疲倦、冷漠、失望和道德败坏的明显征兆。埋怨一切事和人成了普遍现象。

当我们即将进入本世纪最后20年的新的10年时，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然后着手纠正我们社会经济政策中妨碍、甚至使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王牌的那些内容。

主 要 环 节

大约3年以来，我们越来越大胆而经常地说我们的经济形势不佳。然而，领导人在评价现状时，首先是公开赞扬本10年内波兰的成就，只是在此背景下才谈存在的困难，而宣传战线上的领导者们则力求在大众传播工具中使成就和困难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这种做法常常以失败告终，因为，尽管存在着密切监视使这种比例不致遭到破坏的新闻检查局，新闻报刊却处在波兰人每日每时所看到的实际情况的强大压力之下。

今天，任何人，即使他同社会的接触很有限，都不会认为，社会对其生活条件感到满意。社会为克服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而被弄得疲惫不堪。有人想出了“排队情绪”这一说法。这是真的，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绪，而谴责并呼吁克服这种情绪的人应当首先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后果又是什么？值得补充的还有，只要每个普通波兰人不得不去排队，只要为购买对其生活象水和空气一样需要的必需品而浪费时间和精力，那么我们的任何辩解都无法消除这种“排队情绪”。对在排队中所反映的观点持藐视态度是极不严肃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70年代的波兰社会正在准备进入新的10年，从长远看，是不会赞同这种状况的。不能用种种保证来安抚我们的社会，说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或者说我们必须因为我国经济的落后不断付出代价。对存在排队现象采用“理论”论证是否会产生社会的和政治的效果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

说：(1)排队确实存在，但这不是7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过这种现象。(2)现在的排队是“更高水平”的排队，因为人们排队是购买诸如自动洗衣机、高档冰箱、建筑材料、电器设备、家具等商品。对排队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表明，从根本上讲，排队是由繁荣产生的，因而我们对排队不必过分在意。这是独创性的理论，然而它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不符合事实。难道排队买肉，买奶制品如白奶酪，也算“更高水平”的吗？再则排队与排队是不相同的。管理所谓中央分配货单(它甚至包括牙膏)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在国内有不少地区的基本产品的供应，较之华沙和几个大的工人阶级集中地区要差得很多。分析一下市场供应政策，不难猜出它的主导思想。这就是中央分配者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不仅创造着大部分国民财富，而且对市场出现的供应不足不满，因而随时有可能上街闹事。从政治上看，这种做法是有理由的，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小城镇居民、退休者(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员等被当成二等公民看待呢？

排队是天天折磨我们的恶梦，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最近几年内它可以从波兰的图景中消失。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有没有可能减弱它对社会情绪产生的消极影响。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目的，首先要放弃上面提到的那种关于“更高水平”的排队这一不严肃的说法，因为它是为各级政权机构许多部门的懒散找理由，也使他们把排队看成是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现象。指望用我们贫穷的过去这种说法的一切论据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一代半人的时间。这已不算短了。没完没了地重复说，在常常是人们基本需要的产品和商品的供应上出现的严重困难是客观原因造成的，社会上大部分人把这种说法看成是我们想用来掩盖自己无能的一种烟幕。须知，并非只有我们才有过“艰难的童年”。而象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如此“发达”的排队生活。然而，我们应该明确告诉社会，排队除了带来不少的经济和道义、政治损失之外，的确是令人深感羞辱的一种现象。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当局和社会之间需要达成某种谅解。问题在于许多排队现象并非只是因为某种产品奇缺，而且还因为商业、管理机构糟糕的组织工作以及在排队行列里也有人散布“厌世主义”情绪。不过，如果说有许多紧俏商品，并且我们知道这种状况还会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就需要考虑制订一套合理（最重要！）而明智的定量分配制度。

日常生活的困难堆积如山，使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对我们的宣言失去了信任。对党和人民政权来说，恢复这种信任就成了中心问题。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种要求，或者，更糟的是，如果当我们屈从于对波兰人思想状况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就让承认人民的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和普遍赞同我们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事先就应当作好发生严重冲突的思想准备。在目前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应该对那些毫无顾忌地竞相侈谈关于全国人民牢固地有着道德政治一致的记者们收紧缰绳。

但我并不认为，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许多负责同志热衷于藐视社会上存在的实际情绪。而那

些公开宣称确实存在困难、但总的说来情况并不很坏的人们，只不过是**想掩饰自己的不安心理**。因为很难想象，那些了解我国经济实情，而且掌握了比一般波兰人更充分的情报的同志能够心安理得地置身于现实之外，并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些普通的波兰人对实际现象的评价依据的首先是(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而不是对生活的观察和人们的言谈。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今天还是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问题应该是那些对国家发展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集团注意的中心。这些领导集团首先是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议会以及政府。有人会说，这简直是废话，因为这些机构几乎不干别的任何事情。这是对的。然而，既然经济情况每况愈下，迄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那么我们显然是在犯某种错误。无论是政府作出决定，还是一再呼吁提高所有生产者的责任感，都没有缩小下列消极现象的范围，如经营效果越来越差，对待劳动漫不经心，每天都有大量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产生。行贿(已不仅是私人行贿，而且还有“国家”性质的行贿)，经济发展不协调现象的加深，产品质量不断下降(最近我们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颁布质量法来改善质量。大概在世界上我们是想出这种别出心裁办法的唯一国家)，大众消费者市场秩序紊乱不堪，假报统计数字，协作制度横遭破坏等等。(我在本书“令人不安的对比”一节中相当详尽地写到这点。)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数量及其生命力表明，至今我们未能赢得社会的大多数人来支持这种共同努力的主张，以便使波兰摆脱已经陷入的困境。在1979年和在这以后的几年中，我们如果

还能在社会存在着甚至进一步加深对我们政策的信任危机的条件下来实现巨大的、并非轻而易举的经济社会任务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困难还将进一步接踵而来。因而，全社会或者其中一部分人会以激烈的方式怀疑我们在制定国家发展方向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这样的时刻可能会到来。事件发展的结局可能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波兰再也不会发生类似1956年波兹南事件或者1970年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即使重演拉多姆事件或乌尔苏斯事件也会是一种悲剧。

面对这种情况，要摆脱目前十分不利的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看来，首先是要下决心对70年代，特别是1973年以后我们自己的活动作出自我批评。迄今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我们承认存在着困难的同时，力图使社会相信，这种困难首先是由于外部情况不利造成的。这是在官方讲话中不断重复的理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雅罗谢维奇1978年12月21日在议会发言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几年来，国家发展的条件恶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在同上一个5年无法相比拟的困难形势下解决社会经济任务。我们已不只一次地说过，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并且日益加深的衰退，出口能力受阻，因而也影响到进口，农业几年歉收（在上次议会会议上总理曾宣布过农业第5年歉收；现在又说“几年”。可能是有关人士知道，虽然在1978年农作物收获季节波兰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很糟，但是一个丰收年——拉科夫斯基注），以及在60年代能源和运输的发展严重落后，因而出现紧张（这只是一部分是事实，因为在70年代能源和运输同样未被受到重视——拉科夫斯基注），这

必然要求长期的、消耗大量资金的基本建设，今天还跟不上经济进展和人们的需要。”

我们的宣传也不辞辛劳地注视外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华沙生活报》记者写道，1979年的计划是继续实施“既定目标——要为采取适应世界局势（原料危机、燃料和能源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活动方式付出代价。”

让我们根据某些事实来看一下外部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这些灾难吧。说到衰退，众所周知，我们主要的资本主义贸易伙伴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石油价格（1979年6月）而面临的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时期已经过去。还应该想一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我们在所谓第二（支付）地区的最主要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在没有遇到重大麻烦的情况下度过了衰退时期。因而，不管怎么说，真实情况是，尽管衰退减缓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它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但事实是它们的困难并没有对7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出现的紧张和困难的程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几年来进出口交换比率总的说来对波兰是有利的。

“出口受到限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人说，西方对我国货物实行关税保护。这是真的。但是，这类货物占我国的出口额比例很小。当然偶尔可以公开诅咒保护主义壁垒，以便获得更好的条件。不过，每一个同外贸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人都知道，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上面提到的衰退而使我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波兰货物遇到任何严重的麻烦。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却是另外一种困难。我们出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波兰外贸现在投到世界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这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在每个商务处都能听到这一点。商品质量低劣也使我国外贸不利形势进一步恶化。1978年1月，耶日·奥尔舍夫斯基部长曾经说过，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与其说是行情下跌，不如说是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差。一部分商品被退回国内（1979年约占12%），另一部分压价出售。在许多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是赔本的。

有人暗示，进口受到限制是因为出口的可能性减少了，这一论据很令人怀疑。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前的出口提高100%，那么我们也可以更多地进口。但这是一种抽象的假设。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中大幅度削减进口——问题很清楚，它对早先已开工的生产能力造成了损失——是出于希望改善外贸周转中的贸易平衡。还越来越经常地从进口货单上勾掉一些新的原料或半成品，这只不过是因为缺少相应的财政资金的缘故。至于贸易平衡，有资格的人士认为，到1981年，我们应当消除目前的赤字。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肯定地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们还预计波兰对西方的债务还将进一步增长。应该顺便补充一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债务状况只为少数经济生活的领导人所知。对借贷的利用方式负有共同责任的党的积极分子和经济界的积极分子只能推测欠债的多少，满足于一星半点的消息和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这种情况实际上减弱了这两部分重要的社会成员对国家经济发展所承担的实际责任。还应该补充的是，在最近5年中国家债务现状从未成为部长会议讨论和采取决策的对象。收听“自由欧洲”电台和阅读西方报刊的波兰人，他们的情况则不同，比前者要好得多。他们可以不费任何

气力得知我国债务的现状、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交易、同大银行的谈判、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听到关于我国经济实际状况的消息等等。很清楚，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赞扬，因为它破坏着人们对新闻政策的信任，使人们怀疑我们关于准备就那怕是最棘手的问题同人民进行诚挚对话的保证是否可信。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债务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迈入 80 年代门槛之时向自己回答数十亿的贷款投放到哪些目标上（例如有多大部分的贷款用于投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再制定贷款政策的主要方针。

再就是物价问题。原料价格上涨是真的，但我们的原料和成品价格也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也许，最终是我们有所损失，但我们确实不清楚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只知道，花一美元购买某种商品就可回收不同数量的兹罗提。譬如说，花一美元购买美国电影，可得到 1,400 兹罗提。这当然是个极特殊的例子，众所周知的却是在国内用一美元通常可换回 200 兹罗提或更多一些。

外部因素问题就谈这些。如果提到我们将不只一次会回过头来再谈的内部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对波兰社会经济形势中发生的积极变化感到满意，但他们仍想得到下述问题的答案。在我们执行国家加速发展计划期间——即 1971 年和这以后的岁月——就不能预见到我们现在谈论的主要紧张和困难吗？当时不知道诸如运输等这样的经济部门是落后的吗？如果知道，那又为什么在制定经济发展方针和发展速度时不重视这一事实呢？

问题是，直到现在有人还力图使社会相信，对我们的挫折

应负责任的是外国，是我们传统的落后（运输业和农业就属这种情况）、气候、波兰人不守纪律等等。在此情况下，在本10年中我们每年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显得是最正确的，实际上在这一政策中我们的错误、失误和弱点却没有位置。须知，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却深知已经犯了错误。甚至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在走上讲台时按上面提到的死板公式发表讲话，而走下讲台时，在会场休息厅的谈话中却认为，早在1973年底就应该对国家加速发展的主张作出修改。

然而，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却充满了欣慰情绪，责成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其表现是抛出了要求“提高横杆”的口号。在这之后至少还在两年时间内，曾横加指责一个谈论应当缩短投资战线的人。1976年4月，在全国意识形态积极分子会议上，会议主席耶日·乌卡谢维奇“训斥”这些批评者说：“最近一个时期，在投资问题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说什么‘缩减投资计划’，‘要削减目前的计划’……这么说吧：没有脱离、不能背离也不能放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速度……要限制投资的叫喊声，纯属胡言乱语。这只不过是一种神话。”

同杰出的经济活动家谈话中，人们可以听到各种议论：领导中心充斥着唯意志论，不计成本，作出必然会给经济带来极其危险紧张的决定以及整个经济机制的全面混乱。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本10年的最初几年确实预见到会产生我们现在经历着的如此广泛的困难。然而应该公开承认，曾经还有过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障碍。1972年秋天，我在同雅罗谢维奇总理的交谈中，他在回答“我们是否向前跑

得太快了？”这个问题时，我听到说要我不必犯愁，“因为最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扬鞭催马，然后就让马自己奔跑”。这也确实如此。

在寻求目前所经历着的困难的原因时，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说到资本主义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立即会得出结论说，衰退不仅祸及波兰，但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处于象我国这样的困难局势之中。因此，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起着并非无关紧要的作用呢？在本10年的经济政策上从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以权威强加的决策也对加深困难产生了影响。让我们以地方工业问题为例。70年代中期，一个，也可能几个同志得出结论说，要把地方工业纳入中央工业。尽管有人反对，这一想法得到了贯彻——只有两个中心是例外：华沙和卡托维兹。没过几个月就发现市场上再也见不到“一千零一种小商品”。这样，几年来我们甚至要从象印度这样遥远的国家进口门锁、叉子等。现在我们正在开始重建地方工业。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专门全会讨论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在全会上谁也没有作出自我批评。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前面提到的决策使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的、可以计算得出的损失。例如，地方工业的组织技术基础全部被摧毁。一位大工厂的经理对我说：“主编同志，我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扼杀了并入我厂的5个企业。”不过，也有颇多的新闻评论。《青年旗帜报》的评论员写道，14中全会夸奖了(?)小工业。他的《华沙生活报》的同行也学他的口吻说，“根据党中央14中全会的指示，小工业正在取得它应有的地位”。1979年4月26日，塔德乌什·佩卡

副总理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这样几点“新发现”：“分析表明，在小工业中的劳动位置比重要工业中的劳动位置廉价得多，而投资的生产性则高出数倍。材料消耗也更为节约……”还有另外一种创新的说法：“因为主要拥有大工厂的工业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所有的生产任务。”难道必须先除尽地方工业、“扼杀”数以百计的小厂，然后才能得出这种理所当然的、平淡无奇的真理吗？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尽快制止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困难的进一步加剧并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有效地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东西，如果我们渴望使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恢复和加强对我们的政策的信任，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即着手对（1970年）12月以来的整个时期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的分析。这种分析应在自由的和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尊重有权犯错误，排除廉价的、吵吵嚷嚷的蛊惑伎俩，避免把对个别决策提出批评的人说成是整个12月之后发展计划的反对派或者把他们斥之为居心叵测的厌世者，必须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应当谨防一些人发表这样的训斥和警告：1979年2月8日的会议上，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团成员扬·什德拉克副总理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议员团的议员的讲话中作了这样的训斥和警告，他说：“如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克服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困难时——拉科夫斯基注），一切悲观失望的人们也活跃起来了。他们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常常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个人野心的程度来评价社会主义。正如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在我国发展的各个阶段，陪伴我们的总是那些想把自己的沮丧情绪变成全民族的沮丧情绪的人和惯于制造谣言

的人。他们把我们的问题放在哈哈镜中看待，想在‘现在很糟，还会更糟’的口号下腐蚀我国的社会意识，破坏干部的活动和对他们‘被置于遗忘的角落的年代进行报复。’这是要使对我们的经济政策可能提出批评的人置于任何理智的经济活动家或政治家都不会自愿把自己置于那种地位的典型例子。因而他们选择沉默或者躲在背后埋怨。”

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随着困难的加剧——往往把对本10年的情况提出十分严肃的批判性分析，那怕是窃窃私语，都会被认为是对某人或者整个决策集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越来越经常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他的后台？”（指批评者的后台——原注）。这样，批评被看作是所谓的人事关系、个人好恶的东西了。反对派在批评我们的弱点和错误时感到最为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反对派取得了对批评的垄断，而这种批评又如此不言而喻，这种情况简直荒谬绝伦。这样，我们就给反对派增添了力量和声誉，但对此我还将另行论述。

在对我国70年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求实而大胆的分析时，我们也应该求教于那些在最近几年中受到许多有权作出重要决策的经济活动家们所轻视的专家。把教授、经济学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们在政府圈子里被看成是一些对实践一无所知、但不可一世的能人，似乎只会津津乐道，聪明得象是吞吃了全部智慧果。

我国政治生活的严肃观察家在从崇高的讲坛上听取对我们所经受的困难的原因作出的估计时，必然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阻碍着对12月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和社

会政策，首先是对这种政策的实施作出自我批评性分析。我想无须对回答作出深刻的研究。问题相当简单，它在几个领域中展开，明显地使人觉得，身为政治和国家领导的同志们担心，作出这样的判断就可能鼓励波兰人对现在治理国家的这个集团的素养程度提出疑问。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这样做，以及承认失误就可能对70年代波兰取得的巨大成就打上—个问号。须知，这种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只是由于1971年通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总设想。党在12月后制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纲领无疑是正确的。纲领中所拟定的波兰远景规划也符合波兰人的愿望和雄心。然而，今天需要找到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偏离方向的？

承认错误根本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相反，它可以缓和情绪和重建信任。不过，可以肯定，不愿诚恳地公开说明错误和弱点，那么随着经济困难时期的延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对70年代波兰发展的整个方向越来越广泛的怀疑。实际上，批评的矛头所指已很明显。反对派正在把这一点强加给处在国家重要岗位上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大喊大叫地宣传，整天报道矿工、钢铁工人、农民、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取得—系列成就，也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

凭良心讲，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央第一书记，还是总理，最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越来越经常地指出了主观原因对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形势产生的影响。但是，弱点在于他们说得太笼统。我们没有取得，我们没有能够，发生了……等等……这些就是最经常重复的说法。

我在希望对12月后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作出自我批评性的

估计时，没有低估存在着需要克服的巨大的心理障碍。因为麻烦就在于，那些希望仅仅保持已取得的东西，而避免不幸的人们，较之那些深信自己不仅正处在通往更美好明天的道路上，而且深信这一目的即将达到的人们，较为容易承认失败。在这10年中的头几年，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曾怀有这种信念。1972年盖莱克使我确信，到70年代末波兰将拥有极为丰富的消费品。

为了避免有把党和政府领导人置于“挨打的孩子”的地位之嫌，应当记住，过分强调主观因素的国家加速发展纲领，不仅曾得到社会，而且也得到党、经济、行政干部的完全支持。当我们明知在经济上和社会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延误并醉心于能够迅速摆脱60年代后半期波兰所处的不十分令人鼓舞的发展阶段时，我们曾经是党政领导人的强大的心理“压力集团”。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对我们活动作出任何自我批评性的分析，最终必将会导致上层领导的人事变动。认为在当前的经济、政治形势下，从党的利益出发，这种变动是不可取的。它只能激怒社会并引起提出大量新要求的浪潮。很难同这种观点进行争辩。然而经验表明，在压力下作出变动，较之在充分承认这个人所表现出的积极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具体情况下可能已不再胜任领导职务而作出“和平”变动，党所要付出的代价通常会大得多。

不愿意对所走过的道路作出自我批评性的评价，其根源不仅在于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心理状态。对当局的主张给予异乎寻常的信赖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局几乎是一种玄妙的力量，触犯了不容触犯的东西，只会破坏它的权威。我国当局根

本不愿意承认错误，特别不愿意公开这样做。无论大事、小事，都可观察到这种倾向。例如，颁布了征收篱笆税的管理条例。这引起了人们的惊讶，有时是讥笑。决策者对这些反映不闻不问，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人得出结论说，决策者无意中做了蠢事。因而中止了这一条例的贯彻，但这是悄悄干的。这是一个小例子，但很典型，因为它反映了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似乎我为什么一定要承认犯了错误呢？举一个更为严重的例子。对于1976年6月宣布如此大幅度的食品提价方案，谁也没有开诚布公地承认是一个重大失策。让我们以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6月25日发表的电视声明为例。声明说：“在协商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值得仔细研究的具体建议”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对问题的全貌有必要重新予以分析。这需要较长时间，至少是几个月的工作。”很难指责总理没有说实话。协商（通常只是走过场）的确有过，确实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但谁都知道，（当局）让步了，因为不只是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导致了首先以罢工为形式的工人抗议。而几天之后，我们就谴责那些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及其唆使者。这暗示，我们作为当局并没有错。然而，我们并非如此！

人民波兰已存在第四个10年了，借助这种办法并不能加强当局的权威。采用这种方法就意味着，在领导人的意识中，也可能是在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地隐藏着当局不会犯错误的信条。似乎这种方法是由程序设计十分完美的电脑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带有各种弱点的人干的。这种做法我们大家都熟悉，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后发制人的施政表现。在短期内运用这一方法对执政者来说可能是舒服的，但如果希望无论

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都把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在群众的实际信赖的基础上，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这是为了加强波兰大地上的社会主义。面对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国当局应是进攻性的，这首先是指同社会进行更广泛的，——如有需要——激烈而严峻的谈判，而不要转弯抹角地绕圈子，卖弄空泛的言辞等等。

在回到我对如何摆脱几年来所经历的经济和社会的重重困难的主要论点时，我得出结论，只有在对7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作出自我批评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一个使波兰尽快摆脱目前它所处的局势创造实际可能性的纲领。我担心，没有这种分析，整个社会和党如此难能可贵的积极性，仍将只是一种愿望而已。近几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制造了如此之多的矛盾，仅仅呼吁全体波兰人要对国家及其命运有一种责任感是不足以排除这些矛盾的。

从迄今为止采取的经济措施取得的极为有限的结果看出，必须采取别的措施，首先是采取能够使经济得到实际调整的措施。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经济形势的明显突破，任何要使经济生活以外的领域得到健康发展的一切努力，也都将无济于事。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把经济问题当作注意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应该记住，经济不是孤立的，那些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工业能力，改善供应和协作，消除排队现象和其他弊端，所有的社会紧张就会自动消失的人是大大错了。在对经济领域采取措施的同时，我们应制定并贯彻一个能使我们的人民国家的结构适应已达到的生产力

水平和社会觉悟的纲领。我认为，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改革，那么经济的改善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给人们以刺激，创造开动脑筋和乐观主义的气氛，是经济改革的关键，这种改革会给人们带来热切期望的积极变化，光靠号召本身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在把全社会，首先是干部吸引到改革过程和管理过程中的变革气氛中来才会出现这种情绪。说到底，经济失败根源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产生于保守的社会政策。这种失败也是以往建立起来的结构和管理方法得不到改革而造成的。这种结构和管理方法已经过时，已不适用于我们这样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社会，也不适用于由我们——正是在这个看来是困难的1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样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经济。

讨 论 题

在研究“主要环节”的问题时，在我看来，列出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或疑难问题的单子是适宜的。我认为，这个单子可以用来作为对波兰70年代发展作出人们所期待的、认真分析的对象。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要再次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的作用仅限于提出社会和经济活动家们不只一次地——也是公开地——谈论过的那些问题。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个。

是错误的经济战略吗？

有一种观点是把我国经济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当初通过的错误经济战略。相信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应该通过关于

达到最高发展速度的主张，而应该通过关于达到最佳发展速度的主张。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把高速度发展，而不是协调发展作为目标是一个错误。还有一个问题，对优先发展门类的选择是否正确？对协调发展是否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必要比例？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吗？如果不错，那就应该首先向党的干部和经济界积极分子解释清楚，是哪些因素，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决定了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发展方向？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

70年代，波兰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资在第一部类的工业发展上。那末，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如果说不合理，这是为什么？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本10年内，如同50年代和60年代一样，属于第一代波兰工业决策者们更乐意把资金用于发展第一部类，而不是用于发展第二部类。在经济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即进一步工业化的模式是一种原料和能源消耗过大的模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经济政策容忍这种状况呢？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有关新的投资的决策是不顾或违背合理的前提下作出的。

贷款政策

虽然没有人怀疑波兰借债是可取的。但也会遇到这样一种看法，即在70年代初轻而易举地获得贷款造成了这样一种信念，认为西方将会“源源不断”地把贷款抛给我们。结果产生了一种可以依靠借贷使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与此同时，对我国的出口能力缺乏良好的必要的全面

了解。被称为自我偿还的构想几乎完全落空。内行人认为，进口设备的利用率非常低，因而迫使国家进行大量的配套性进口。没有这种进口，许多工厂就无法开工。

波兰在本10年中从资本主义伙伴那里借了巨额贷款。这些贷款有多大部分用于投资，而又有多大部分用于购买原料和半成品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购专利过分分散以及长期不能够予以完善。难道这是空口无凭的指责吗？如果不是，那就应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谁应对此负责？在本10年中波兰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许多关于联合设计经济项目投产的协议。其中哪些项目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以及我国经济为此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

对外贸易

我国外贸自成一章。我们仅举一例。有人认为1978年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货物有40%是不合算的。另一些人认为，可立即推翻这一数据，因为众所周知，在确定成品价格时有着极大的任意性。我国外贸的实际赢利性是波兰经济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受到严格限制的有关外贸的消息，为我们对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大量评论提供了场所，这种损失似乎是由于同苏联不平等的关系（其中涉及到向该国出口的船舶等）造成的。专家们认为，大家广为谈论的关于活跃出口的问题，实际上差不多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因为国民经济结构性缺陷，是一种重要障碍，它阻碍着使外贸成为一种真正能够缓解正在困扰着我国经济的矛盾和减少困难的因素。受到批评的还有：外贸的组织结构和指令性体制，后者在这一极为敏感

领域内几乎是在极顺利地发挥着自己的职能。

混乱的经济

1979年初，一位党的高级活动家遗憾地指出，我们注意到投资热情依然过度增高，尽管1976年以后不只一次地宣布愿意把投资维持在计划的水平上。谁应对此负责呢？加剧紧张的因素是不完备的财政纪律，特别是在工资方面。1976年至1978年期间，每年的工资基金都超支。在这种超计划的工资增长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落实在生产中。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国民经济实行中央计划和中央领导的体制会导致这种做法，那它到底有多大价值呢？难道在我国经济中唯一能有效地起作用的法律就是听其自然吗？

有人认为，近几年来工资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没有达到预计的比例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首先是靠扩大工业的技术装备来取得的。这已不是一种新现象。制止工资的增长，过去和现在都很难做到。这首先是因为1971年到1975年期间工资的增长曾经是同投资的增长相联系的。然而，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使工资的增长同生产的增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力机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和技术上的落后国家——至少我们这样认为（我们说，我们在世界工业化国家名单中占第10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这种状况，我们能容忍多久，即容忍我国的经济总是周而复始地处于严重紧张之中吗？

还应补充的是，1979年又提高了工资，但它仍然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根据。提高工资成了被用来达到非经济目的的

政治工具。

经营效益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在最近几年内经营效益得不到改善，那就不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任何可能性（1978年实际工资下降了3%左右）。从专家们所进行的分析中看出，近几年来在降低生产的材料消耗方面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而固定资产的利用状况比上个5年差。在投资活动中，投资战线仍然太长，资金的投入和资金的冻结依然大量存在。

1976年至1978年期间用掉的各类投资资金比计划多，而国民收入增长的计划指标却没有达到。在这同一时期，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创造的国民收入同物质生产领域的就业人数相比——原注）。1971年至1975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7.6%，1976年比前一年增长了6.9%，1977年——4.0%，而1978年——2.5%。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大低于劳动技术装备的增长。

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降低是在为之增长付出高昂代价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工业中，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付出代价的指数，按净产值计算，由1978年的1.10增加到1979年的2.15，这就是说，平均工资的迅速增长没有随之带来相应的生产效果的迅速提高。

总之，最近3年来我们的经营效益在下降。这在实际上意味着波兰正在为自己的发展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要想达到预期的增长速度和巩固经济平衡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我国经济的领导者以及许多经济活动家都知道这种种痼疾。这

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容忍经营效益恶化呢？人民和国家的切身利益要求着手采取可以扭转这种可悲形势的措施。

价格政策

知情者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合理的价格政策。在提高物价方面有着极大的任意性。中央保证说它关注着这个问题，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提高物价通常是悄悄进行的。这使社会感到，当局想愚弄它或简直是在故意装作不知其事。要补充的是，提价不仅包括食品和工业品，同时也包括诸如书籍、电影票等福利。服务业以及社会优待（如幼儿园）也成了提价的受害者。价格变动尽管不能排除，但变动的方法使人惊异。它的特点是保密、想方设法和耍弄手腕等。因为价格政策，而特别是提价，极少作为例如在报刊上公开讨论的对象，于是社会越来越相信它正在被故意遭到愚弄。物价的不断上涨已不是最近两年特有的现象。早在1974年，在给报刊、杂志编辑部的来信中，在各种会议上，公众舆论就发出了“物价跳舞”的信号。这种种信号令人厌烦，甚至遭到恶意的对待。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价格政策是一个对社会情绪有着巨大影响的领域。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做法无疑在削弱着党同群众的联系和党在波兰社会上的领导作用。

工资政策

工资政策是经济生活中更为混乱的一个领域。近几年

来，工资政策的合理原则已彻底被破坏。各种职业集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总是以劳动的贡献、所完成的工作对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受教育程度为根据的。一个20岁的工人在一个大型优先建设项目中开推土机，在强制采用突击速度（用健康的理智很难理解，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第四个10年，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已如此之高的国家里，谁还需要采用这种突击速度！）每月可以挣到1.5万左右兹罗提，而监督他劳动的工程师只能乖乖地拿到这个数目的一半，甚至更少。一个上6年制学毕业后就业的医生每月工资不到3,000兹罗提。应该提醒一下，在国营经济中半数就业人员的每月工资不足4,000兹罗提。另一极，所谓“工资烟囱”却越耸越高。

现在工资政策的特点是，日益明显地背离了社会均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正的一般原则。工资和收入上的差别，实际状况和生活机遇的差别正在扩大。许多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同那些在社会上被认为是特权阶层的地位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当然可以认为，日益加大的差别，是由于十分强调尽可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的结果。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在我国制度下这种差别的范围应该允许到什么程度？目前，它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在最近一次提高工资之前，教育工作者的平均工资在工资表中列在第10位，而卫生工作者的平均工资则列在第13位，即最末一位。难道这应该被认为是必然的，因而是正常的现象吗？

另一个令人十分痛心的问题是最低工资额。现在最低工

资为1,800兹罗提,而在1970年被称为是社会主义贫困线的收入为1,515兹罗提。须知,自那时以来,生活费用大大增加了。应该了解这样一个事实,70年代波兰穷人的数量增加了。据1976年统计,大约有100万人需要经常性的社会救济。不能把导致差别如此巨大的这种经济政策看作是符合我们宣布并相信的理想政策。

保健

我们说本10年内社会政策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对的。但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甚至惊恐的现象。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保健工作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在经互会的欧洲国家中,就每1万人所拥有的病床指数而言,我们居倒数第2位。在波兰,每1万公民平均有74张病床,与此同时,苏联有119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108张,匈牙利有81张。建设医院的计划长期完不成。为了掩盖实际情况,就玩弄一些乖戾的统计把戏。

国营保健机构感觉到资金、干部和供应上的困难。病人难以找到医生和医院。为在医院找到一张病床,有时病人要等好几个星期。收买医务工作者的现象迅速蔓延。有些医生,做一次手术就收取好几千兹罗提的报酬。对住院病人的护理也不能令人满意。为数众多的医院无法摆脱所谓“医院病”。在波兰,有的医院的卫生条件简直是最起码的卫生标准也达不到。医院拥挤不堪,病人在走廊上死去,而在许多医院里病人的拥挤状况大大超过规定的现行标准。在华沙,每个病人占有的面积为4.6平方米,但规定的标准则是6平方米。

还要补充的是，负担已经很重的卫生保健还要额外地对全部农业人口给予免费医疗。关于让农业人口享受社会保险制度的决定，从社会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合理的，可惜它不是以扩大物质基础为依据。

对药品、医疗器械和医院仪器的供应状况是单独一个问题。医疗器械及药品尽管需要量很大，但还是减少了生产。1978年，在波兰药典的2,150类药品中，就有607种药品生产短缺。从统计资料中看出，连抗生素的生产也被取消了。在波兰，死亡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无疑是同药品的限制和缺少病床相关联的。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保健领域内出现的情况是无法以任何理由来辩解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宪法第5条第8款庄严申明：“波兰人民共和国关心社会的健康状况”。我们为波兰的蓬勃发展而感到骄傲，可它却漏掉了保健事业。应当向自己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保健事业中出现了简直是灾难性的局面？党也应该向社会说明，是谁自作主张从进口原料货单中勾掉了那些生产药品所必需的原料进口？

住宅建设

本10年内我们加速了住宅建设，这是事实。我们现在已公开承认到1985年房荒也解决不了，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说法上。以每间房子所居住的人数（1970年——1.37人，1977年——1.16人）来衡量住房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善的速度实在太慢。如果说住宅的建设规模，则可举例：1976年我们为每1千居民建成了7.9套住宅，而在这同

一年内，希腊为每1千居民建成了14套住宅，捷克斯洛伐克——9.4套，匈牙利——8.9套，苏联——8.6套。

各阶级和各社会阶层在住房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不相同的。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一样，在评论住房问题时所指的是一般情况和全国普遍现象，而没有说哪些阶级和社会阶层困难最多或情况最为严重。譬如说，从全国范围讲，约有10%的住宅居住密度每1间房住2人或更多一些人。据1974年小范围内调查，20%的工人住宅和占5%的脑力劳动者住宅情况是如此。居住密度较低的住宅（1间住房住1人或更少一些）在工人住宅中只占23.7%，在脑力劳动者中比此高1倍。

1977年国营建筑部门建成的住宅比上一年减少7,500套，而非国营建筑部门则增加了1万套。在国营建筑部门中近18年来所建成的每套住宅的平均面积增长速度极为有限（1960年——47.5平方米，1977年——49.4平方米）。与此同时，非国营建筑部门所建成的住宅平均每套增加了近30平方米（1960年——86.5平方米，1977年——93平方米，在城市甚至达到98平方米）。

非国营经济建筑部门建成的住宅面积1977年为680万平方米，而国营建筑部门则建成了999万平方米。这表明，在为个体建筑部门创造了相应的条件之后，住宅状况的改善速度有可能改变现状。

等待新住房的时间为10年左右，在国家的某些地区甚至要等15年。今天，每100套住房居住着116户人家。在最近数年内，大约有100万对年轻夫妇的住房要求将不可能得到满足。在等待住房的年轻夫妇中3.1%的人居住在有倒塌危险的住

房内，有将近24%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到5平方米，还有2%住户居住在工人招待所里。一共有64%的年轻夫妇没有自己的住房。这种状况造成的消极性社会后果难道还需多作解释吗？

旧有住房的保养问题是另一个大问题。我们正在建设新的住宅区，但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每年却因老旧房子得不到维修而损失数亿，甚至可能是数十亿兹罗提。

由于最近几年来住宅建设计划连年没有完成。为了保全面子只好玩弄各种统计手腕，然而这并不会使住宅数量增加。简易建筑的幽灵又重新出现了。比如，1978年建筑部长颁布了禁止建阳台的管理条例。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新建住宅的质量一直十分糟糕，但那些按部长会议办公厅指示所建造的住宅则是例外。这些住宅甚至还建了地下车库，因为在新建设起来的大住宅区里连一个车库也没有，须知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车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没有力量来建设车库，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无论在目前状况下，还是其他场合，我们都必须向自己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建设波兰仅仅只考虑今天，还是也要想想明天和后天？

1979年的计划规定住宅建筑任务增加12%，而投资要减少100亿兹罗提。根据中央统计局公布的1979年上半年国家社会、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本年度目标将无法达到。大家也知道，解决住房问题的远景规划在规定的期间内也无法实现。这就意味着，本10年内最具有吸引力的规划之一遭到了失败。

农业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在总的发展战略中农业的意义提高了。这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但比比皆是的事实表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十五次全会(1974年)所通过的“食品纲领”远未完成。农业仍然严重缺乏机器、建材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和农具质量、零备件的质量极差,为农民、农村服务的整个领域依然十分糟糕。

必须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本建设资金、流动资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应当提高农业领导体制的效率。现在的重大问题是,农民浪费的时间很多。由于农业劳动机械化而节省下来的时间现在被浪费在收购站供应点和办事机构中了。对此已说了多年,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或很少改观。这种状况难道应该认为是正常的吗?

领导国民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不断得到加强,对农业来说——无论是公营的还是个体的——是特别危险和有害的。从经济生产、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来看,农民都不能被视为一种工具。特别是当进行了地方行政改革,建立了乡政府之后,对农民的“指挥”加强了。这种领导方法使农民失去了稳定感和自主感,导致了农村自治的垮台,而裙带关系、贿赂、不公正感等等现象日益增多。

在责怪波兰农业落后、把农业置于“挨打的孩子”的地位(老实说,我国农业状况是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同时,对近10年来所作的一系列决策,例如,关于税收政策、农业生产需要的工业品价格政策以及农产品价格政策等都应进行认真的分析。国家在有关畜牧问题上的政策也是值得作出批评

性分析的^①。大家知道，早在1974年就已有迹象表明畜牧生产是亏本的。报纸报道了一批批养猪场投入生产之类的好消息，意在表明，国民经济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善，但却改变不了事实上存在的现实状况。在牛和猪的饲养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这一形势决不是由于农民的破坏造成的。

对合理分配农业投资的政策是经济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整个农业的投资额，包括所谓对全农业的和非生产性的投资在1975至1977年期间，按现行价格计算，为2,658亿兹罗提。个体经济部分为710亿兹罗提，占总投资额的26%。值得记取的是，1977年拥有0.5公顷以上土地的个体农户有320万户，他们耕种了占耕地面积76%的土地。化肥和工业饲料分配政策引起了人们很多批评。比如1976年，国营经济单位得到的工业饲料占供应给农业的工业饲料总数的54%，它们施用的化肥，按有效成分计算，占总数的40%左右，每公顷土地所施的氮、磷、钾肥为312公斤（个体农户每公顷为142.3公斤）。近几年来，化肥的使用量在减少，这是另一个不利的现象。专家们认为，对国营农业（国营农场）的投资同其所达到的效果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个体经济的投资效率比国营农场高得多，尽管国营农场享受着特别的优惠。

农业投资额的多少是另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要实现养活全国人民的纲领，需要大大增加投资；并加以合理分配。

不少农民、农业经济学家、还有统一农民党的活动家认

^① 一道指示就剥夺了小农的工业饲料供应，结果使1百多万生产者就不再进行商品生产。对此应追究谁的责任？

为,70年代的农业政策在其总体设想上来说是正确的,而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严重缺乏整体性。这种政策变化无常,决策既混乱又随心所欲。换句话说,这一政策没有在农民中增加极为必要的稳定感。

综合平衡和比例失调

近10年来的波兰,特别是后5年,大概没有比综合平衡这个词用得更为普遍的了。对于各级经济领导者来说这个词是真正的幻影。因为它要求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所拥有的财力物力能否使现有的生产能力都开动起来,并加以充分利用。也就是说,两者是不是衔接起来了。例如,生产的电力能否保证整个工业不受干扰地进行生产,或者在全国运行的机车车皮是否足以运输由工业所生产的商品。这类问题可以提很多,但并非就此而已。问题是,几年来在拥有的资源、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由存在于国民经济之中的相互关系所确定的需要之间,在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出口和进口、债务的偿付之间的比例失调正在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挖肉补疮外,别无其他办法。我们的经济还在很多情况下按战时共产主义行事。不幸的是,我们是处在国家经济发展这样的阶段上,那种不平衡正在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有谁计算过,比如由于几年来我国港口“堵塞”,我们不得不支付大笔不可避免的停港费,我们损失了多少兹罗提和美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名声不佳的零配件。经常缺少零配件已经成了我国经济的一种规律。但人们曾经指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我们能够终止这种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不

利的局面。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缺乏零配件的情况比昨天更为严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这种论点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须知，既不需要先知者也不需要能人，就可确定需要生产出多少零配件就能使现存的机器和运输设备正常运转，并带来预期的效果。如果由于缺乏零配件而每天几千辆公共汽车和一万几千辆卡车停止运行（是在运输业存在极大困难的状况下），那为什么每天还要生产新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而明明知道其中一部分将会停驶？报纸上多次公布，目前在波兰缺少上百万个轮胎，买电瓶要等半年。任何一个老百姓看到这样的消息就会认为“这里一定有某种毛病”，因为他会得出下列结论：或是我们的汽车工业发展太快，或是生产轮胎和电瓶的工业发展太慢。

从报刊上可以证明，我国经济的综合平衡状况极差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种事例已使那些负责我国经济发展工作的人几乎不再产生任何印象。情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状况，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

尽管如此，还是必须提出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第一，假若真如情况表明的那样，我们没有能力达到平衡，那么普通人怎么可能相信计划经济是高明的，相信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甚至相信确实存在着计划经济呢？难道对所需能源的安排进行平衡确实超过了人们的能力吗？第二，怎么能允许造成使波兰经济每年损失几十亿兹罗提（也许谁能计算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数目？）的局面？第三，人们怀疑合理的目标首先是发展的动力呢，还是追求国家迅速发展的表面指标？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后一个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事情很明显，我

们在综合平衡方面的失败会使人们对计划委员会职能的权限提出问题。也许很可能这个有影响的大机关首先只是一个管理委员会(而且只是管小事的)?

自然灾害

1978—1979年的冬天给波兰经济造成的损失,据现在计算是几百亿兹罗提。1月上旬——同电视台的乐观报道相反——工业的开工率甚至不到50%。在这一时期,铁路首先是忙于运煤。1979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也无法完成。不能把这一情况首先归结于气候条件不好。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部长会议尚未对导致国家走到崩溃边缘的原因作出周详的分析,尽管有了形式上的结论。社会有充分的权利对国家现状、对我们管理人民切身大事的能力提出疑问。

当然,在简要而又粗略地介绍那些需要作出认真分析的问题的同时,笔者相信,无论经济学教授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能列出更多的问题,并加以深化。但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也会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摆脱正在经历着的困难。

如果我国的经济还将象现在这样捉襟见肘,将继续容忍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白白浪费掉;如果我们还将继续对数量上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而不看看自己的“家底”;如果难以用合理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完全可以肯定,我们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真正为全体劳动人民造福以达到对我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感到极大满意,这一路程将会更遥远,总有一天社会将会起来给党以苦头吃。

“1970年之后开始的社会经济大变革，只用5年时间来总结，那是太短了。”企图用这样的说法来掩饰我们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无能，是任何人都骗不了的。

令人不安的综合平衡问题

正如我们早已指出，我国经济紧张和困难我们已经说了3年了。因为据估计，今后两年内不能指望我国目前的形势会有明显的好转，所以可以说，这10年的一半，也就是一个5年计划的时间将在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下渡过。这就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5年的严重困难，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正在影响着70年代波兰发展的设想。因此，这已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了。这就不能用这样的理由来搪塞：现在的困难和紧张是“国家发展、一切经济活动的技术范围和技术变化的必然结果”。（1979年1月26日《人民论坛报》）

从1976年起，为了减少困难和缓和紧张，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不总是有始有终的。所谓“经济手段”的政策也是为了要达到上述目的。这一政策执行3年之后，人们有理由试问其结果如何。尽管在优先项目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1978年的投资政策^①并没有给国家经济形势带来明显的改善。相反，结果综合平衡情况比1977年还差。这一年的结局彼得·

^① 缩短投资战线，使不少机械设备队“窝”。1978年底队窝的机器设备价值达450亿兹罗提，进口的机械设备估计占318亿兹罗提，其中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械设备占250亿兹罗提。

雅罗舍维奇总理早在1978年10月30日举行的关于1979年国家社会经济计划设想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总理说，由于能源、原材料供应和运输困难，工业生产形势不佳。在用于投资性目的的生产超出了计划的情况下，市场商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没有足够的增长。某些原材料生产的计划也没有全部完成。工业生产方面的一个不利现象是经济效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建筑业中，生产增长的建设和比例关系也不能令人满意。1978年的对外贸易也不会达到计划水平。总理指出，货币收入的增长超过了计划，市场商品的投资进展不大，劳动纪律和工资纪律一直很差，种植业的增长实在太慢。

除总理列举的这些不利现象外，还可以举出其他很多例子来说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仍然是复杂的。1978年波兰欠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继续增加。（估计1979年几乎100%的外贸收入将全部用于偿付外债和利息）。由于缺乏能源和原料，数百家工厂有些天同时停产。停产的部分原因是零配件越来越缺乏。工人没有活干而照领工资，这就意味着所谓的通货膨胀出现恶性增加。消费市场的商品增长当然不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经营管理中的指令性体制进一步加强，这至少不利于生产过程的纪律调节。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制和领导机制的不正常过程又加深了。1978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一开始就没有综合平衡，这是谁都明明知道的——对联合公司和企业来说这一计划分文不值，因为生活已迫使原定的增长指标不得不进行修正。如果说1977年的计划还是“开放的”，那么到了1978年，可以说在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计划已经成

了只是计划委员会内外的良好愿望而无法加以实现。年底各工厂和公司获得了降低原先规定的增长指标的权利，于是计划完成了。好在他们无须把罪责加到别人头上。

交通运输状况并无改善。数十万、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人由于火车常常晚点而不能准时上班。1979年12月初，还在严寒到来之前，汽车运输由于缺乏零件和轮胎，路程为50至100公里的1,700条线路停驶。

我国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自然灾害（正如华沙一则笑话所说，称为战前的冬天）更加深了原有的紧张，无情地暴露了我国经济的一切弱点。仅举电力为例就知道，它是以“无后备，联网”（扬·什德拉克副总理语）工作的。

在1978年，在公营经济中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加剧了。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旷工现象增多。每天大约有120万人即占总就业人数的10%不上班。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工厂被迫停产的工人。塔德乌什·罗道尔夫部长在向波通社发表的谈话（见1978年12月28日《人民论坛报》）中指出，在工业上，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损失的劳动时间一般占上班时间的8—10%。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占工业中职工人数的45%左右）损失的劳动时间平均大约占上班时间的20—30%。试问什么样的经济能够容忍这种情况长时间存在下去呢？！

“国家的”贿赂行为又进一步加剧。采购人员大军每天在波兰到处跑，他们拜访同行工厂，察看仓库、在各外贸中心、联合公司和政府各部门的走廊里乱窜。单在农业部采购人员为了寻找零件“反复跑了”300万公里，即绕地球赤道75圈。虚报统计数字已习以为常。这种做法可能不久会导致谁也无法了

解真实情况。劳动纪律进一步涣散。克拉科夫的一位工人给《政治》周刊编辑部来信说：“我必须指出，工厂是如此缺乏纪律性和如此松松垮垮，这类现象以前从来没有过”。上班时间酗酒现象增多。1978年居民的基本物品供应情况也没有好转。1978年，由于从进口货单中划掉了药品生产所必须的原料，社会健康状况大大恶化。因为缺少药品，心脏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等就得不到康复。

在繁华的市中心地区，交通状况日益恶化。很多新的住宅区计划设计要建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商店也没有建设起来。所有这一切消极现象造成了财力、原料、人力和上班時間等等的极大浪费。乌尔西诺夫区的一位居民在给《政治》周刊编辑部的来信中写道：“……与此同时，新的居民一方面由于有了自己的‘窝’而欢欣鼓舞，但不久就因为住在乌尔西诺夫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当地缺少幼儿园和托儿所，区医疗站小得可怜，副食商店的供应比华沙其他住宅区不但供应差，而且商店也少，从华沙其他住宅区到乌尔西诺夫的交通困难而且不正常，也缺少电话。对这些困难之所以感到难以忍受，因为住在乌尔西诺夫的都是些带小孩的年轻夫妇，他们需要幼儿园、托儿所。目前的那个原准备供数千居民用的诊疗所，难以满足几万人的需要。何况居民人数还将增加到18万。所有居民基本上都在华沙其他各区上班。下班之后，从那里带着食品，搭乘极为拥挤的公共汽车回家，如果他们等车时间不长，他们就感到庆幸了。这些要上班的夫妇必须自己找地方把孩子托给私人（当然是要付钱的），不论严寒或雨天，他们都得把孩子送去，早晨7点出门，下午4点后才回家，

……真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师们在我们有计划的时代里没有想到要同时建立幼儿园、托儿所，建立更大的医务所，副食品供应更稠密的商点网。这些设施也许以后会建立起来，遗憾的事，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受罪。”

这就是1978年的情况，即使对那些有幸得到梦寐以求的住房的人来说，也不过是如此的一年。

住房建筑的质量不见改善。“一千零一样小商品”的情况没有任何改观。很多必需品、建筑材料、零配件奇缺，致使行賄诈骗，在工地和仓库行窃，私售商品等等行为日益猖獗。

上述消极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的，本文是根据报刊报道，一月（1978年）工人自治会议的发言和从我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而列举的。只是困扰我国社会的诸多严重困难和广为蔓延的不良现象远不只这些，而且1978年底的国家图景色彩暗淡，不容乐观。现在有一种严重的危险是要与这种形势共存下去，忍辱负重，甚至把它当作客观的必要。如果一旦真的只能如此，那就会全面吃紧。而如果甚至于我们都看到了所有这些现象，并有强烈愿望赶快筑起堤坝加以制止，那我们应当反问自己，我们采取的反措施会有多大成效。1978年的结果已经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79年上半年经济情况并不会有任何好转，相反，在经济的很多方面，比例失调，消极现象，道德败坏过程还会加剧。这一情况继续下去会使社会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下降，漠不关心和工作疲沓现象进一步加剧。深陷精神颓唐的社会首先考虑的是保障自身利益，这种可怕的魔影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

现实的危险。

克 服 困 难

70年代后半期的波兰社会每天都在听取种种保证，说我们遭到的经济困难将会得到克服。在这些保证的背后，也隐藏着希望给予谅解和要有耐心。有意思的是，我们当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给可以使这种困难仅仅作为记忆的东西的期限却没有提出。既然如此，一般的波兰人就不得不在无法确定的期限内使自己艰难地生活着。这对波兰人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记得早在1974年就出现了买肉难和买肉制品难的局面。1974年3月扬·什德拉克在同一些报刊的主编们会见时就谈到了向居民供应肉类方面出现的严重困难。现在已经是1979年了，也就是说，我们肉类供应紧张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

自1974年起，随着本10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紧俏物资的货单却越来越长，目前已有几百种之多。1979年1月，《政治》周刊编辑部收到新松奇省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

“本省缺乏这样的小商品：‘英卡’牌咖啡和其他牌子的咖啡、粉状汤料和调料、大麦米、珍珠米，根本没有麦片，还常常没有面粉、小粒米、各种面条、血肠、香肠、香肠、肋条肉、低档熏肉、下水、骨头、猪牛蹄筋、小圆面包、牛角形面包，根本没有小型烤制品，没有土豆、低档水果、玻璃杯、低档盘子、陶器杯，搪瓷器皿……，很难买到男的长、短衬裤、干电池、缝纫线，即使有也是次品，……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人民的向导——我们

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不是知道这一些。”这封信是由新松奇的一位铁路工人写来的。

报刊上刊登的尽是一些解释缺少各种商品原因的文章。人们阅读其中一些解释性文章，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正在达到偏执狂的顶峰。就在1979年1月25日的《华沙生活报》上登了一篇冗长的文章用来解释缺乏鞋油的原因。但仅就这种表面的解释就可看出它的偏执性。实际上，这些解释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实情往往比从崇高的讲坛上总结报告中说得更多。早在1977年鞋油的供应量与商业需要量相比短缺1,000万盒，而1978年，短缺1,200万盒。1979年农民自助合作商店的日用品供应站提出需要5,800万盒。中央劳动供销合作总社只批给了4,000万盒。考虑到库存严重不足，日用品供应社要求上半年的供货量为3,000万盒。中央劳动供销合作总社只答应提供1,450万盒。而为什么这种起码的小商品成了紧俏产品呢？原因之一是：萨维尔切的“奥帕科孟特”金属包装制盒厂缺少生产鞋油盒的包皮。该厂决定1979年生产4,000万盒，而列宁钢厂只能答应供给所需铁皮量的一半。文章的作者写道：“一连几年情况就是如此”。那怎么办呢？进口。事实上，去年第4季度已从南斯拉夫买了200万盒，而最近又同保加利亚签订了进口325万盒的合同。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会有一天必须用美元来进口这一不幸的鞋油。或许我们甚至会用出口卡托维兹钢厂生产的钢材的收入来进口这种东西？！可能有些人对这类“痛苦的遗憾”会认为是太平常了，简直不足挂齿，因为“我们毕竟在这儿生产大东西，而让别人去搞搞鞋油吧！”我要对赞同这种看法的人说几句话：正是这类事充斥着我们的日

常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35年了，千百万波兰人有权要求生活得更好一些，但他们却要为此类琐事而奔波。

70年代后半期的波兰人已习惯于排队，今天排队已成了波兰生活面貌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买一些所需要的商品，奔波于各家商店之间，已成了常事。

普通波兰人也在骂娘声中浪费了很多时间。乘公共汽车吧，车子却偏偏在这时坏了。在华沙街头，可以看到贝尔契特牌的车子停在那里，动弹不得，这已成了普通现象。现在代之以匈牙利的伊卡鲁斯牌车子。如果公众舆论能知道把那种不过关的法国公共汽车投放市内交通应该由谁来负责，那他们肯定会感到很高兴。事情很明显，公众舆论是不会了解这一情况的，因为人民政权对这类小事没有作出解释的习惯。

一般波兰人都在骂娘，因为要换一个龙头的小皮圈子也得到住房管理处跑好几趟才派人来修。几个月后，皮圈子又坏了，又得去管理处。尽管人们已习惯于每隔几年看到修缮队来检查一次，凿开墙壁，更换管子。但有时候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又要骂娘了。一般波兰人去度假，住帐篷，则总是步行到加油站去购买煤气，但是很少，而且越来越少见到有人提着满罐的煤气回来的。农民同国家依法签订了合同，但却得不到按合同规定数量的精饲料。煤的供应也是这样。买个大蒸锅、买管牙膏，也得跑遍商店。一个有2万居民的住宅区只有2个食品商店。一般人不能理解，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现在要买到感兴趣的书籍和报刊也越来越困难了。尽管波兰已经是欧洲最大的鞋子生产国之一，但要买到一双合脚的鞋子也是困难重重。要想买一张称心的桌子或一对舒适的沙发，好

让自己坐下来休息一下，也不得不光顾好几家家具店。每次同市场打交道，都会使你得出一个结论：物价飞涨已成为普通的、日常的事，对此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一般老百姓，不仅是排队、奔跑于商店之中，但同时又是个劳动者。在工厂、修理厂，在建筑公司和各种服务行业，在机关、学校里生活都很艰辛。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对付来自中央的层出不穷的、不实际的规章制度和条令上。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那些脱离生活的人搞出来的。

穷于应付那些不实际的条令还只是波兰劳动者必须克服的困难的一部分。当厂长的因为缺少原料或停电只好让有些车间被迫停产。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原料、半成品等。采购员不仅带着介绍信到处奔跑，而且还得带着现金，当然，这是国家的钱。这些情况，采购员本人和他们的上司都是一清二楚的。某省有一位采购员，去见钢厂厂长，要求将正式配给的5万吨钢材及早发货，厂长对他说：“当然，会办的，但得要5万兹罗提。”对此他无可奈何，从哪儿去弄这笔钱呢？厂长说，“这就不是我的事罗！别人自有搞到这笔钱的办法”。显然，尽管配给了一台挖土机，但要提货，还得给卖方几千兹罗提的“外快”。在70年代末期，要想办成一件事，给一瓶白兰地，甚至是法国的，还感到“寒碜”。尽管货币在贬值，但人们对钱的意义还是看得很重的。几千几万“公款”贿赂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随着工业零件和原料供应困难的加剧，这类公款贿赂已越来越普遍，此外还得加上“私款”贿赂。对合作社按期分配给住房，在医院找个床位，动个手术，对协助购买一台拖拉机或其他什么农机，对分到了煤炭、精饲料，为

孩子找一个好的幼儿园，或分到了建筑材料等，一般波兰人都得给贿赂。贿赂的办法也已翻新。广为流行的办法就是：“我给你，你给我”。

由于缺乏原料、零件、协作混乱、缺少外运产品的车皮等等，上班的人变得常常无事可做。机器停转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到了月底，来到会计室，签个字，就领取工资。

不少波兰人就是这样工作的，而按照某些思想家的观点，波兰人正在建立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当代波兰人生活的这一极不完整的叙述必然会使人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尽管日常生活充满烦恼和有克服不完的困难，但我们还能生活下去；有时候还生活得不坏，还能有办法马虎对付，甚至我们能和谐相处和感到欢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无疑，习惯成自然是起了某种作用的，更严格地讲，是甘心于这样想：必须是如此，毕竟谁也不会专门去制造这些困难！另一种解释就是，同每个人所具有的自我修养有关。既然我克服不了困难，那我就得这样来安排我的生活，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有尽可能舒适的条件。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极端却是常事），那样的思维方式就导致了集团的产生。但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个集团的成员的。所以，最常用的办法往往就是为自己尽量安排得妥贴一点。实际上，这种想法就会导致无形的结帮结派和增加特权。事情很清楚，上述现象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这要看工作场所和钱的多少。例如肉店或其他销售紧俏商品的商店主任及其店员由于接受顾客所馈赠的礼品而成了暴发户集团。最近还发生过这样的事，顾客为了得到自己喜爱的新杂志而向街头的“运动”报刊

亭主任赠送礼物。

但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恐怕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无形的帮会，这种帮会是为了要给自己安排舒适的生活而建立起来的。我至少能识别 5 类这样的帮会。

地方帮会。其基础是由几个省“合伙”，以一个最大的省为首。各省第一书记和省长建立诸如“拯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在如何对付来自华沙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指示方面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出主意，促进省与省之间剩余物资的交流和互相供应原料等等。建立这类帮会的动机是高尚的，因为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避免危机和紧张，以免发生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厂长帮会。其产生的条件同地方帮会相同。厂长有自己的雄心壮志，不想使自己的工厂停滞不前和职工内部出现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可能会使工人采取罢工形式，那时厂长的命运就成了问题）。所以不仅在地方帮会内，而且在厂长中去寻求自己的同盟者。这种相互支持的集团是共同建立起来的。他们相互间交换零件、原料，互相提供各种服务，在对付不实际的指令和“完成”计划的办法等方面相互交流经验。不少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的。“厂长帮会”的身价正在逐年提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这种帮会那将发生什么事呢？有个厂长不加思索地回答说：那我就得马上停产。

商业采购帮会。这个帮会是由社会上的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寻找所需食品或工业品时同售货员建立了各种无形的联系。这个帮会的一部分人是负责向国营市场以外的农村供应肉类和肉制品的。城市

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他们同农村联系挂钩没有任何困难。通过这种帮会得到的很大一部分物品是盗窃来的（首先是建筑材料）。

这一帮会职能的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内部情报系统很发达。任何报纸无须公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鞋子或出口转内销的连衣裙、紧俏的家具等。但人们却都知道，内部情报系统远比所有其他官方消息准确得多。

商业采购帮会充分反映了波兰人的活动能力和他们甚至在最困难情况下都能随机应变的才能。这个帮会是使很大一部分人严重道德败坏的持久性根源——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外汇帮会。西方外汇在波兰人生活中的意义日益增加，是建立这个帮会的基础。增加外汇商店的政策并向这些商店提供波兰的生产所不足的商品，进一步使这一帮会得到加强。这一政策把社会分成两类，一类是拥有西方外汇的幸运儿，另一类则把外汇商店看作是长在社会主义身上的瘤子。增加外汇商店，很显然是国家所提倡的，这一政策所具有的道义内容对那些冥思苦想地要收集例子以证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思想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

大量的手工业者，特别是木匠，他们甚至盖一个临时工棚也要求付美元，这更促进了外汇商店的发展。

最后一个情报帮会。这个帮会的实质在于，关心政治的波兰人对波兰和世界的了解，远比那些看报纸、听广播和参加“新闻晚会”的人多得多。这个帮会不是什么新事物，但近10年内它大大发展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这个情报帮会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是12月以后党的政策。众所周知，这一

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主张波兰必须不断扩大同全世界的多种联系。一向对外国表现出极大兴趣的波兰人对于这一政策是十分乐意接受的。因此他们对获得全面而又客观的情报胃口大增。因为我们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我们的许多同胞就自己去寻找情报来源——当然是西方的情报。情报帮会也包括波兰问题，特别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个帮会主要在首都和其他几个波兰城市活动。所谓“重大政治问题”，即在最高领导内发生了什么事，对此表示关心的不仅有中央一级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常常被指责是散布谣言的人），而且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和农民。1978年11月，在离华沙几百公里一个消息闭塞的乡下我在同人们几次会见中，有人问我，“盖莱克现在身体怎么样？”（这同谣传第一书记的健康状况有关）。

上述这些具有特色的帮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的、对社会有害的现象。它们的产生是被迫的，是社会进行特殊自卫的一种表现。这个社会懂得，它必须自己去对付每天产生的各种困难。这些帮会能活跃起来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哲学：你有本事，你就自救吧！上述帮会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也在于，这些帮会的积极方面使中央加强了信念；正是中央通过自卫的决策和管理对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

集中化的界限

绝大多数波兰人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足以能够为最大

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和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全国人民的创造能力创造条件的强大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采取何种办法,意见却不一致。大体说来,有两大“思想派别”。第一派(通常不包括执行机构中心)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最广泛地运用说服和鼓励的手段,真正扩大群众及其工会团体、各界团体、合作社团体、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自治,并创造社会条件,使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和充满活力的单位能够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制度原则范围内不受约束地得到发展。这一派不否认必须有中央计划,必须由中央来管理物质生产、社会政策及其他政策,但在为加强人民国家和政权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把重点放在生产单位、服务单位、地方单位以及上面提到的各个组织的自治上。这就是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赞成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即实际责任下放,以及采取迫使担任领导职务的每个公民向社会解释他们所采取的决策,不让上级当局出来庇护。70年代中期,在波兰报刊上发表的数以百计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生产力的当前水平、生产者的社会觉悟现状和存在着数万个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只有这种管理模式才有利于国家及其公民。

另一派则反对这种思想方法。它在同意(往往是形式上的)构成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各种职业机构和社会机构(如工人自治)存在的同时,认为只有在政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加强人民国家并有效地发挥其职能。当然,这一主张的支持者们补充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政权并不是因为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上帝保佑,而是因为任

何其他主张都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因为波兰人不珍爱自己的国家，热衷于把本位主义利益置于全民利益之上。这种完全自信的态度说出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的确，在战后的整个时期内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认真的实验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它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对上面提到的第一种“思想派别”的支持者们所提出的管理主张进行检验。以往一直热衷于过分集中和对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实行繁琐的控制。在战后的头几年，决定这种管理方式的是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随后是斯大林的政权思想（这种思想在1945—1948年间是有生命力的）。为了证明这一思想的正确，人们通常引用很久远的历史事例——著名的自由否决^①，富人的专横暴戾，醉心于尔虞我诈等。事实上，所有这些特点都注入了当时波兰人的民族性格之中，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象基因一样一成不变了呢？常常听到人们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民主！这是一种极为正确的愿望。但有一个问题，这种学习应该从何处入手？从何人开始？是否可以从实际上执行爱·盖莱克于1977年7月所提出的十分中肯的意见开始？当时他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相信，在我国，没有全体波兰人的理解、支持和合作，任何事情也办不成，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事业也休想建设……”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话首先应该让那些掌握国家领导权的人牢记心间。毋庸置疑，反映在长期的、日常所使用的大量禁令和指令中的管理思想是同上面所引述的讲话精神及文字相违背的。没有这些禁令和指令，高度集中的政

^① *liberum veto*，自由否决，这是波兰历史上议会活动的一条原则。正是这种自由否决，使议会难以有所作为，结果削弱了波兰国家。——译注

权不想,实际上也不可能混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大事上还是小事上都很难期望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合作”。

在听取支持如此行使权力的人们所运用的论据时,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本人就是这种掌权方法的推崇者。问题就在于这种可以应用禁令和指令来决定那怕是细小事情的权力,所具有的诱惑力是很难加以抗拒的。这不是我们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自从社会认为从它自身推举出领袖集团或领袖人物是恰当的那时起,这种权力就成了政治家和领袖们梦寐以求的对象。

许多政治家容易接受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还因为它表面上方便了管理,使执行机构所使用的许多手段得以较为顺利地贯彻。这种权力模式也不要求对采取的决策作出不断的解释,不要求执政者花费大量宝贵时间去商定准备采取的措施,也用不着同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们争吵等。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下,提倡由中央来控制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也使这种权力模式更加容易被接受。这种思想为热衷于实施绝对权力的政治家们创造了适宜的气候,造成了会出现“强有力的人物”的危险,这样的人物——也由于他周围的吹捧声——得出结论认为,他最了解什么符合国家和人民切身利益,什么不符合。这就是说,党必须经常关心我国所有的民主机构、社会团体、工会、合作社及其他组织,使它们能够履行章程规定的权利,发展自治和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因素的干预。这种官僚主义来自对自己的能力深信无疑,并认为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拥有自己对所有一切实行全面控制的执行机构。认为这种执政方法是唯一正确的那些人,通常是这

样考虑的：人民仍然不具备对自己的命运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应“搀扶着他的手”行走，才不致于使他误入歧途。这种膨胀了的集权奢望，实质上是不相信社会，不相信它有能力辨别好恶，辨别什么符合波兰利益，而什么则同这种利益相抵触。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管理上扩大中央集权的根源，不仅存在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中（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而且存在于，或首先存在于政治体制思想以及个人和所有社会集团的心理之中。

我们党的思想原则，我们为之献身的社会、经济目标，直接要求我们必须始终面向社会，为能使个人和集体的主动精神得到发挥去创造条件。这在70年代后半期变得具有特别现实的客观必要，因为在这个时期，波兰高度集中的掌权思想不容置辩地在执政方法中扎下了根。它是这样一种政权：试图“代替人民进行思考”。这一模式的代表者首先就是政府，而更严格地说，是存在着强大官僚主义因素的国家行政机器。然而，为了说明不是国家行政机构的过错，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以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各级党的机关并不反对决策集权化的做法，并不反对哪怕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也要由一个中央的指挥中心来领导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做法，尽管六大和七大都指示要发展有利于社会自主和自治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为了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中央计划及中央领导的主张同生产者和各类机关社会团体的自治之间找到最佳分割点（并非易事），经过短时间的探索之后，主张国家政权高度集中的人获得了胜利。大约从70年代中期起，这种掌权方法就非常果断地得到了贯彻。可以在人民生活中的每个领域找到它的痕

迹。地方行政改革几乎把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降到了零，它变成了省政府和乡政府的装饰性补充^①。人的合作社组织的主席被任命为副部长，因而成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成员。工人自治会议成了这样一种机构，其任务只是起赞同上面下达的经济计划的作用。不顾反对和抗议，地方工业被并入大工业。在生产领导方面出现了极大的集中化。现在，中央确定的工业指标有150多项，这比斯大林时期的指标数几乎高出2倍。在不少情况下，在大经济组织体制中实施的经济规律法则被一笔勾销。国家中央行政当局颁布了不胜枚举的管理条例，企图以此来调节数以万计的经济和社会肌体的活动方式。数十万工厂领导人被穿上了紧身衣，这种紧身衣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越缩越紧。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竟然还在呼吸。在权力执行中心执着地追求确立自己对整个十分复杂和花样繁多的社会组织实行全面控制时，甚至那些本应成为它的支柱的人也成了牺牲品。我们这里指的是省长，这些人每一步都由政府和大量政府代理机构发布的详尽指示所左右。

70年代中央执行机关十分臃肿，是中央集权的贪欲所产生的副产品。这一过程的规模（仅限于政府和中央机关）可从下表中看出（截至1978年12月31日）。

^① 有人甚至主张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应由省委第一书记担任。难道一名无党派的教授或统一农民党党员、民主党党员担任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就会使人民代表会议丧失信誉吗？

	1970	1978	增加 人数	% 1979=100
总理	1	1	—	100
副总理	7	9	2	128.6
计委副主席	6	11	5	193.3
部长——政府委员	23	32	9	139.1
各委员会主席	3	—	—3	—
各中央机关领导人	22	18	—4	81.8
副部长	80	137	57	171.2
维耶乔莱克部长	1	1	—	100
部长会议副主席	—	3	3	—
总 数	143	216	69	148.3

(本表不包括最高监察院和各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副职,对他们来说,这类变化肯定同副部长的情况相同。)

我不再举中央集权贪欲的其他例子了,因为那就得写一部巨著。不过这样做对社会毫无用处。因为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如何活动的例子在报刊上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报刊上公布的事实引起的已经不是惊讶,而是惨淡而又令人惊恐的讥笑。

仅从上面列举的做法,就使我们对它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如果这种做法使管理体制和领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变得更为有效,如果它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和人民的生产力,那么,剩下的只是创造有利于它们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的政治气氛就行了。但是,所有有关的人士都知道,情况正好相反。

中央集权制没有给70年代的波兰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

造成了许多危害。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吧。我们的社会，包括几十万领导人在内，是一个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处理来自上面的指令和禁令上的社会，而不是生产者们孜孜以求的纪律社会；在经济上，我们有的是混乱、散漫，而不是秩序；无政府现象代替了纪律、严格遵守管理条例、限度、指标等；不是劳动纪律的加强，而是令人震惊的严重缺勤；不是对政权的尊重，而是日益增多的轻视政权的现象。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是，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着社会进步。

1978年底，当波兰遭受严寒和暴风雪袭击时，这种体制遭到了失败。混乱，这是对1978年最后两天和对新一年最初几天的形势最为恰当的描述。原来，在最近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由一个中心全面指导经济和社会的体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显出它毫无作为。依照中央决策者的意志应当正常起作用的管理机制，正是因为指令和禁令都由上面规定而彻底失去其调节能力。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气候变化莫测的古怪地区，对寒潮袭击本应心中有数。但这场寒潮却使铁路和公路运输的组织工作、城市交通、卫生保健等领域暴露出难以容忍的无人过问现象。原来，与其说在实践中，不如说在理论上如此出色地起作用的、极为周详的计划和中央领导经济的体制却使能源以及许多工业部门出现了灾难性的局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几天里波兰处在全国性灾难之中。

决策的过度集中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损失，因为它大大限制了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职工集体和地方当局的主动性。既然周密的禁令和指令体制缩小了直接生产者和管理单位的活动范围，那么对加强责任感的呼吁也不可能带来任何积极

的效果。既然某个中心人物已经规定,而且很详细地规定,我应该怎么办,我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那很自然,对这种规定的抗议形式可以是机械地执行指示或者充耳不闻——这种现象已越来越经常了。目前所施行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本位主义,这看来似乎有点荒唐。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地方干部已不再相信中央人物借助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所使用的方法——能够抓好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当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

把极端的集中制引入到我们国家肌体的执政方法,近几年来受到了公开批评浪潮的冲击。这种批评不仅反映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也反映在省委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全国第2次代表会议上,安杰依·热宾斯基要求削弱集中化,并向与会者保证,可以信赖地方当局,毕竟它们同样知道什么有利于国家,什么不利于国家。安·热宾斯基说出了那些深感过度集中的后果的绝大多数地方积极分子的观点。须知,他们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成熟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在老的还是在新的省中心以及在乡里,我们都有善于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的优秀干部。对这些地方干部采用一切全靠指令和禁令的管理体制,使他们感到受到了侮辱并使他们在自己开展活动的群众面前“丢脸”。

尽管有日益增长的批评浪潮,尽管有实实在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近年来决策集中化达到的程度无益于充分利用蕴藏在人民中的全部创造力,但是集中化及其支持者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我们已使局势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一方面,众多的人,普通劳动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人

充分了解我们大家将一起活活憋死在限制着我国社会和经济机构主动性的集中化紧身衣里；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从这种紧身衣中解脱出来。这种管理模式再继续下去，就会延误摆脱目前的困难并加剧“厌世主义”。党应该毫不迟缓地采取符合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管理方法和确定集中化的界限。为此目的，不需要成立任何新的委员会、团体。只要打开柜子，把积在波兰人民共和国1971年和1972年所制定的所有有关文件上的灰尘擦去，并采纳最近两年在许多出版物上和已交给主要决策者的内部文件上所包含的新方案就足够了。最多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统计我们采用极端的管理集中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也许这样的统计将能为确立集权和分权的合理比例模式提供最为有力的论据。

我们不应把这一任务拖到明天，更不应拖到后天。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外形势，都不允许这样做。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安宁和越来越危险。我们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聪明才智，善于选择一种途径，一种手段和一种活动方式，使之既符合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也符合波兰人的思想方法。这样来对待实际当然就不会再有波兰传统的说法：“得过且过”。

要求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放宽集中制，绝不意味着要求降低中央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加强中央。但问题在于统管成千上万的繁琐小事，干预哪怕是最小的枝节问题，实际上只会削弱中央。我想，这一命题无须用更多的事例加以论证。中央，也就是政府和计委，首先应该抓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务，应该对生产者明确规定经济和社会目

标的轻重缓急，注重经济协调发展，并对制定工资和价格制度、外贸发展方针、国民收入分配原则实行监督。无论是对个体生产者，还是对企业，中央都应该提出各种有效的鼓励性体制方案。对日常完成每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任务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直接生产者和地方当局中心，这样就会在实际上减少经济部门的指令性职能。

在观察中央通过自己的决策执着地追求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时（有时它采取的简直是一种讽刺性形式，例如，部长会议主席签署一个指示，权威地指出：庄稼的收割，必须精打细收，——载1979年5月16日《人民论坛报》），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在这一问题上，把一些根本概念搞错了。谬误在于在强大的政权同集权领导体制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强大的政权，关心的是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能遵守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例如：农业和工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投资的比例关系等），并以自己的决策获得社会的尊重和承认。笔者是赞同这样的人民政权的。

结 构

70年代后半期，波兰人的不少精力消耗在分析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上。这种困难迫使我们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也使波兰欠西方的债务不断增加。

在日报和周刊以及专业性杂志上就此问题刊登了数以百计的文章。人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可以得出结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未得到详尽的分析。在如此之

多的分析中所举的事实简直令人吃惊。从中看出，我们的经济患了重病，可以把它的现状同严重的心肌梗塞相比拟。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在报刊上出现至少一篇描述这样荒诞不经事例的文章。但是，形势的奇特之处在于，这种造成数以百万计损失的荒唐事例却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生命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际工作者，经济学家和联合公司经理以及工厂的厂长、党的积极分子和评论家，都大声疾呼地要求改变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现行体制是过了时的、不能充分利用创造力的体制。实际上，这是就经济问题发表的所有文章以及党和经济活动家们之间进行谈话的主题。

1978年2月，在题为《几点补充意见》一文中，我就此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浅见，当时我说：

“每一个多少了解一点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目前这种体制缺乏整体性，有些类似跛子行路；还有一些履行职能时，正象一个关于市长的笑话中所说，这位市长为了检验车辆靠左行驶的好处，在一条马路上竟让80%的车辆靠右行驶，而让其余20%靠左行驶。我不再举例说明这种缺乏整体性事例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我们的报刊每天所提供的事例数量之多，有时令人忧虑。也不必去议论这种缺乏整体性的做法对人们的生产情绪所产生的影响。”

笔者今天赞成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即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更广泛地说，对人民国家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中不进行彻底的变革，那么整顿国民经济，使之达到平衡并把目前所经受的困难和紧张情况限制到最低的程度，可

以说希望渺茫。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未来的岁月将极为艰辛。

但是，既然这种体制——尽管它每天都在暴露出自己的无能和不适用——还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对批评的抗拒能力，这就需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看来，至少有3个原因值得注意和深思。第一，是心理政治方面的。国家加速发展这一主张的倡导者们似乎担心，一旦把必须彻底改革这一体制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就会暴露出弱点和无所作为，于是就会使社会中政治上活跃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被激怒了的干部，开始对整个主张的正确性乃至对他们的领导能力产生怀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可以听到下述议论：“须知，在同样的体制下，70年代上半期我们取得了显赫的成就（甚至曾报道过“波兰的经济奇迹”），为什么正是到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敦促变革的人是正确的呢？然而大家知道，是谁在要求变革！正是那些急躁的知识分子、教授和各类感到不满意的同志们，他们不懂生活或因种种原因受到过我们的伤害。他们不承认客观困难的分量，而玩弄批评的把戏。当然，应当完善现有的管理体制，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肯定能够克服堆积在我们道路上的困难。”

多年来，我们就是不谈别的问题，而只谈每个波兰人需要加强对国家及其命运的责任感。对于这个问题，喋喋不休地重复这种咒语的文章数量正在逐日增加。我们不断呼吁要更好地、更有效地劳动，一再提醒人们技术文明的发展、需求的压力等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这些号召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生活证实，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只在很小程度上

取决于用强有力的言辞谴责那些消极的东西，赞扬那些值得尊敬的东西。在这一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觉悟水平之前，我们这一代人早就进棺材了。因此，当务之急是为建立机制而加紧工作，以便保证恢复良好而有效的劳动条件。

第二，使党和政府领导人实际上不去认真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管理和领导有关的全部问题的原因，基本上或多或少地在于存在一种明显的担心：今天只“搬动家具”已经不够了，而是要采取重大步骤使现有政权结构适应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适应我国社会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也在要求事实上参与共同管理的那种雄心壮志。我们受到这种情况的压力，往往喜欢采用所谓“踢皮球”的拖延战术，或者在“得过且过”中得到自我安慰。

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态度的荒唐性在于，不是别人，正是党自己曾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革命变革的原动力，这种革命变革却造成了使目前正在运转的执政方法和领导方法（政权结构）变得越来越不适用。

今天只减少中央指标的数量，限制禁令和指令，恢复大经济组织，遵守协调发展原则等已经不够了。今天，必须触动我国政权结构的上层区域。举例说，必须考虑行政管理和生产者之间的正确关系，考虑党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行使领导作用的方法，考虑对国家行政部门和经济行政管理实行实际控制的制度，考虑建立能有效地防止贪大求全嗜好的机制以及在决策过程中采用专断或唯意志论方法的机制。第三，常常听到人们说，实质性的变革是需要的，然而，这不可能在紧张

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只需改善那些确实必须改善的东西，而其他一切都可推迟到形势有了好转后再说。我认识不少同志，他们确实相信应该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但他们却又在考虑，在存在着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难道可以进行这种改革吗？他们担心，即使有了最充分的准备——暂且让我们这样说——在这种形势下改革经济也仍然可能遭到失败。这种担心是不应小看的。但另一方面，经验表明，我们更不能让目前的结构继续存在下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恶性循环：病人不能动手术，而不动手术就永远不会使病人痊愈！

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首要条件是对现有政权结构进行批判性的、严肃的分析。必须从批判转入有效地改革经济体制，并把它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即原封不动地保留二次世界大战后带入波兰肌体的结构只能使困难和紧张不断加剧。按照下述公式继续执行政策：紧张——爆发——爆发的缓和——矛盾再次积聚和再次爆发，就会削弱社会主义，也不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很难令人相信，我国的发展只能这样进行。

关于正在折磨着波兰经济的困难问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形势首先是1971年通过的高速发展纲领的错误原则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就算在起步时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认为问题也不在这里，而在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行之有效的政权结构和管理体制在60年代仍能继续起作用的话，到了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年代就显得几乎完全不适用了。对物质消耗的综合平衡不能作出规定的计划方法显得平庸无能，实施投资的体制，情报系统以及起草决策和作出决

策的机制也显得软弱无力。形象地说，在同加速发展的主张以及同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觉悟现状相接触时，这种结构的表现状况就象 1951 年生产的华沙牌汽车在 1971 年装上了奔驰牌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挂 1 档，也许挂 2 档，车身底盘还勉强经受得住，但挂 3 档，挡泥板就开始掉了，挂上 4 档，整个车子就会粉身碎骨。

结构革新也必须朝着确立自行调节机制方向发展。迄今为止，真正有效的唯一调节机制是工人罢工和示威。但这要成为一种规律吗？

对 1970 年 12 月之后公布的党和政府的文件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当时就察觉到必须对政权结构、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当时人们就说必须对议会选举法进行重大修改，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禁令和指令，要改变各级领导内部结构等。使社会主义体制现代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六大所通过的纲领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但很快就表明，实现这些计划缺乏力量。也许是缺少愿望？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在本书的各章中作出回答。

但是，为伸张正义，应该补充一句，现存的结构正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带来了新的矛盾以及造成社会经济紧张，并且它已过时，这不仅仅是波兰独有的现象。

波兰社会主义所期待的结构改革，把国际条件和相互依存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问题很清楚，不能轻视这点，但也不能以此为我们的弱点，为不想进行任何重大变革去辩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

展中出现过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不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民族因素具有长期的、日益增长的价值。在决不放弃我们同苏联的意识形态一致和政治联盟的同时，我们应该使波兰的社会主义具有符合我国传统和民族特点的模式。这种发展方向不会，也不可能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目标。波兰朝这个方向发展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切身利益。对那种声称我们在实际上完善制度的可能性，很遗憾，是有限的极端看法，应当加以坚决反对。

如果我们不下决心努力工作，使现有政权结构适应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政治觉悟的现状，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自身的担心，克服思想懒惰和自满情绪，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那些指责我们持反对改革态度的人是有道理的，人们也会说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进步是说大话和空话。

第二章 政权问题

我们的国家

在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政论文作家津津乐道的议题中，波兰人对待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全局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高机关——的态度问题，占有突出的位置。人们常说，这种态度不能令人满意。人们说，普通的波兰人不象其他国家人民，特别不象西方国家的人民那样尊重自己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待国家的态度，并不是我们乐意参照的范例，尽管法国已经延续存在千百年，虽然我们爱法国，热爱法国的一切，我们却讲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我们更乐意用德国人作例子，这就是指普鲁士国家建立了特别的社会纪律，更严格地讲俾斯麦所统一起来的国家有一套特殊的社会纪律。

人们说，波兰人轻视国家，对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比他们对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更感兴趣。从他们对待国家的态度中可以看到的是过多的批评，甚至无政府主义成分。他们不尊重国家，也就是说不尊重国家机关和主持国家机关的人，而代之以谩骂、恶意讽刺，甚至讥笑^①。怎样治理这样的民族呢？

无数的文章说，人民国家是全体波兰人的共同财富。人

民国家确保一切基本人权——劳动、学习、医疗、社会活动、批评和监督，同时要求公民良好而又诚实地劳动，普遍关心秩序、讲纪律、尊重法律和民族尊严的感情。谁能反对国家的这些职能和国家向公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呢？但是，既然人们哀叹公民对国家的态度不正确，那么肯定有“某些东西不对头”。

寻找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原因时，我们总乐意大谈天生的民族缺点。政论文作家（包括本人在内）对这个问题已经写了许多文章。就我本人来说，我不再认为一味埋怨波兰人的民族缺点是一种明智的做法。1977年我发表了题为《我们波兰的问题》系列文章后，收到了一些来信。我读了这些信件之后，变得谨慎了。我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以大量篇幅谈民族缺点，把它看成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上述信件的作者们提出的观点可以这样来概括：“关于我们缺点的问题，您念的那些经我们已经听够了。如同不存在没有缺点的人一样，也不存在没有缺点的民族。假如您公开说领导人同样有这些缺点，那么您的抱怨本来是可以接受的。对此您却装聋作哑。您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您不应首先去抱怨波兰人的缺点，而应当努力建立起领导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制度，以便最大限度地限制那些或是从我们的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或是在战后时期中产生的缺点得以表现的可能。您首先应当注意使国家能时时处处妥善地处理好对公民

① 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如波兰民族也具有我们所说的德国人的特性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将会如何？也许我们的前辈们会4人一行排成队走向这个或那个被瓜分的地区。

的关系。”

坚持那种认为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特性、传统的惹事生非和极端的不守纪律等观点，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而且还散布了关于领导人的神话，即人民还没有能力理解他们良好而又高尚的意图（“上头是聪明的，下面不行”）。诸如此类的看法有助于为政权的代表人物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和每一次失策辩护，因为可以说“遇到这样的人民，能办成什么事呢”！

就波兰人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大谈波兰人的民族缺点时，我们喜欢追溯过去，十分遥远的过去。有些人甚至追溯到贵族民主时期（“一位庄园贵族同一位省长是平等的”）。另一些人回顾被瓜分时期。还有一些人除了回顾遥远的过去外，还加上了希特勒占领时期。我们都说——我也是如此——当英国人在学习如何尊重国家及其机关的时候，波兰人却在学习如何憎恨这些。对于这种评论^①的正确性很难提出异议，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评论本身是包含了某种矛盾的。既然波兰人如此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既然为了建立这样的国家而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爆发了多次民族起义，参加了一切可能参加的战争，那就应当特别珍惜它、尊重它。可是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因此需要提出一个问题：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放弃传统的说法，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

^① W·马尔凯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波兰人思想中产生的种种刻板框框、病态恐惧和疑忌心理的根源应从19世纪的历史中寻找，因为正是在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带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的选举制度、代议制机构、群众性政党、更为合理的官僚机构等结构性因素。波兰人却没有可能代表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在广阔的公众讲坛上进行建设性的活动。

也许国家——更严格地讲——国家机关，即建立起有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国家机关，对这种状况也负有自己的责任吗？因为不能设想只有公民才阻碍了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建立并维护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因为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国家。国家即政权，而政权也即是人的强烈情感。政权对公民提出要求，这告诉人们：政权自诩为是无可指责的一群人的集合体，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弱点和片面性与这个集合体是无缘的。

技术文明的发展使国家拥有的新职权越来越多。它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也不断增长，这就导致现有的机关不断扩大和新的机关的建立。因此，职员队伍扩大了，官僚主义风气也加剧了。当国家的职能机构的扩建过程没有受制于社会的有效监督，这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变为畸形国家。

至于波兰，毫无疑问，为了加强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许多肯定是好的。实际上，执行当局常常是这类措施的倡导力量，这几乎自然而然地为作出专断决策打开了通道。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在《集中化的界限》这一章中已经部分地谈到过的问题上来了。

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完全肯定的。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它能确保内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而没有不必要的紧张与摩擦，特别是没有不必要的政权与公民之间的紧张与摩擦。我国社会不能接受关于国家的这样一种设想：对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些人深信只有他们最了解什么是对人民波兰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社会本能地反对这种态度，

因为这种态度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向作出专断（如果我不用独断专横一词的话）决定的道路。并且还为国家，这就是说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凌驾于公民之上奠定基础。结果就把各自的作用弄颠倒了。照理应当对社会发挥服务职能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严厉的、至高无上的法官和凌驾一切的、无所不为的统治者。无论是最高的还是最低的国家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却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一论断可以用国家机器各级官员成千上万的例子来加以证实，这些人对待上门来办事的人表现得无比自信，甚至态度横蛮。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威望。对于如此理解的国家作用，人民是持怀疑态度的，并表现出轻视国家的代表人物，轻视规章制度等。波兰社会也是如此。70年代的波兰国家是在年复一年地更加重视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的社会之中进行活动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是，作决策不能靠武断。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制度里，主权这一概念同样也涉及到公民。公民们希望成为有主权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希望有权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包括对国家的活动。谁不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为制造社会紧张创造有利的气候，其结果是发生危险的社会冲突。

在我国制度下，国家的阶级内容也包含了国家同公民之间的关系。我国是一个人民国家，因此国家的活动应当同劳动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既然如此，那么国家作出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行为就是无法令人设想的。这不仅是国家高级官员，而且也是许多理论家和政治家津津乐道的论点。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人民与政权的利益之间产生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然而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事例说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矛盾。

为了加强国家，为了提高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在70年代曾经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决策，但是也可用许多事例来说明有不少决策并不有利于增强人民国家在社会上实实在在的、不是强制性的威望。国家的执行当局尽管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不征求（表面上却装作已经征求）有关职业团体和社会集团的意见以武断的方式作出各种决策，事先不打招呼、不吭一声。他们颁布倒退的管理条令（例如，喧嚣一时的一次性富裕税），对于那些颁布之后立即发现是错误的决定，也不予以撤销。这样一来，如上面提到的那项税收条令也未收到原来预想的财政效果。爱德华·盖莱克在这项条令颁布之后几个月在同记者的会见时曾声称：“假如我们原来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引起如此恶果，我们根本不会就此作出决议。”对，事情正是如此。假如我们能预见到！当局还采用常常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所谓“法的引申”，不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例如，为了换取农产品，当局同农民签订了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精饲料或煤炭的合同，后来“两手一摊”，就算了事）。当局宣布了平等原则，但同时又为产生“更平等的”公民打开方便之门；禁止在华沙的新世界大街通行车辆，却同时又给那些“更平等者”发放通行证；当局拒绝给X公民发放护照，但后来在Y的干预下又改变了主意。当局真有令人惊异的精力来规定社会支付各种名目的款项。它要社会相信，因为收成不好，所以必须实行食糖凭票供应，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1976年7月供应市场的食糖比1975年7月减少14%，原因是大量出口。

本来可以直接了当地向社会说明，我们有偿付外债的不小义务，而目前世界市场上食糖价格对我们十分有利，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形势。特请你们理解我们的这一决定。

诸如此类的措施激起公民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对政府的成见，总之，不利于提高人民国家的威望，并为加强国家同社会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联系增加困难。我们许多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同志不能或者不想理解：任何言行不一、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任何不协调之处、要想“捉弄”公民的任何企图，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社会性危害，而且也常常带来经济性危害。

中央一级的决策者人数实在不少，但他们遗忘了，经常而又突然改变规章制度，改变自己的电话号码，变更人们已经习惯了商店地址，是树立不了自己威信。一句话，每次变更并不都意味着进步。

“捉弄”公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76年6月当局试图提高食品价格。就这个问题我已写过文章，后面我还将提到，因为：1、这个事件至今对国家形势、公民的政治态度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都还有影响；2、这个事件好象放大镜的一个焦点，它集中了我们在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假如不是自满自夸，不是那样满以为“我们更清楚了解”什么对人民有益，什么对人民有害，本来我们是可以避免这次失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可以避免几乎全世界的报刊都来指责我们，使我们陷入窘境。为此，应当放弃采用那些会使社会舆论感到措手不及的措施，而应当把打算变更的迫切性和方针尽早公诸于众。那种认为这样做会“把一切都买空”的理由是不

能成立的。匈牙利至少在半年之前就把准备提高物价的打算通知社会，而匈牙利人也不见得就把商店挤塌。只有在社会不相信当局是开诚布公的情况下，才有“会把一切都买空”的危险。

1976年7月19—29日，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所同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就价格结构的变化问题联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就是对这一问题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补充说明。这次民意测验调查了2,991人，都是未经事先安排的波兰成年人。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深思。“在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价格变动是必须的吗？”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中，有17.6%的人认为“肯定必须！”，有32.2%的人认为“也许是必须的”，有17.9%的人认为“看来并非必须”，有12.2%的人认为“完全不必”，有9.8%的人认为“很难说”。大部分人（占被调查者的59.6%）给予肯定的回答，30.1%的人给予否定的回答。对于在国家当前形势下必须变动价格这一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人还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人们挣钱多了，价格也不得不提高，但是也不能提得太高”。“提价是必要的，但不能提得如此之高。”“世界上一切都在涨价，但在我国不应涨得太厉害。”“无论如何价格是得变，我们必须学其他国家的样子。”

另一个是关于在提高工资、退休金、养老金、补贴的同时食品提价的幅度问题，有21.8%的人认为，提价应限制在35%的幅度内，有2.3%的人认为提价应超过35%，有39.5%的人认为提价应低于35%，有12.2%的人对此问题不表态，还有24.2%的人主张不管供应如何困难也不要调价。对社会舆论的这种调查如果是在6月份以前几个月进行的话，并且从中

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类无论对我们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件就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从经济正常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调整价格都是必要的。然而问题在于掌权者们不愿采用这种办法。“毕竟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什么对社会有利！”因此，无论在部长会议的会议上还是中央全会上，对调价问题都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分析，这不是偶然的。应当补充的是，在着手进行调价工作的准备之前，有人曾试图进行这样的调查，但未能成功。

70年代中期加强国家的方针走上错误的道路，首先表现在削弱了社会对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办事机构的监督。削弱这种监督的特别重要的步骤是改变最高监察院的地位，使它在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机关。它的新特点，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是这样规定的：“部长会议主席实施对最高监察院的监督。”^①因此，最高监察院——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这一群众代表机关的工具，成了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

行政改革也是在加强国家政权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也明显地削弱了人民代表会议的监督职能。此外也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对波兰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是在未与社会协商，实际上是对社会保密的情况下筹划的。至于同干部的协商，则通常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家行政区划的方案，政治局和政府都已讨论过并批准了的。现在请你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吧！”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行事呢？答案很简单：公开讨论会引起不健康的情绪激动和激发本位主义等。因此，在这个

^① 根据 1957 年颁布的波兰宪法，最高监察院只对议会负责，不隶属于政府。但 1976 年修改宪法后，最高监察院划归政府总理领导。——译注

例子中，“人民还未成熟到可以讲民主的地步”的论调又占了上风。

政府多年来对不断提出关于建立行政法庭的提案，设置障碍，是其摆脱监督的又一个表现。行政当局利用书报检查几年来一直断然不许报纸刊登阐述设立行政法庭必要性的文章。同国家发生纠纷的公民们蜂拥来到信访局，他们给编辑部，给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写信，请求帮助。他们提出的申诉往往以官僚主义的办法加以处理。他们的状子出现在那些被原告认为是违背现行法规的人的办公桌上，这样的事例也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内心对人民国家横生抱怨之情的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在“营垒”的另一侧，官员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可以对这种不断加剧的抱怨不加过问，并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世上能使人人都感到满意的人尚未出生”，但这不是负责任的政治态度。抱怨情绪滞留在人民的心灵之中，在危机的时刻就往往成为具有破坏性的推动力。在行政法庭问题上，还可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家为社会经济发展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设立这样的机构也丝毫改变不了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人说，行政法庭会惹来成千上万个案件。也许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绝不意味着我们所说的这一问题就不再存在了。如果在我国条件下建立行政法庭是一个错误的设想，那就应当寻求别的办法，使公民一旦遭到国家官员的欺凌时有地方可以申诉。^①

前面我们提到过书报检查。只要这种制度存在下去，那

^① 在1980年成立了“最高行政法院”，处理这类事件。——译注

么书报检查的领导人将会永远利用它，不让刊登他们认为在当时有损国家利益的消息和评论。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如同泡泡糖一样可伸可缩。从报刊影剧检查总署规定的条例来看，明知公众舆论不会赞同的这些决策，条例还是处处加以维护。而且，这些条例中还有许多向社会隐瞒真相的规定（这根本不涉及国家切身利益的问题），隐瞒国家最高当局及某些人的无能。涉及经济领域的书报检查规定数量特别多。可想而知，这些规定都不会出自报刊影剧检查总署的工作人员之手。

从加强和深化社会主义民主角度讲，一切实质上为确保执行机关凌驾于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之上的地位为目的的书报检查干预，都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应当批评的例子有很多，现试举其中之一。1978年秋，《政治》周刊发表了议会副议长皮奥特尔·斯泰凡斯基的一篇采访谈话。他说，议员们不想发表反对政府的意见，而只想帮助政府“矫正错误，使政府的实际做法更好地符合原来的设想”。这位副议长指出议会的作用是“作为深刻而又有独立见解的观察员”。耶日·斯泰姆勃罗维奇教授在给编辑部的来稿中反对如此理解议会的作用。他说：“无论如何，议会的作用远不只是当行政机构的监督者，只监督执行机构和管理机构。……按宪法规定，由公民选举的议会对政府而言是最高的上级政权机构。”这位教授的正确意见最终之所以能够刊登在《政治》周刊上，完全是因为经过了一番非同寻常的努力，须知，文章的发表是在编辑部收到稿件的3个月之后，书报检查员一直压着不让发稿。

在人民波兰成立第4个10年的今天，报刊影剧检查总署

所拥有的广泛权限实在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象。人类即将迈入 21 世纪,而我们还顽固地死抱住一种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制! 如果 70 年代末的今天不存在取消书报检查的政治条件,那么为了解放蕴藏在人民之中的一切创造力量,为了加强公民对政权的信任,至少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限制书报检查的活动范围。第一步应当在议会立法工作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常设分会,使它有权审阅所谓《法规汇编》,有权废止那些明显超越国家行政机构职权范围的法规。规定议会拥有对书报检查的活动实行监督(目前《法规汇编》实际上是一种秘密文件),这本身将是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措施。与此同时,也要使党中央各部放弃利用书报检查局的做法。

最近几年来,由于执行当局采取主动态度,在统计数字的报道方面已发生了令人感兴趣的变化。从 1974 年起,我们已注意到统计数字的范围缩小了,进而也看到了统计新闻也越来越糟。如果我们以 1971 年和 1978 年的《统计年鉴》为例,可以发现,《统计年鉴》中有些栏目的内容减少了一半,许多项目已从《统计年鉴》中完全消失,有些项目提供的材料也大为压缩,而另外一些数字至今还属秘密材料或绝密材料。十分突出的是在《统计年鉴》里完全去掉了事故的数据。除了去掉了某些表格和项目外,其他许多栏目提供的情况也很糟糕。令人难以捉摸的是百分数取代了具体数字,而且这种百分数完全是任意写上去的,使人无法了解事实真相。①

① 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指出,大约两年来某些方面的统计情况有了改善,《年鉴》中又恢复了某些数字(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情况,按照月工资情况说明的就业结构数据,等)。——原注

如果拿 1971 年和 1978 年的《统计月报》相对照，那么情况较之《年鉴》更为严重。1971 年的《统计月报》每期有 54 页，到 1978 年只有 36 页。在《统计月报》中再也见不到平均工资、价格指数、退休金、社会补助等情况的数字。在《金融》这一栏目内也见不到贷款、存款等数字。

上面关于《统计年鉴》和《统计月报》的对比，是普通读者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全部统计材料的一个特点。此外，还有另一种限制和压缩统计情报的情况。能够读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和刊物的人，范围已逐步缩小。因为过去盖有“供业务使用”图章的出版物，现在已被列入机密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看到。过去属于机密的材料，现在变成了绝密。知道内情的人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某些材料，只印二、三份。

采取了这样一些限制，便形成了一套保密级差。政府首脑知道的东西当然比副总理多，部长知道的也比副部长多。同时还严格实行了情报的部门性。一位杰出的部长级经济活动家说：我为了掌握全局性情况而必须首先了解某一份材料；在这之前我就得东奔西跑好一阵子。我常常靠找熟人、靠友情才能搞到。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这一题目，更严格地讲，在上述所列例子的背景下探讨国家在我国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对国家实施监督这一题目时，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人民国家中的作用。只有我们不规定一个思想框框来束缚自己，我们才能创造性地探讨这个问题。

党作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决定着人民国家——也就是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机关和机构开展活动的主要方针。这里所说的主要方针，都是由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党首先将正确贯彻议会法令和决议的责任加到在执行当局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身上。而对党员活动的监督靠党的机构来进行。这就是党在对国家的关系上开展活动的公式。

从迄今的经验看，上面提到的分工方法存在非常严重的缺点。主要缺点之一是，权限界限常常模糊不清，由党的机构作出行政决策，越俎代庖，与国家行政机关相重叠。诚然，在7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令人神往的口号：“党领导，政府管理。”但在实际上，从来没有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也未能使职权范围有明确的划分。我们说，党的领导应当作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而策略性决策应当让政府去作出。然而，这条原则并没有得到遵守。政治局依然在抓小事，而且常常如此！为了有根有据，我在此引用政治局和政府主席团的公报，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政治局和政府主席团正是在处理同样一些或者相类似的事情。我所举的例子包括1978年7月至1978年12月上半月这段时间：

政治局 7月13日

- 家庭的保护与发展；
- 经互会第三十二次年会；
- 卡扎菲访波；
- 农作物收割与收购的准备

政府主席团 7月14日

- 制订1979年计划草案的原则；
- 投资分配；
- 商业网；

- 工作；
- 运输业形势；

7月25日

- 卢布林和瓦乌布日赫两省党委的工作通报；
- 筹备收获庄稼；
- 活畜的收购和畜牧生产趋势；

8月8日

- 住房建设；
- 新学年；
- 居民冬季的土豆与蔬菜供应；

9月12日

- 完善乡的工作；
- 评价模范乡的工作；
- 土豆的生产与购销；
- 职工自留地；

- 土豆的栽培；
- 国营农场的奖金；

7月28日

- 与部长会议和各省省长一起评价上半年工作成果，收割，落实市场商品供货原则，外贸；

8月4日

- 十二中全会决议的落实日程表；
- 住房建设；
- 医院的建设；
- 农业的专业化；
- 农业的协作；
- 居民的土豆供应；
- 十年制学校；
- 节约燃料与能源；

9月18日

- 与部长会议一起评价今年7个月的工作，乡长的职责状况；

9月1日 与部长会议举行联席会议

- 产品、服务和建筑设施质量法草案(部长会议主席团参加部长们未出席);
- 农业生产形势;
- 焦炭工业和食品工业;
- 电影制片基金;
- 电台、电视台稿费条例。

10月9日

- 电力;
- 化肥;
- 评价青少年夏令活动;

10月6日

- 成立家庭事务委员会;
- 矿工的劳动保护和卫生保健;
- 少年夏令活动情况;
- 电力;
- 扎莫希奇的四百周年纪念。

10月19日 联席会议

- 三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 讨论1979年计划筹备工作;
- 成立克拉科夫市修缮社会委员会的建议;

10月24日

- 工厂的劳动保护和社会性

10月20日

- 与部长会议一起;

工作；

- 医院建设；

11月8日

- 1985年前的干部问题；
- 土豆的收购和储备量；

11月13日

- 农作物的收获与农活；
- 炼铜工业；
- 冬季交通；
- 诊疗中心。

三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人民的健康状况。

10月27日

- 1985年前的专业干部问题；
- 大学生的物质条件状况；
- 进出口的技术服务；
- 造船工业。

11月10日

- 成立波兰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
- 卡托维兹钢厂；
- 炼铜工业；
- 冬季运输；
- 诊疗中心的发展纲领；
- 土豆的追加收购；
- 技术资料的翻译。

政治局和政府之间的职权分工不明，并不是本10年的发明创造。但有一个问题应当明确，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有效地运转，也为了加强作为政治领导力量的党的领导作用，我们是否还应当带着看来已是过时的模式进入80年代？我认为不应当。应当加紧努力，以改变这种不利的形势。那么，变革应

朝何种方向前进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导致出现这种局势的原因。

产生这种局势的最根本原因是，几十年来，在我们制度中似乎一直有这样一种论点：党和政府的目标，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都是一致的。的确，在政府中的那些党员，也就是政治局中和党中央机关中的那些党员！但上述的论点只是部分正确。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与党中央的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相比，有着另一种（我们暂且这样称呼）社会身分。前者，比如是一个工业部的部长，他管理着众多的生产资料，这使他有許多实权，甚至有权支配资金。当然，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促进某项生产，落实部分干部的某种设想（这种设想不见得一定高明），在自己管辖的部门中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如此等等。换言之，机械工业部长，如果他想或者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把1台彩色电视机送到我办公室来让我“试着”。可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多也只能给我送来他的一份演说稿。但如果某人不是工业部长，而是商业服务部长，那他同样握有很大的实权，他可以“安插”人员。部长们，中央机关的头头，特别是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同党的领导人相比，更为“富有”，实际上是生产资料的监督者——如果我们不想说得更重一点的话。他们的势力还在于他们掌握着信息渠道。在现代国家里，谁能掌握信息，谁就能自然而然地超过别人。实际上，政治部门所作的决策，是以国家行政部门提供的信息为依据的。然而，这些信息的可靠性是否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即一切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遵循全局的利益并乐意谈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呢？这种设想通常

只是一种天真的设想。如果有一位部长善于弄虚作假和自吹自擂(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来“捉弄”政治部门,特别是当他感到后者会对他提出批评的时候。

赋予执行当局以大的实权,使它有权作出重大决策,这在现代国家中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国家同样如此。因此,不应当压缩政府及其代理机构目前所拥有的权力。不过应当建立起党对执行当局的实实在在的有效的监督。这种要求不应当被理解为对那些由党的领导委任而在政府中任职的同志的不信任。这里所说的只是涉及到这样一点,即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可辩驳地表明,如果我们要想取得发展而又避免反复出现危险的紧张和冲突,我们就应当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协调一致的自我监督体制。我们过去不是,将来也成不了天使,我们只是肉体凡胎的人,天生就带有缺点。为什么偏偏我们就应当完全没有激情、欲望、善与恶呢?

从理论上讲,对国家整个行政机构的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是应当通过党,首先是通过党的各级机关及党中央最高执行机关——政治局来实现。但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政治局的人员组成情况吧:在政治局的1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1978年底竟有8名在政府中任职。这8名中有5名(总理、4名副总理,有一名副总理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官方的舆论中被看成是“较差的”)在部长会议大厦办公,还有1名主管经济的计委主任。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有2名在地方工作,还有1名主要担任代议性职务(国务委员会主席),1名领导经济。因此,可以说,政治局统治了政府,或者说,由担任政府职务的同志统治了政治局。同时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格

局是不是使政治局取代政府而去处理本应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事务的原因之一呢？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政府成员的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那末我们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他们正是这样做的！这里有多少是习惯做法？有多少是为了保险起见？须知，如果有了政治局做靠山，那就可以睡安稳觉了。然而政治局这座靠山是建立在政府提供的材料上的。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循环。

大家知道，几年前曾试图加强党对中央执行当局机构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形式却是很特别的。政府各部委的党委第一书记由中央书记处及其下属机构任命的同志担任。为了“加强”这些党委第一书记的地位，他们获得了（从物质意义上说）副部长级的待遇。因此，实际上他们变成了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

上述做法造成了党及其机构，首先是党的最高机构，被社会推到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承担主要责任的地位。在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领域内的每一项细小决策，不管是好还是坏，是高明还是愚蠢，一概都记在党的帐上。在这样的格局中，实际上党的决策同行政机构的决策毫无二致，这种决策的作者即使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主义者也罢。

党的中央（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等同于执行当局即政府，已经成了一条常规，现在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做法。政府只是国家行政的最高机构，因此，平等地对待政府和政治思想的领导力量——这在常常重复出现的“党和政府”这一公式中得到体现——在今天就生产力和社会觉悟已经达到的水平而言，是一种时代性错误。继续这样的做法，将使国内政治形势复

杂化,并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在迄今的格局中,党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忙于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今天,党的省级机构已经在为处理行政事务而奔忙。有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在回答他每天有多少时间处理政治工作的提问时说:“我现在主要担任我们省的后勤主任的角色”(用损害党的工作为代价)。众所周知,党所承担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不但丝毫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还应补充的是,职权的重叠与交叉,是国家行政机构、经济机构同党的各级机构之间合作中常常出现龃龉和误会的根源。

为了明确起见,应当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乡一级的党政关系与省一级不同。在乡里,乡长权力最大,他手下有二三十名办事人员,掌管经费等。与之相对应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乡党委第一书记,他手下有1名人民代表会议事务指导员。而这名指导员属于乡政府编制。实际情况是,乡党委第一书记不得不同乡长“和睦相处”。

如果我们认为必须保持现行的国家结构,那就应当考虑从直接管理的结构中“抽掉”党的机关。党的机关,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乡党委,都应转到对执行当局的监督地位去。要转向这样一种地位,就要求中央一级:1. 使政府只是由一批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员组成,他们不担任(除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这些人应当留在政治局内)任何党内职务(我不把担任中央委员看成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地位属性);2. 政治局委员们应当在中央委员会大厦办公,同时对政府履行监督权(看来已是提出:“政治局委员回到政治局去!”这一口号的时候了);3. 作出战略决策和对行政机关实行监督的中心不

应当与政府重叠，而应当有权对政府及其机构进行公开的批评。这也意味着同国家的行政决策和经济决策（这种决策并不一定正确）保持距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党所谋求的长远社会目标同政府在各种压力下并非出于恶意而作出的短期性决策之间是可能产生矛盾的。这些原则应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章中得到明确阐述和规定。

将党转移到对执行当局实行监督的地位去，这肯定将受到广大群众的赞同。现在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应当加强对国家的尊重这一口号反应很冷淡，这是因为广大群众认为，执行当局的主要部门实际上被排除在公众批评之外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国家高级官员（如总理或部长）的行为基本上不受批评，甚至在他们去职之后亦如此。对国家高级机关进行公开性批评是一种如此罕见的事件，一旦发生就引起人们的普遍诧异。如果你注意阅读我们的报刊，你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小官员才会滥用职权。

执行当局的一切非常敏感的领域不受（党和整个社会）公开批评这种做法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应当懂得，在维持这种状况时，我们为提高人民国家的威望而所作的巨大努力（往往是口头上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80年代的波兰社会是否会沉默地接受现状，现在还很难说。实际上，今天社会上已有不小的一部分人对这种格局持否定态度。其表现是，对执行当局无尊重可言，把它当作一台庞大的机器，其动力部分的运转独立于社会。

上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党政位置的“安排”，以及本文其他一切有关建议，都是供讨论的。

党和国家政权中心作出决策的方法问题是政治和社会的单独的一个大问题。重要的决策在“餐桌边”和会议休息期间作出，这已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关于停止执行“大经济组织”制度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的。大家也知道，最高权力机构的变动，首先就是人事上讨价还价的结果。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公用事业及环境保护部在5年内5次更换部长。任何人都无法从实质上讲清外贸部同海洋经济部必须合并的道理。远洋船队是进出口商品的主要运载工具，这样的论点听起来至少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那么交通部亦应并入外贸部去。

人们对决策的酝酿方式也很有意见。常有这样的事：某一位大人物，“抛出一个设想”，比方说要在某地建一座纤维板厂。第二天一批批专家云集，以便论证这一建议是十分可行的。公开表示疑义是不受欢迎的。对付可能的反对者，就采用先发制人的公式：“这是政治决定”或“这是政治性投资”。在这样的气氛下，就产生了禁区、崇拜的偶像和不可触动的事物。为了就建议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对主要的决策者提出意见而设立的专家班子，从此陷于沉默，毫无作为。但是，须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项投资决策（当然是指那些要花几十亿投资的项目）并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事。它是全国人民的事，特别是物质财富创造者们的事。

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决策者们实际上不听专家班子就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提出的分析意见。有一位党中央的部长对我说：“我们就一件并非区区小事曾经一再向领导提出自己的倡议和建议，但都被拒绝了。而两年以后又重新

提出了这件事，好象根本不记得我们早就提过了。”这种来回反复的事例实在不少。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志们说，中央在作决策时，害的是多变病，今天说“向左”，明天又说“向右”。

上述这种酝酿和作出决策的方式不利于提高政权（即国家机关）的威望，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在《政权问题》一章之首已经谈到的问题。波兰人对待自己国家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只愿意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而不愿意承担国家规定的义务，这样的公民肯定存在。还有另外一类波兰人，他们至今认为，人民国家是1944—1945年世界局势的发展强加给波兰的外来制度。

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他们对国家持机会主义的态度。这些人对国家大机器所犯的 errors 和失策不但不反对，反而竭力去适应它，利用管理作风造成的许多不协调现象谋取私利。遗憾的是，他们常常能够得手。

我在不低估这些不良特性（其中许多当然也可在每个民族中找到）的同时，我不能同意说波兰人的特性就是轻视国家的看法，不能同意说波兰人不能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政府与国家。可以对政府持否定态度，而对国家持肯定态度。可是我们这里这两个概念常常混为一谈。我不爱当局（亦即政府）便意味着我不爱自己的国家。其次，波兰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国家是波兰人特别珍惜的一种特殊机构。不仅19世纪和20世纪为独立而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希特勒占领的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被占领的欧洲各

国中存在一个地下的、非常发达的国家这种现象为数不多，波兰却是其中之一（基本上是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另一个我是指南斯拉夫）。第三，波兰社会不仅有信仰、有耐心，而且也正是为了加强国家而愿意作出牺牲。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极其讨厌别人劝它相信白是黑或黑是白的社会。它也是一个向自己的领导提出巨大要求的社会。它不是无缘无故地笼统反对当局。它对国家要求多，因为它非常了解波兰历史。在波兰国家存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可以说没有几个统治者或领导人的政策和对人民的态度是值得人民尊敬和赞赏的。

令人深思的十年

在1971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和1971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提出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纲领，它赢得了社会的赞同。

从政治与心理的范畴来看，纲领的显著特点是使全民族在积极的、符合民众愿望的目标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思想。显然，这既不意味着摒弃对社会和经济种种现象的阶级评价，也不意味着否定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各阶级的差异。

在当时所通过的纲领中，没有谈论某种内部的或外部的威胁，这是指可能对波兰人——党内和党外、不信教和信教的波兰人——团结的威胁。过去，例如在50年代抑或在60年代，都曾有过各种积极的目标，但同时又往往为各种各样的威胁敞开了通道。

爱德华·盖莱克几乎每日都宣传波兰人在积极的目标周

团结起来的思想,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可以断言,这一思想之所以没有被付诸实现,是因为当时存在的形势背景这一原因,而这一形势的根本特点是党的威望由于12月事件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是,这一思想反映了要求结束一种政策的真诚愿望,这种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就导致出现内部或外部威胁的因素,而这种威胁因素被当作转移波兰人对日常的、往往是异常痛苦的事务的视线的有效手段。我记得在1970年12月的一个危难的星期里,曾产生过使上述的威胁因素再度重现的企图。当时有一个稿子的初拟要点落到了我的手里,它是以这样几句话作为开篇的:“……正当西德边界修改分子攻击波兰和拒绝放弃自己的复仇计划时,列宁造船厂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分子……”从下文则得出结论:这些“不负责任的分子”为波兰的世仇敌人提供了攻击材料。尽管这些“不负责任的分子”使得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发生了如此恰当的人事变动^①,从而为制订并通过与人民意愿相一致的国家社会经济纲领创造了条件“幸而”那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

在本10年度的头二三年内,上述的思想曾经在不是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贯彻。由于这一点,党重建了被十二月事件严重破坏的威望。接连不断宣布的各个方案,这不仅是“共和国复兴”的方案,而且还有在短短时期内使共和国发展的方案,都赢得了各个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赞同。这是科学工作者同从事实践工作者大联合的年头,是为了消除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而进行讨论和起草各种建议、意见的年头。在《政

^① 1970年12月事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因“健康原因”辞职,爱德华·盖莱克继任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译注

治》周刊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十二月之后的纲领被誉为“新远景的政策”，人们赞成党和政府领导旨在消除社会政策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决策。第一书记的工作作风建立了信任和产生了巨大的希望。他对各地区的一系列视察和在中央委员会大厦接见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的代表，使他赢得了同情，并使人们相信国家走上了新的非常有意义和富有成果的发展阶段。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爱德华·盖莱克和他的随行人员同斯切青、革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船厂工人的会见，激起了如此巨大的振奋和满意。这位党的领袖向革但斯克造船厂工人们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喏，因此你们怎么样？你们给予帮忙吗？”响亮的回答，“我们一定帮忙！”它曾经是十二月事件后当年最有代表性的口号。

1971—1973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在欧洲和超越欧洲的范围获得了毫无疑问的威望。波兰在这位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始在国际上以开放的、“令人同情的”和非常使人感兴趣的“国家面目”出现。到国外旅行的波兰人，不论是去东方还是去西方，都可以听到对自己国家及其领导人许许多多的赞扬。爱德华·盖莱克的名字同明智、现代化、向世界开放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波兰人对待国际上对他们的想象和议论所具有的独特感情的角度来看，可以设想这些舆论是何等有力地加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有些人听到这些褒扬就开始冲昏了头脑。我认为从中应该寻找对于成就进行令人厌烦的宣传的根源。

1975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7次代表大会闭幕。它是在令人感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气氛中举行的。在地方党

组织和各界代表的发言中满意的调子占据上风。在这些发言中很难找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因素，虽然在本 10 年的前几年党不断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全面确认了国家加速和大力发展的主张。而在经济中已经显露的许多困难并没有使代表大会对所通过的决议作出任何重大的修改。

至于谈到党同社会之间关系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微妙的问题时，应当肯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清楚地表明党继续执行把波兰人团结在积极目标的周围的政策。这意味着党继续进行这样的工作，即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不导致在党同整个社会，包括各个阶层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然而在以后的年月里，在十二月事件后经过艰辛努力才建起的大厦出现了最初的裂纹。根据 1975 年 12 月 19 日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意见，在议会的一次例会上宣布修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认为这一修改是明智的、恰当的。然而，对波兰许多人来说它却是令人感到意外。修改宪法的起草者没有考虑到我们社会对于根本大法进行任何修改具有特殊敏感的事实。对这一根本大法的任何实质性修改，只有在人民真正相信是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时候，才能得到人民的完全同意。如果人民尚没有这一信念，那末就根本不会确信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应该使波兰人相信所作的修改的正确性。

在公布草拟的修改意见之后，许多信件寄到了议会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对修改宪法的一些具体措词提出批评。在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到许多人，特别是创作界人士的签名。完全

可以肯定，这些人士的政治观点谈不上有什么共同性，而且问题也不在于此。实际问题在于：“一部分拥有合法权利的波兰公民，利用宪法所保障的对有关国家的一切事务表达意见的权利，在给政府的信件中对于草拟的修改条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正当的。考虑到上述的把波兰人团结在积极目标周围的主张，应该设想：在上述信件中作者们的批评、甚至是消极的立场，不会被当作是敌对的行动，而是公民关心共和国命运的表现。如果有证据说明这种抗议是由一些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敌对者们所制造的，那末也应该是如此正确对待的。老实讲，“社会主义敌人”的概念是非常含糊而多变的。我们举例说，难道批评书报检查工作或社会政策（它使固定不变的社会福利政策得到加强）的公民是社会主义敌人吗？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上来，即回到波兰70年代中期当局同传统上非常有影响的舆论创作界之间的最初冲突上来。

领导阶层、确切地说是领导核心中的几个人，对上述的批评呼声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惊奇。在这些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被视为敌对性的攻击。因此，在那些信件上签名的人遭到了在60年代所采用过的（例如对“34位知名人士信件”）种种压力。许多作家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出版社对已交付的稿件失去了兴趣，等等，等等。当局决定提醒这些“顽固的”公民：他们是靠谁的恩典而得以生活的。通过几年来对战后波兰历史上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件的观察，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政策是没有效果的。还必须指出，这种政策从来都不曾是什么讨论的课题，例如在波兰统一工人党

中央全会上进行讨论的课题。这种政策把一部分受到压制的人推向另一边营垒，几乎在整个知识界对于被当局视为“害群之马”的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一种或多或少公然示威性的情感。政策的规律是无情的，合乎逻辑的反应是，受到打击的人开始实行自卫，转向寻求西方宣传手段的援助。于是，提交给当局的信件在西方报刊上登载出来了，而《自由欧洲》向波兰国内进行广播。波兰在世界报刊上变得“时髦”了，但这决不是使她增添光彩。

值得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否定修改宪法必要性的人所使用的任何一个论据，都是经不起同他们进行认真讨论的。然而，在70年代却采取了同政论反对者进行相当奇特的斗争方法。这就是开动了庞大的宣传机器，每天都为波兰人发表千百封信件，特别积极地对宪法修改草案表示支持。这种斗争方法是同那些认为不必要修改宪法的人进行不间断的内容重复的争论。这一宣传做法的特点何在呢？在于进行这种宣传的人们决定重演在50年代所采用的方法，有的时候这种方法是成功的。当时这类“大轰大嗡群众”的运动是显示力量，是对社会（当时决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社会主义）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但这是50年代。现在，我们是生活在人民波兰诞生后的第四个10年期间。国家已经不同于从前了，人也不同于从前了。难道搞这种运动的人真的认为：社会上有政治思维能力的人（他们是我们应该紧紧依靠的）会相信群众给当局关于完全赞同拟议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信件是自发的吗？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此类运动远不是自发的，而是各种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进行组织的。在人民波兰成立后的第四

个10年期间采用这种方法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政治行动。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呢？为什么不采用有效的方法？为什么不采用同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而不信任我们政策正确性的人进行对话的方法呢？回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一种回答是：在不容置疑的许多成就（这是在70年代初期十二月事件后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的影响下，一部分领导干部按照如下的模式办事：“我们在这里执行着卓有成效的政策，突然有一帮人竟敢批评我们？！这肯定不是出于友好的立场！”另一种解释是：采用这种方法同不赞成我们观点的人进行斗争的发起者缺乏想象力。他们忘记了我们早已经不是处于刚结束占领后充满呻吟、贫困的农业社会了，忘记了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庄严地响应号召积极投身于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忘记了正是我们自己30多年来尽了一切努力培养一批杰出的、受到良好教育和富有批评精神的波兰人得到了成长。正因为这样，党在1970年12月之后才发出了“创造性的追求”的号召。

这一点也是不能排除的：导致在当局同一些非常重要的舆论作家之间产生冲突形势的种种事情，是某些不利现象的反应，这些不利现象在7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暴露，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波兰经济昙花一现的发展终于结束了。在晴朗的天空开始出现了初聚的乌云。可能是这一事实使某些一直富有自信心的政治家失去了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一批人提出的批评被视为是企图削弱政权。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假设，即因为一直是晴朗的天空现在却为乌云所笼罩，所以也就不会没有敌对者，岂不是也就可以动员党，尤其是积极分子来

反对他们吗？

诚然，在当局同相当多的作家和艺术家之间产生冲突以及在第4个10年期间第一次产生了内部的威胁，并不是采取上述的斗争方法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上述的斗争方法加强了党在社会，而首先是在创作界的领导作用，那末他就犯了大错误。当然，这一结论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得出的：在道义和政治的阵地上，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以决议、声明、文章等等的数量来加以衡量的，这些决议、声明、文章往往是被迫撰拟的，其内容是由上面规定的。

1976年6月出现了这10年中的第二次政治冲突，它严重地破坏了党同社会的联系，削弱了在积极目标的基础上团结的主张。我在这里指的是关于提高食品价格事件。早在这一事态发生的初期，在进行所谓的协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详细地说过）过程中，削弱同社会联系的趋向已经显露出来。从当时种种现象得出结论：社会是能够同意改变价格的，第一，如果价格方案在事先真正公开、诚恳地经过社会的讨论；第二，如果设想提高的价格控制在合理的和适当的限度之内，并更加公正地考虑到补偿的问题。实际上彼得·雅罗谢维奇是承认这一点的。他在1976年7月5日国际合作运动日对这一运动的参加者讲过这样的话：“公布的改变价格的方案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什么样的规模和什么样的范围内改变价格……参加这一问题的全社会讨论的相当一部分人提出了意见，要求肉、糖、鱼和家禽价格的提高比原计划少一些（确切地说“比政府制定的”计划少一些），而面包和烤食类制品可以稍多提高一些价格……”总理保证说：“每一条意见都会被加以

考虑和进行深入地研究。政府以严肃的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决不会损害讨论中提出的有价值和有建设性意义的东西。”为什么在6月25日之前对总理的上述意见却被忘却了呢？这一点不是不可能的，即现在我们仍然感觉到存在着政治和道义后果的拉多姆和乌尔苏斯事件在当时尚未发生。

撤销提高价格的方案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胆略和政治明智的表现，由于这一决策消除了继续罢工和举行游行示威的起因。波兰重新恢复了平静。但是遗留下了在经济和社会上都急需解决的价格不合理结构的问题。此后的一些年代里，在这一方面并未有过任何明确的和断然的决策；当然，这一点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撤销提高价格方案之后的若干天和若干月内，为排除在人民政权同工人阶级的相当多一部分人之间形成的冲突，当局做了些什么。工人阶级的相当多一部分人把公布的提高物价的方案视为使当时所获得的生活水平的大倒退。

在国家撤销提高价格决策的第一个星期里，在城市和工厂里掀起了群众大会的浪潮，据宣传工具的材料，人们在大会上表示“完全支持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在无数横幅标语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我们同党中央委员会和盖莱克同志在一起！”“我们同政府和彼得·雅罗谢维奇同志在一起！”一个客观的观察员必然会提出问题，即关于这一运动的政治含义问题。通过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支持党领导机构的政策表明：有人对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提出了疑问。那是谁呢？难道是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示威者吗？恐怕不是，因为根据报刊评论作者的确认，包括拉多姆和重要的华沙居民在内的“全体劳动

人民”都完全支持改变食品价格、财政补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构”（《华沙生活报》）。这里不妨加一个注脚：难道可以设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会支持改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吗？某些记者的片面性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一种轻率而经不起思考的报道，一位中央部门的干部说过提高物价的方案正确、而撤销这一方案也正确的话，两者是同出一辙的。

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游行示威者们没有可能被视为对党的政策产生了威胁，因为报刊上宣传他们是一小批不负责任、没有什么影响、“拒绝进行协商”的人（《华沙生活报》）。因此，为什么又要开动庞大的宣传机器呢？在这里很可能是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期间已经暴露出来的同一个思考公式在发生作用。那就是我们以群众性的（实际上是经过组织起来的！）百万劳动人民的支持来回击对党和政府部分政策的批评！我们用一系列群众大会和声明把批评者置于死地！但是究竟把什么人置于死地？当然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为数不多的一小批人，而是社会，社会说“不同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提高物价，尤其是如此大幅度提高物价的问题上，很难使人相信人们会愉快地表示赞同。因此，应该怀疑在70年代的波兰对群众进行这一种“政治工作”的方法会有什么意义。这是精力和时间的一种损失。

热情支持党和政府政策的许多群众大会和成千上万封信件可以被认为根本没有奏效，而积极的政治决策（即撤销已宣布的提高物价方案）的应有作用并未得到表现，其原因是在6月以后的前几个月中对参与拉多姆和乌尔苏斯街头事端的一部分人采取了镇压措施。当然，任何一个破坏法律的行为在

人民波兰必然会根据现行的法律而受到惩处，但是把被告者置于被告席上的同时，不能不分析事端发生的具体情况。所有街头游行示威的经验表明，鼎沸的情绪对参加示威者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袭击商店和银行同有预谋地进行这一袭击必须被认为是有所区别的。当然，在这种情势下要是说公安机关也采取扩大事端的行动、滥用职权并不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却采取了这样做法：利用这种种具体情况对数十名肇事者作出过分严厉的判决，正如宣传手段所介绍的那样，这些人被证明抢劫国家财产等等。如果确实如此，那末为什么在一年以后又对他们实行大赦呢？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宽大的做法吗？

把这个问题留给求知心切的读者们去回答吧。应该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里挫折的震惊和受创伤的自尊性折磨着党的某些领导成员。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所发生的一切错误首先要由社会承担责任。社会肯定不可能是什么都理想化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能产生这种印象：每一次不成功，每一次不能达到目标，等等，“我们领导人都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是想努力做好事情的，而全部困难的症结在于阻碍或不理解我们的人。”对于这种看法，特别是对于顽固地坚持这种看法的人，都应最坚决地摒弃，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上当局同社会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中社会永远仍然是社会，而政权却发生了变化。

观察一下修改宪法和提高物价失败后至今这几年的情况，就能清楚地看到，在这两个事件中人们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它削弱了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实质上，这两个日期——

1976年2月16日和1976年6月25日——标志着这10年中波兰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们使国内的政局复杂化了，破坏了党与社会的联系，中断了1970年12月以后业已开始的、所有波兰人不分世界观和政治分歧而团结起来的有益进程，这一进程的基础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6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正确纲领。而那两个事件中的轻率决定的后果至今我们仍然能感觉到。

宣 传 成 就

当代主要宣传工具是新闻媒介——报刊、广播和电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们构成政权的一个部分。新闻媒介工具被赋予各种各样的任务。它应当在社会上宣传党的纲领，调动社会和经济积极性，赞扬人们活动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批评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残余或是通过资本主义渗透而强加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和态度。同时新闻媒介工具还被赋予以监督的职能。它首先应向领导部门报告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经济行政部门以及党的机关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决议、议会决议和政府指令。实际上，执行监督职能常常导致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这不止一次地在编辑部、记者同被批评或他们的上级之间引起关系紧张。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人们支持批评、但通常并不支持对他们自己的批评。党在各种场合都一直强调新闻媒介所开展的批评的社会积极意义，并鼓励记者们鞭挞消极现象。

总的说来，新闻媒介工具能够进入并批判性地进行探讨

的社会和经济领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记者们知道什么事情和谁是可以批评的，而什么样的事情和谁又是不能触犯。例如，就存在着不能同《人民论坛报》和《新路》进行任何争论的禁令。凡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刊所发表的东西，都应当被看成是金科玉律。有人指出，同《人民论坛报》和《新路》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进行任何争论，就意味着怀疑党的路线。因此，在党中央机关报刊工作的记者是属于一些在波兰不会受到任何公开批评的人。不能同《人民论坛报》和《新路》进行争论的禁令，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中许多矛盾之一。这是一种教条，它实际上限制了在党的报刊上展开创造性讨论的可能性。它不符合波兰人的民族特性，同我们酷爱的民主传统也是十分不相容的。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而常常又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要求记者们具有批评的质量。批评应当是富有建设性的，不应当涣散人们的意志，而应当激励人们去克服自己的弱点、战胜困难，应当给人们指出一条摆脱某种不利处境的出路，还应当在成就与消极之间捍卫正确的评价关系。新闻媒介的领导部门同样还要告诫记者们，在总结我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消极现象时也要注意这一切。人们最常见到的是对某些个别现象的批评。

探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的课题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然而按照我对70年代波兰的见解，我更愿意把这种探讨集中到制定我们进行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的意见方面。

在本10年的初期，领导新闻媒介的党的机关制定了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提出要把国家所获得的成

就，首先是实现十二月事件后的国家社会经济纲领的成就告诉社会，这从社会和政治上看是合理正确的。这一指导思想的设计者们认为，在经历了十二月事件巨大震动以后，公众的舆论表明：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着腐败堕落现象，必须使波兰人深信：我们是能够取得成就的，由于我们有好的纲领，我们能够顺利地克服我们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时，新闻界毫无阻力地接受了这一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本10年初期的现实提供了许多实例，证明进行这一种宣传的合理正确性。在我1973年写的许多篇文章中，有一篇文章就曾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在记者中存在的情绪：“在停滞和徘徊（在“得过且过”和“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的圈子里徘徊）的年代之后，不论是个人、抑或是全国人民终于开始尝到了成就的甜头了……我们的国家日益安定、富裕，我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我们确实正在使波兰现代化，我们思考和活动的方式正在同时代相适应。”遗憾的是，近10年以后的今天此文应被评价为是一种典型的“空想”的抒发而已。

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在70年代的头5年里一直在各新闻媒介部门贯彻执行着，它描绘了这样一个国家的形象：它正在迅速地向前迈进、在没有严重的紧张和矛盾的情况下发展着。揭露人们的弱点和错误以及开展批评的余地尽管是缓慢的、但却无情地日益缩小着。1973年，宣传首脑耶日·乌卡舍维奇对几百名积极分子当众宣称：《政治》周刊在散布波兰的灾难形象。然而，如果把那个“灾难”同现在1979年从《人民论坛报》到《等等》刊物所开展的批评加以比较，那末它只不过

是一种低声的抽泣而已。每日狂热地宣扬建设“第二个波兰”（这个70年代前半期特别流行的口号，在1976年6月涨价失败后从报刊、广播、电视里完全销声匿迹了，尽管谁也没下令停止使用），这就造成这样一种精神压力，即最大的愚者也要被迫去谈论自己的成就。到了70年代后半期这一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有了某些修正，即我们也开始了谈论困难、发表有关困难的文章。恰恰是过去最热心鼓吹成就的那些人不断地反对自己的成就，还振臂高呼：我们也有困难啊！

过去曾宣布过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的持久目的是赞美自己应有的荣誉。我们在一个相当短暂的时期里，从严肃的自我批判（这一特征在1971年我们的工作中非常明显）态度转向为自我歌功颂德。尽管领导人曾庄严地保证：“我们不允许在我们的报刊上出现过于乐观的语调。”无需置疑，贯彻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使党、政干部们骄傲了起来，还增强了这种信念：恰恰是他们“赢得了上帝的青睐”。只要阅读一下这一时期的报刊，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十二月事件以后才开始的，而对于这一事件本身却被人们遗忘了。日益增强的自信感实际上开始成为一种限制，即限制客观上存在的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既然我们管理尽善尽美，那末任何改革都是无需的。

因为在宣传成就时每日都做到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因此在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峰时期，报刊、广播和电视就不断地把大量的陈词滥调抛向社会。新闻媒介充斥着概念化和空话。那些十次、百次宣传过的十二月事件以后成就的讲话在

报刊上比比皆是。1971年通过的原则——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讲话也不应当超过20分钟，很快遭到了破坏。关于必须限制重要人物出席各种会议礼节性报道的决定（还不止一个决定），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报道上这部分人的数目大大增多。如党中央副部长出席这样或那样会议的新闻报道是屡见不鲜的。还应该补充一下，在70年代，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宫廷作风得到了大大发展。授予头衔以及普遍讲究遵守等级的阶梯，简直成为灾难。这一问题我将在专门的章节中加以广泛的阐述。

通过对社会情绪的报道所进行的关于成就的宣传，把社会的形象描绘成是绝对支持党的政策的。浮夸的风气迅速地占了上风。在本10年的头几年，关于成就的宣传，没有确认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差异，对工作表现好的和工作表现坏的工人没有加以区分。阅读这一时期的报刊，波兰人似乎对自己的社会条件是极其满意的，勤奋得如同蚂蚁一样。如果按照1971—1975年所写和所谈论的社会情绪来观察六月事件的话，那么，反对拟议中的提高物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从我们的宣传中可以得出结论：波兰人是没有任何理由表示不满意的。

在70年代所实行的宣传中有两个特点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即经济总是脱离政治以及竭力向民众讨好。

波兰人理应对恶劣的工作、浪费、延误完成基建项目种种明显的现象表示愤慨，而不应该傲慢地昂首发问，这是谁的过失，更不应该去这样想：他所接触到的和70年代末期报刊开始报道的成千上万消极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岂不是在于不

正确的经济政策、“上头”的种种错误和过时的国民经济管理方法等等。我们以动力部门为例。至少两年以来我们日益感到电力的不足，国民经济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损失。生产停工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的主要祸患之一。新闻媒介公开地、几乎每日在报道动力的不足，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问题，应该由谁承担这一局面的责任。这一问题，在报刊上没有提及，而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公开的讲话中也缄口不谈，这就是经济与政治相脱离的典型事例。当然，生产者应该懂得，我们的动力是严重不足的，但这不应该把它同上头的决策联系在一起。

讨好公民，表现在不断地把当代波兰人的形象描绘成实际上都是具有正面特征的人。波兰人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社会主义忘我建设者，为增加国家的财富、提高波兰在世界上的良好声誉而竭尽全力，等等。这一类观点决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意味着容忍许多公民身上所存在的种种恶习。我们是高尚的民族啊！这就是我们每天听到的。

尽管对于宣传成就提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新闻媒介的，但应该记住，这种宣传在发行的书籍中，在党中央思想教育部所出版的数以百计的小册子里，以及在其他所有宣传刊物中都始终不渝地得到过贯彻。还需要补充的是，党中央思想教育部近年来的出版物的思想水平之低简直令人可怕。广阅此类小册子使人得出一种印象：作者们不仅在原地踏步不前，而且已经后退，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上。于是，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到处起作用了。这一指导思想的设计者们所鼓吹的宣传我们政策的种种原则，通过空话、教训人、通告取

代说服教育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腔调，贯彻于新闻媒介之中，它对新闻媒介的形式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50年代记者活动的那种简单的、原始的方法又故态复萌了。电视所采用的报道制度简直使人无法忍受。根据正确的出发点看，当代电视是最强有力的新闻媒介工具，要懂得在电视上对消极现象的批评应当经过专门的选择，在实际上，电视新闻却变成了不断举行的新开工的工厂、奶牛场、家禽场等等的联欢会。电视新闻作者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使用这一宣传方法。在我们的电视中使用这一方法宣传现实所派生的结果，就是采用模棱两可的中性报道方针，采用文雅而又四平八稳的空话的报道方针。成为这一方针牺牲品的有受到人们欢迎的电视节目“监督”。而特别受到听众欢迎的广播节目“一天过去了”（每一次这一广播节目都是可以引为自豪的），也遭到了与“监督”同样的命运。它被叫做“波兰欢迎您”的一种刻板公式化的节目所取代。

在宣传成就这一指导思想被开足马力进行贯彻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种气氛，它完全不利于对我们宣传的工作方针、方法及内容进行创造性的讨论。如果有谁对推行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产生怀疑，即怀疑这一指导思想创造了国家从成就走向成就的形象，那末他就可以听取这样的议论：“敌人在攻击我们的宣传了。”还是在1976年各报刊主编的会议上，有人就蛮横地宣称：谁怀疑宣传成就的正确原则，那他干脆就应该辞职。

观察十二月事件后的9年情况，同时还对目前波兰所处

的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形势加以思索，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关于成就的宣传，除了对人民和党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作了宣传以外，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危害。首先，它削弱了很大一部分中央干部、其中也包括领导干部对实现国家社会一经济发展纲领中所出现的消极现象的敏锐性。民族的自大狂——我们最危险的病症之一——也不断有所发展。

对于从心理上减轻由于上述种种现象而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来说，成就的宣传确实是创造了适宜的气氛。然而，这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那就是至少近二、三年来，它成了许多党机构的成员，尤其是省党机构的成员的批评对象。正是地方上的同志们对这一宣传的无效性感受最为明显、最为深刻。这一宣传不顾事实，竭力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各种成就上来，而当时每日的现实所带来的却是难以解决的各种困难和麻烦。关于成就的宣传，破坏了对波兰人日常生活正常图象的介绍。

现实的压力虽然迫使我们的宣传不得不改变重点，但是宣传成就的指导思想仍然行之有效，它的设计者们依然替自己进行辩护，而不愿意对这一指导思想作批判性的分析。即使他们意识到是做“过火”了，那也只会是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那样，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湮没在笼而统之的措词之中。在他们所做的解释里，根本无法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允许在几年内一直描绘着这种安闲恬然的图景和不断地吹捧他们自己。关于宣传的主要罪过，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于急剧地刺激了社会中不少人的胃口，对此我们又无法予以满足。

显而易见，我们的整个宣传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中所进行的宣传，是与党中央宣传系统对新闻媒介所实行的领导体制密切相关的。在不否认党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新闻媒介实行监督的同时，也应当强调指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样一个问题，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强大的宣传工具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的斗争服务。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报刊、广播和电视部是主要的领导中心。在70年代，该部明显地加强了自己的对记者们的指令作用（对于记者说来往往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和对整个新闻界的监督作用。做到这一点也就需要增加该部的工作人员。随着时间的流逝，该部对编辑机构的领导工作达到了符合它理想的境地。它对编辑们和整个新闻界越来越多地起到监护的职能。该部工作人员对编辑部提出要付印的文章进行新闻检查，把他们所不喜欢的内容删去或加以改写，等等，对记者的出国力求作出反应，对编辑部领导机构的人事政策实行监督，甚至对某一个政治家的照片或关于介绍他的文章应刊登在什么位置上都要发表意见。同时，该部还把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总局持有异议的文章转送党中央其他有关部门，这就不止一次地使这些文章失去了发表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涉及的往往正是这些部门所监管的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领域。70年代中期，在新闻媒介的管理政策中，还有过一种令人感到惊讶的防止国际事件对国内影响的规定。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向公众舆论报道水门丑闻事件的发展过程，因为……。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报刊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于报

道这条新闻就会推翻最高当局。这种理解，在处理伊朗事件发展过程的问题上也可以得到验证。当时，他们指示在报道那里所发生的局势时，要特别注意分寸，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些事实，如宗教运动的力量和规模、国王的威望下降、警察驱散人群，等等，可能会激起我们社会的联想？！

总的看来，在70年代，党中央报刊、广播和电视部成了波兰报刊的超级编辑部，其结果是大大限制了编委们和主编们的独立性。从最客观的态度出发，必须指出：在波兰存在的第四个10年期间，对报刊的这种领导作风似乎是一种背离时代的错误。

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总局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工具，宣传系统通过它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界限进行调节，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在本10年里，党中央报刊、广播和电视部正是这样的工具——当然不只是它——每天都是进行这种工作的工具。对报刊和文艺节目的检查，采取预先申请登记的办法，而主管宣传的党中央书记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根据有关的决议对是否准予申请登记有权做出决定。但实际情况却并不这样，因为准予申请登记是由上面提到的部以及中央其他有关的部转批的。编辑、出版者、作家、电影工作者、剧院和酒馆的歌舞演员、各类演出的组织者，对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机构的工作最感到头痛，因为他们通常对它所做出的决定束手无策。在很多的情况下，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总局的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要你拿出申请登记证来，讨论于是也就到此结束。而向政治领导部门即党中央的有关部申诉意见，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在70年代中期,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机构的干预范围明显扩大了。删去一些句子、甚至一些单词是这一机构惯用的办法。许多干预表明,准予注册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考虑。其不必要性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常常由于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而使准予注册的权利被取消,或者报道和文章由于涉及某件事也被取消注册权利,而这些事在一段时间后在现实的压力下却成了如同每日食用面包那样重要。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活动是不能以一些事例解释清楚的,因为它需要单独深入地进行研究。

从事报刊和文艺节目检查的部门是有可能使自己成为对新闻媒介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进行监督的理想工具,如果它不是采用发指示、下命令的办法,而是进行解释说服。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方法需要对禁止新闻、文章、诗歌、书籍的发表或出版所做出的决定说出实质性的理由。麻烦在于说服教育的办法使所谓的“干练有效的领导方法”难以实现。从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加强党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领导作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检查的理解方法,注册的繁琐手续,以及注册范围的无所不包,是一种不利的现象。

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波兰人日益提高的文化水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日益激化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求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宣传的模式,即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而不是把人们推开的宣传模式。要知道,人们的“耳、眼是开放的”(接触外界客观事物的),同时,十二月事件以后人们关于波兰在欧洲和世界上的作用的信念促使他们对我们说、写的东西同生活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持批判和非常敏感的

态度。

反 对 派

1976 年末，出现了一个所谓保卫工人委员会。多年来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雅采克·库龙和阿达姆·米赫尼克开始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这两个人在 60 年代均因从事政治活动受审判刑。参加该委员会的还有著名小说《灰与金钢钻》的作者耶日·安哲耶夫斯基、波兰经济学家的元老爱德华·利宾斯基和波兰舞台的杰出女演员哈丽娜·米科瓦伊斯卡。还在保卫工人委员会成立之前，其筹备组织者们就进行了募捐活动，主要是在作家、演员和科学家圈子里为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工厂的那些工人募捐，据他们说，那些工人因参加游行示威而遭受迫害。保卫工人委员会标志着 70 年代后 5 年中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派。这些派别的出现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在迄今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中，在各种背景下，不断出现和消失过反对派集团，有的组织得好一点，有的组织得差一点。我们同一个真正是大的、有影响的、组织强有力的、并在不小程度上获得社会和西方支持的反对派（米科瓦伊契克的波兰农民党和“自由和独立派”）进行过较量，那是在 40 年代。在其遭到失败后，在以后的年代里反对派分子的活动，则是零零星星、不成气候的事。那么，现在的反对派是否就毫无新玩意儿呢？也不尽然。因为从同米科瓦伊契克、同“自由和独立派”以及其他反动组织斗争之后，这是第一次同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进行较量，不仅如此，而且

这个反对派运动今天已经成了波兰政治格局中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

70年代后5年波兰出现的反对派比之早些时候类似的小集团和同类活动有几点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它是在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即使考虑到存在的困难和紧张,也不能否定这一事实)以及数百万波兰人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同50和60年代相比)的时期发生的;第二、它是在一个大部分出生于战后的波兰人构成社会多数的社会里进行活动的,因此,其主要基础已经不是50年代里在政治上和感情上同资产阶级波兰藕断丝连的那些阶层;第三、目前的反对派声称它是根据现行法律进行活动的,并竭力要求赋予它固定机构的地位;第四、它经常不断地开展活动;第五、它把自己不小的一部分精力集中在维护宪法中明文记载的权利上,自我装扮成劳动群众利益的捍卫者,自诩为保护一切被损害者的力量;第六、它并不寻求同党内的某些派别或倾向建立联系或获得它们的支持,对党内的“强硬派”或“温和派”都一概进行反对。如果说它想同什么联合的话,那首先是同天主教会,迄今对于它来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最后,第七、它是在发生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进行活动的。而今,波兰孤立于西方的程度已经小于以前某个时期,而政治和经济共处的要求,需要我们对外显示出内部的稳定,而不是造成尖锐的冲突或采取悲剧性的镇压措施。

在1971年,即我们在制定国家整个1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在70年代后5年会产生有组织的反对派。这些组织的出现,让我们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是出于党的意料之外的。在极大的自我满足的波浪上飘游着,耳闻

宣传成就的音乐令人陶然忘机，根本就不去考虑出现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可能性。开始并没有太认真予以对待。今天，谁要不是闭眼不看现实，谁就不能小看反对派的活动。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同时又颇有成就地钻入了创作界，部分地钻入了学术界和学生界。他们还力图进入农村。反对派还在出版方面发挥了不小的积极性。国内流传着各种各样定期、不定期的刊物，公报，呼吁书，号召书，报告，纲领，等等，等等。还有一个“独立出版社”在进行活动，波兰著名作家——卡西密什·布朗迪斯，塔代乌什·孔维茨基——已在那里出版了书籍。这种出版活动，在如今每两个机关中就有一台静电复印机的时代是易如反掌之事。这些出版社的印刷总数共计为2万册。书中的观点被“自由欧洲”电台广为传播。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出版物的读者的数量，但是到上述的各界转一转，就不难发现，人们读这些东西的兴味甚浓。其原因之一是，所刊载的文章、小品、杂文涉及的问题，正是各种会议休息室、饮馔时、同事和家庭聚会中所议论的问题。这些文章的作者采用了十分有效的方法。在攻击党或者制度原则时常常利用生活中的事例，也利用正式报刊中的事例，但不同于正式报刊的是，他们把问题解释得彻底，显然，很多人恰恰就是期待这种彻底的解释。

对于各种反对派在一切有关加强波兰民族特性的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的煽动性，是决不应该予以轻视的，这同官方正式史学对波兰现代史的几个事件——诸如1945—1948年事件，1948—1956年事件，1968年三月事件——保持沉默是有联系的。

反对派的政治思想面目并不是相同的。粗略说来，反对派中有两种派别。第一——自由主义一无政府主义派；第二——民族主义派。两者均与波兰传统有关联，因此不能把他们视为是那些充满酸气和失意的政客或过于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所制造出来的狮头蛇尾羊身的怪物（古希腊神话中的巨怪——译注）。第一派的信仰者们主要是打着自由的口号同波兰统一工人党进行斗争的。他们拒绝我们社会主义的主张，还加以论证，甚至证明它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非法的刊物中时而呼吁当局实行载入宪法的权利条款。第二派的特点中应该指出的有：使有关毕苏斯基^①的神话复活、为民族民主党恢复名誉、否定波兰工人运动的功绩、为萨纳奇外交政策涂脂抹粉，最后则是不断重弹反苏老调。最后列举的这种直接危及波兰国家利益的反苏调子是被公开宣扬的（例如，1979年7月31日，华沙起义35周年前夕，在无名烈士墓前举行示威游行时就宣传过）。如果撇开反苏调子不谈，那么应该指出，为1939年9月前各届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及其作者恢复名誉的倾向，同样的在那些同保卫工人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的历史学家阶层中也是存在的。

尽管反对派分子目前的活动完全不构成对人民政权的威胁，然而对它决不能加以轻视，或者采取以波兰著名成语“听天由命”的态度听之任之。在这一问题上，象在其它许多问题上一样，需要有点想象力，哪怕是微小的想象力也好。对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们应该予以提醒，在人民和各个阶级的生活

^①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社会党右翼领袖，1906年成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领导人，1918年任波兰国家首脑和波军总司令。

中，不管思想和政治条件有这样或那样不同，都会发生“哲学家们做梦”也未曾见过的各种事件。因此，为进行深远的思考而“化费精力”大概是值得的，今天这还几乎是抽象的思考。尤其是由于这一情况而使思考更显得需要，即关心事态的人们都十分清楚，目前反对派的活动正在把一切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反对者和仇视我们的人都煽动了起来。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尽管反对派分子不能威胁人民政权，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譬如说5年或10年后，就可能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有明确的削弱反对派活动的意见，还应当有限制它对各个阶层——尤其是对大学青年的影响的办法。换句话说，需要有旨在从政治上孤立反对派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我们是否拥有这种策略和战略了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破除这种荒诞的神话，这种神话不久前仍然在一些活动家意识中起着作用。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样一种看法，反对派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是在我们现在正遭受的经济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一旦经济形势根本好转，反对派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了。顺便问一句，什么叫“根本好转？”例如，1979年和1980年实际工资下降了3%，而1981年或1982年提高2%，这是否可说是根本好转呢？

如果我们把反对派的存在和开展活动是与经济形势有关联的观点视为是正确的观点，那就会相信一些人的说法，即波兰至少需要5年才能走出目前困境，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今后五、六年之内必须把反对派当作波兰政治构图中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因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而受到压力的

我们，必须尽力谨慎地思考每一个步伐，同时必须避免激烈的行动。

这种指望是不严肃的，即当我们摆脱目前所经历的困难时反对派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第一、反对派已经超越了纯经济问题；第二、几年后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反对派深深渗入波兰的现实生活中并壮大起来，从而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持久的现象而加以容忍。也许有的人说道，形势这样发展是不可能的吧？伊朗国王也并没有想到过，理应对他感谢的人民——由于他，人民从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把他驱除出国，推倒了他的纪念碑。形势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也是可能的：只有通过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才能够窒息反对派。但是，这种手段难道是随意就能够采取的吗？

现在，斗争的主要担子压在治安机构的肩上，它们为限制反对派的行动进行工作，而其种种措施是非常缓和的。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但是，从长远利益分析则应该怀疑其效果。尤其是：目前所采用的、主要是针对青年人的所谓“不间断的、避免引起激烈反抗的折磨法”，从社会角度看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

宣传工具常常用来同反对派进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经常使用一些特别“强硬的论述”。把一些人说成具有反波兰的、反民族的动机，“他们要使国家脱离正确的道路，阻碍实现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并要恢复旧秩序，而它曾经给波兰人民带来过无数的非正义和悲剧”。这种种“论述”的致命点在于它们的空空洞洞，它们在社会主义信仰者中不能激起奋发感情和义愤（根本就不明白对什么人要产生这种义愤）。

至于反对派分子，他们则压根儿不会因被描绘成具有这种种目的而感到忧愁。空洞无物和平庸的婉语暴露了我们的弱点。也许他们没有错呢？

然而，时而出现这种情况，人们认为必须公开地谴责反对派的活动。例如，克拉科夫大学生佩雅斯和拉多姆居民扬·勃罗日纳的死亡就是被用来公开谴责反对派活动的事例。波兰报刊就两个悲剧事件所发表的报道、文章，肯定不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那是一些吵架的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威胁、夸张，或者是空话。“他们（指反对派）之所以大喊大嚷，是因为他们被悬于半空，被社会所孤立……他们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们早就同真理、同起码的诚实与尊严分道扬镳了。”这就是从华沙报刊揭露《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活动目的的某些文章中摘录下来的论述。一个显著特点是：此类文章照例具有上面授意的标记，是否有可能连作者们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并不深信呢？

当然，在政治中存在不能排除使用威胁的种种情况，但问题在于：今天，在人民波兰存在第四个10年期间，使用这种语言根本不可能让社会中具有思考能力和政治上积极进行活动的那部分人感到信服。

那末，为什么不采取公开直接进行斗争的办法呢？第一、很可能是公开争论会提高反对派政治意义的观点产生了作用。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第二、我们的决策者本身很可能并不完全相信公开的争论是可以进行的，因为这种公开争论只要在使用不可辩驳的事实和放弃咒骂的时候，就会创造挫败反对派的机会。如果反对派指责我们在70年代的后5年在

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现象(书籍、报刊发行量不足,等等),那末,在同他们进行争论时,无论是认为这是错误的指责或甚至同意这一指责,都必须加以论证,要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不幸的词儿在70年代后5年里往往变得令人相当头痛。现在,同反对派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困难在于:决策者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软肚皮”(意喻弱点——译注),还十分清楚地知道哪些困难是客观的、不取决于我们的原因而造成的,而哪些困难则是由于当局的无能、错误而造成的。对于后一种原因,当局不愿意承认。恰恰正是这种不愿意给反对派分子创造了活动的余地。

从迄今同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应当把重点从镇压行动转移到政治斗争上来,镇压行动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而且还只能在偶而使用之时奏效。我们作这种理解,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产生给反对派迅速加以利用的各种爆发因素,而主要是为了要党同社会进行诚恳的对话,提出和讨论棘手的问题,讨论那些令人感到痛苦烦恼的事情及其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的国内政策了解社会的需要总是非常敏感,宣传总是有效率的,论证是非常有力量的,那末,反对派不可能同我们进行政治较量,也不可能提出鼓动人心的思想和纲领(他们利用我们的错误、极端的骄傲自大、唯意志论,等等),也就不可能壮大到对我们制度的稳定构成威胁的规模。这一点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允许反对派扮演卫士的角色,由他们提出要求国家政权机构、经济机构、检察院、法院等等彻底履行遵守宪法中记载的法令呢。这本来应该是我们进行大

声疾呼的，并到处进行宣传的。正应该是我们使宪法变成整个社会道德的支柱。应该是党，而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人，成为法律的卫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反对派丧失立足之地。

有效地限制反对派的影响，要求我们批判地看待波兰现实的政治力量结构。下文将谈及这一问题。

伙 伴 关 系

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波兰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指导力量。在这一条款中还写道，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以及民主党的合作是民族统一阵线的基础。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具有新颖特征的这一条款经受着实践的检验。

作为波兰社会政治指导力量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0年代的职能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指导力量的职能时而发挥得好一点，时而则差一些，时而还可能受到种种压力，对于有的压力应当加以重视，而有的则不必重视。如果我们愿意仍然信奉那些以各种方式重弹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及它与同盟者关系的老调的学者、政治工作者和政论工作者的话，那么，进一步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最近10年，特别是它的后5年如何发挥自己指导作用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然而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当用简明的论述加以说明。简单地说是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了使我们党的领导作用在80年代不致于被削弱需要做些什么，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对于不愿意使我们党在波兰社会中加强地位的各种政治

势力不可能都加以限制，也不应这样做。

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纲领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并没有预见到在波兰的政治领域会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我们默然地接受了一种观点，即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结构将年复一年地重现、存在下去。尤其是，人们设想党的威望日益提高，而且——让我们坦率地讲——人们还设想，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独立自主性在发挥其领导作用中会进一步增长。在本10年的最初几年里，这种观点曾经是使人深信的，也可以说曾经变成一种信仰。可以说，今天这种信念在相当大一部分积极分子中已经不存在了。

70年代后半期，在国家的政治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势力，关于它们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一些，它们不仅仅对党在制订国家发展方向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出疑问，而且还想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我们的设想提出修改。首先应该列举的这种势力就是罗马天主教会。

在对有关教会问题以及教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地位问题进行种种思考的时候，首先必须确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多数人民是信教的，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是同天主教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社会中处于少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形势将不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这是现实，因此我们也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天主教徒的共存不是一种暂时的、而是一种持久的现象。那末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从这一确认（持久的共存）中能否得出实践的结果呢？我认为往往是得不出结果的。

在粗略地分析我们对教会的政策的时候，不妨从三个角

度加以思考。第一个角度是采取把教会当作一种机构的政策；第二个角度则涉及我们对宗教的立场；第三个角度，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角度，涉及到天主教徒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至于谈到把教会当作一种机构问题，我们的态度毋庸置疑是，在当前的10年里我们对各级教会都采取了完全不坏的政策。它是由非常温和的让步、坚决拒绝教会的某些要求以及在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这三者相结合的政策。这一策略所取得的种种成就，⁵主要归功于那些在中央机构负责处理国家同教会之间关系的同志们。

我们对宗教的立场则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同时又不完善。一方面，承认它的长期存在（同样的还承认波兰天主教的群众性），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实践中却不止一次表现出似乎已经有一个规定天主教最终退出这个世界的期限。思想战线的领导人鼓动各种学科的千百名博士、副教授、教授和新闻记者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但一旦遇到同宗教和波兰人笃信上帝有关的问题时，却表现出惊奇的迟钝。他们一般都局限于表白在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平等这一肤浅的观点，郑重地声称在人民波兰不是以信仰的标准来评价公民的合格性的。在实践上事情却往往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接受数万名教徒入党，我们不得不承认：既然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信教，不这样做不行。众所周知，信教的党员不能幻想取得很高的提升机缘。更有甚者，信教的党员知道：为孩子洗礼或者在教堂举行婚礼仪式都是不太受党欢迎的。于是，他们就悄悄地、半秘密地去做这些事情。他往往挑选僻远的教堂，并把这种做

法的责任推给妻子，等等。这一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就会使一部分党员注定要戴上假面具，对这种道德上的双重性感到习以为常。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能够把宗教明确地分开（不是把教会同国家分开）。我们以无神论的精神对党员进行教育工作的同时，应该坦率地、毫不含糊地声明，天主教徒党员不需要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感到羞愧。他应该懂得，我们要求他积极参加实现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各种纲领，同时又要放弃在教会各级组织机构中的积极活动。他还应该懂得，我们还将要求他认识到唯物主义哲学是唯一正确的哲学。但是，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将只采取理智的手段。

从宗教信仰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考虑教徒们的需要。当然这不仅仅是同意建造新的教堂，还有同意在广播电台播放弥撒、同意修女进入医院当护士，等等。总之，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事，使信教的人、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能够真正深信，我们确实无意妨碍他们的生活。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天主教徒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显然，他们不是帕里亚（南印度居民中一个受压迫无权利的阶层——译注），但众所周知，他们职业晋升的可能性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一个有抱负的天主教徒渴望在官员阶梯上升迁，那末众所周知，他达到一定的地位时就会受到阻碍。这种地位可能是一个处长的级别，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当上个副司长。同样的，对于一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医生来说也处于这种情况。想要升迁的人，必须在自己一生中的某

个阶段加入党。他们加入党——实际上处于被迫的——使党的思想一致性遭到削弱，使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集团的某种组合体。”许多天主教徒还认为，天主教会现有的刊物不能满足需要，不论在刊物的种类上或刊物的数量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从一切公开的材料（红衣主教斯泰凡·维辛斯基的布道讲话、主教团会议的决议、呈送给议会的议长的请愿书，以及各种以社会政策为题材的文章，等等）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主教领导在70年代后半期采取了同国家进行有限合作的战略。教会挑起的在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的对立因素经常在这一战略中得到反映。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所鼓吹的对祖国命运的共同责任感——这一调门在教会的各级组织机构中是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战略正确性的论据。这样一来，干涉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下子变成是以民族动机为依据的了。这样的动机在社会上能够激起广泛的同情当然是易于理解的事情。至于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把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的保证视为建立国家同教会之间非对抗性关系的有利出发点。我们真诚地希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双方产生成见、对立和“固执己见”。我们认为（完全正确地认为），任何反教会、抑或反宗教的斗争在波兰是绝对不需要的。坦率地说，在70年代我们对教会的政策作了明显的修改。可以说我们变得更加明智了，变得更为聪明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满意地接受红衣主教关于教会对国家的命运负有共同责任感的保证，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即承受着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压力的人们担心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对社

会的情绪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从教会的保证中看到了维护波兰安定的一个保障。教会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几年来教会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这种种机会能够使它以捍卫民族利益的力量的面目出现——对政权施加自己的压力。教会把自己设想为唯一的捍卫民族利益的力量、一支有效的力量！我们以修改宪法的历史为例。我在“令人深思的十年”章节中所提到的种种抗议，当时曾被人们视为是些无所谓的现象，从根本上不予以重视。但是，当红衣主教提出一份反对对宪法作某些修正的备忘录时候，这些抗议就不能被随意对待并被提上了议会的日程。再举一个例子，1977年，向议会呈送了“接收和经营农业不动产”的法律草案。这份草案是仓促拟定的，如其他许多草案一样。它的有些概念理所当然地既在统一农民党的一些党员中，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些党员中引起了相反的意见。有一位参加议会有关委员会会议的议员坚决反对通过政府所建议的这项法律，他就是著名的党的活动家鲁格—希维沃斯泰克。草案的拟定者们把那些反对意见视作苍蝇的令人厌烦的鸣叫。当时，一切情况表明，这一法律草案将被提交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但是，最后却没有实现，因为红衣主教干预了此事。他向议长提交了一份长篇的备忘录，一个星期之后，法律草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教会的强烈意见往往比我们许多同志或同盟者的意见更加受到重视。

只要观察一下教会在最近两三年的活动，就不难发现它越来越充满信心。整个世俗天主教队伍，包括“革新的”《标志》派都表现出这一同样的姿态。上述的教会对党和人民国

家的政策的有效影响的例子，是产生这种自信感的第一个原因。在天主教会中这种观点得到不断加强，即教会在今天至少是一种能够修正我们活动的势力。产生自信感的第二个原因是，认为党对目前存在的道德败坏的大量现象（空前的贿赂现象、酗酒、劳动纪律松弛）束手无策，致使教会成了能够有效地反对这些现象的唯一的力最。

产生自信感的第三个原因是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波裔教皇不仅仅在波兰，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大大加强了天主教会的地位。无疑，波兰教会必将通过一切机会利用这一点。

波兰人当选为教皇，当然是加强了千百万波兰天主教徒、尤其是知识界的内心独立感。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在最近几年里教会不仅能保持自己在国家的地位，而且由于各种情况还能加强自己的地位，那就应该考虑到在我们的同盟者中，在舆论界，官方的负责人和非官方的权威人士对教会的好感就可能增长。实际上这不是一种假设。今天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作家不是把党、而是把教会看成是主要的道德—政治力量。当然，存在这种趋向，并不是由信仰决定的，而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即我们的同盟者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指示、命令，越来越不愿意与其说是由党，不如说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的“安排”，不满意进行轻率的书刊检查，不满意经常地改变各种标准，也不满意不善于同作家们进行讨论的现象，等等。今天，可以经常碰到这样的问话：“为什么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同盟者们，在评述我们意识到的关于国家错误政策方面受到限制呢？为什么对教会

的尊重要超过对我们的尊重呢？”在列举70年代使教会的地位得到加强的一切因素时候，不能忽视反对派这个因素。主教团形式上拒绝同反对派建立联系，但是我想在我们的政治家中，任何人都不会认真看待这种拒绝的。

在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之前的半年，我曾经以近年来教会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为题材写过文章。

教皇的访问给我国的现实带来了许多值得记录在案的种种新因素。这一访问表明，波兰存在两种有组织的势力——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天主教教会，而后者在组织社会并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能力。在访问活动中，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尤其是参加谒见教皇的群众对于因维护社会秩序而提出的种种要求，表示出了充分的理解。

有些同志(其中包括耶日·乌卡舍维奇)在评论教皇访波活动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参加谒见教皇的群众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平静、秩序井然以及“高度的自尊感”，应该被看成是几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上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就。显而易见，上述评价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谒见教皇场面的秩序井然，不是出于宗教动机，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在教皇离开波兰的前夕，克拉科夫的大学生在亚当·密茨凯维支纪念碑的下部基座上贴了一条标语：“圣父，请您让我们的祖国成为真正自由、平等的人的国家吧。”我认为，这个口号最准确地表明了许多参加谒见教皇者的感情。

在有关以教皇访问为题材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政治》周刊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来信，从这些来信中可以看到，天主教

徒们的注意力首先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我们的政策给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规定了什么样的地位？教皇访问之后，波兰的天主教界人士期望党的政策能使他们目前的社会处境变得更好些。如果我们不去满足他们的期望，那末就应当考虑到对我们的不满会日益增加，会越来越把教会看成能够强迫人民国家作出决策、保障天主教徒充分地和不受拘束地行使宪法中规定的一切权利的唯一政治势力。由于教皇访波的结果，还应考虑到，目前天主教中的各个政治集团的信心也在增长。天主教议员们依靠社会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依靠红衣主教和教皇的威望，肯定将要求增加天主教议员的席位。可以估计到，他们将不会仅停留在满足这一要求上。不能排除在最近一些年里，这些集团不再局限于在议会上发表批评性的演讲（天主教议员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议员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可以发表批评性的演讲!!!），而且还将进一步提出进行较量的纲领来。

概括我们的种种思考则可以得出结论，70年代后半期在国家的政治格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即目的在于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权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的种种压力，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断产生影响。这些压力不是毫无效果的。

在谈论天主教世俗集团的发展时，值得对“帕克斯”协会作一些说明。博莱斯瓦夫·皮亚塞茨基在他活着的时候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希望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某个时刻表示同意把“帕克斯”协会改变成为亲社会主义的天主教政党，而他对于同天主教主教团的任何合作都不加以考虑。他们之间

以往的成见太深了。博·皮亚塞茨基死后(确切地说是在他生命结束前的一刻)，“帕克斯”协会的许多活动家由于考虑到新的政治情况,才开始认识到同天主教主教团进行合作的方向。“帕克斯”协会新任主席雷沙尔德·赖伊夫受到了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接见,不久他就在“帕克斯”协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1979年5月4日)上发表了一篇对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的颂词。“他的使命”,雷沙尔德·赖伊夫说道,“(今天)闪耀着赢得最大成就的光辉……这是必须加以全力强调的”。“帕克斯”协会越来越清楚地强调自己的宗教特征,发展其组织机构,并正进入一个成为强者的阶段。波兰主教们如果忽视了“帕克斯”协会队伍中种种明显的新倾向,那末他们的政策就不会是成功的。“帕克斯”协会在有利的形势下可能成为一个基地,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世俗的、同时又处于主教团影响之下的(宗教)政治集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譬如说,如果红衣主教维辛斯基鼓励那些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波期间维持社会秩序,显示了自己高度组织能力的教会服务人员去参加“帕克斯”协会的行列,那末力量对比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这在今天还仅仅是一种假设,可是谁又能向我们保证,明天或者后天不会成为事实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帕克斯”协会还有另外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情况,例如,它解体成为彼此对立的几个派别,或者改变成为左派天主教政治运动——这就使它必然同天主教右派进行斗争。

我们就是带着这些新的潮流进入80年代的。由此产生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最近10年内党的领导作用在波兰社会上不仅能够保持,而且还能够

得到加强。其次一个问题是：在继续现行执政方针的情况下，想保持党的这种领导作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因此，除了我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的在管理国民经济、领导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应该实行必要变革之外，还应当认真思考现行的执政模式是否继续适合的问题。

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样一种政策可能是适当的，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政策的核心思想是“给予作为机构的教会少一点自由，而给予作为公民的天主教徒多一点自由。”党应该在最近期间制定出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则，并且诚恳地将它提交给天主教各界人士。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末在天主教徒中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倾向终将进一步加强，而这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将利用教会的支持来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这种发展方向必将导致在波兰出现全新的政治局面，这是无需多说的。明确地规定我们同教会和天主教徒的关系仅仅是80年代我们在执政方针方面应当进行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想使教会远离政治（不否认它在民族生活中的稳定地位），如果我们想击败反对派，如果我们想大力减少出现天主教政治运动的可能性，那末我们就应同世俗的、同其他非宗教性的政治势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波兰处于这样一个幸运的局面，它无需为此目标而建立各种新的组织或机构，因为在波兰已经存在这样的组织和机构。

这种伙伴关系会自动吸引伙伴们对具体政策和国家的命运共同负责。当然，这种伙伴关系必然在统一工人党同它的同盟者——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以及参加民族统一阵线的那些世俗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中引起根本的变化。改变这

些关系的出发点应该是放弃对我们同盟者，特别是对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监护作用。在实践中，这种监护作用表现为对我们的同盟者的每一步行动都进行监督（直至批准这些党派各级机构做出的人事决定），表现为我们的领导人对于他们在“计划”之外的“独立性”现象深感受到冒犯。然而，我们的同盟者今天却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要求赢得这种独立性。

因此，根本的立场应该是采取真正尊重我们同盟者意见的原则，对他们实行开放政策，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程度的界限，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会晤和谈判的途径来加以确定。诚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需要懂得这是唯一明智的出路。这不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如此。同盟者的独立性应该包括：他们在各党派协商委员会和议会中，或是在各级人民委员会中都可以就经济、社会和其他政策提出供抉择的建议。

当然，他们的建议如同其他一切建议一样，也是供讨论的建议。我认为，独立性程度的界限问题是最为重要问题之一，但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前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我们期望朝着建设一个政治和世界观单一社会的方向发展，那末就这个题目的一切讨论都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不论在今天抑或明天都是个多元的社会，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力求对现行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模式进行变革。

这些变革也应该包括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变革。至于说到议会，应该放弃过时的选举

条例,以及进行根本性的、当然不是装模作样的变革,使议会正如宪法所宣布的那样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工作方法上进行变革。值得重视的是,1971年关于改革选举条例的想法对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机构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但这个想法很快被抛到一边去了。议会对它所选举的政府应该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不仅在议会各个委员会中,而且在议会全会上都应起到这种作用。迄今为止,在议会会议上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每一个批评实际上都不可能出自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同盟党派的议员。至于说到各个委员会的会议,众所周知,每个比较尖锐的批评都会在部长会议大厦引起不满的嘟哝。老实说,政府同议会的合作并没有为议会创造条件,以履行其一系列重要的任务。许多法律草案都是在辩论前不久才提交议会,排除了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平静而又中肯评价的可能性。议会理应大力扩大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范围,例如,一切大的投资项目都应该是议会关心的事情。因为一般说它们都使国民经济承受很大的负担,所以每一个重大的投资决定(例如:北方港,卢布林煤矿)都应该在议会讨论之后才能作出。当然,我想的是真正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当然允许对提交的草案进行批评。

当前议会的工作作风受到社会上不少一部分人的批评,而议员们则被看成是组成投票机器的一群人。对议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要求改革的愿望,可能被看成是想削弱党的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政府的工作中也有所反映)。这两者之间根本毫无共同之处。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党的领导。事情的实质在于,我们期望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党的领导作

用。只有以说服和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等方法来取代监护和发号施令，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议会的意见同样涉及各级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选举条例应该是民主的，还应当考虑扩大人民委员会成员的代表性。例如，要考虑是什么障碍使得一个教区牧师不能当上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一个主教不能当上省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向我们的匈牙利朋友学习呢？人民委员会应当对自己地区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就意味着它应大大提高对自己地区的行政机构的监督作用和对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要求。人民委员会在我们政治体制中的目前地位不允许它们去完成那些选举中所提出的任务。事实上它们成了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在社会意识中，人民委员会并没有作为人民政权的中心而行使其职能。

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就要求为恢复波兰合作制的优良传统而作出巨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由于在中央政权机关出现了一种“迫切需要加强人民政权”的理论，很久以前已经被限制发展，而且被如此竭力限制发展的合作制运动，则再次遭到阻挠。各种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自治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假象。当然，要使这种实践做法发生转折，就不得不象对待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那样放弃我们对上述各组织的监护职能。处理一切大小事情、批准每一项人事决定的僻嗜、欲望，导致对各种组织领导机构的选举进行操纵，以便使“我们所不喜欢的”某人不能蒙混进入领导机构（但是这往往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看法）。这种嗜好、欲望简直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现象，这很值得由社会学家来进行研究。恢复自治也必须包括

所有的其他组织——工会组织、各社会组织。由于对那些组织实行严格的监护,以致使它们的积极性消失,政治意义大大削弱。结果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讲坛上发表的任何一点比较大胆的批评意见都被认为是非 常事件。政权机构把这样的批评意见看成是异端邪说,并动 员人们去“进行反击”,而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这位敢于“说 点什么”的人视为英雄。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样做既不是异端 邪说,也不是英雄行为,只不过是履行公民的或职工的义务 罢了。

群众性最广泛的劳动者组织——工会,在伙伴关系中应 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人民波兰发生的、工人阶级同人民 政权之间的一切冲突的经验表明:工会在劳动者和政权机构 之间没有起到真正的调停者的作用。在两次重大的冲突 中——我说的是 1956 年冲突和 1970 年冲突,政治形势大致 如下:一方主要是依靠治安力量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另一方是 示威的群众,一般情况下其中不乏冒险分子——遇到这种局 面是常有的事。可以设想,大部分示威者当然是工会会员。同 时也不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上街示威之前为什么不 去找自己的工会领导人,不去向这批领导就他们认为是不公 正的经济决策和其他决策提出坚决的抗议。因为在许多劳动 者的眼里,工会作为一个组织总是站在“政府一边,或是站在 经济行政机构一边”,他们不管这些机构所作的决策是否符合 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

工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将跨入自身存在的第 5 个 10 年期间——中应该占有的地位是我们进行思考的主要问题,

这也就是用自治来取代把工会当作传声筒（一般说这种传声筒只有单方面的作用）的观点的问题。显而易见，党关心涉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部事情和问题的時候，重新调整工会在我们社会政治制度中的位置的工作才是具有意义的。如果最近期间能够进行这种讨论，而讨论的结果又能导致关于改革现行工会章程的意见获得通过，那末接着就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工人自治将怎么办？

这样勾画出来的一个执政模式，当然还是非常概括的，然而却有可能导致出现有利于波兰社会主义前途的如下局势：

1. 把关心国家发展的共同责任感真正置于国内现存的一切赞成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肩上。
2. 保证不仅由上而下、同时也由下而上的更大自由的思想交流；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下面的意见只有强化到无法阻止的时候，才有可能传到上面去，而这种穿透力发生作用往往太迟。国家发生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危机就是佐证。
3. 削弱教会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可能性。
4. 大大削弱反对派势力的影响，同时限制其进行活动的可能性。

上述执政模式的反对者们一定会提出许多相反的论据。可以预料，他们大部分的反论据引自过时的东西，引自以专断方式执政时期的经验。然而，我们关心的首先是未来——80年代。如果有人认为：在一个上千年的历史是在地中海文化强大的影响下形成的、而近二百年中又受到过法国革命思想影响的国家里，在一个拥有强大的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在一个有100万人受到高等教育、500多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国家里，现行的执政模式可以无止境的沿用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如

果在最近年代中我们自己不善于对执政模式进行种种变革，使其能够符合社会不断增长的真正共同管理国家的要求，那末生活也会迫使我们去这样做（有一种观点认为，管理的才能是一批专家的事情，包括经济专家和政治家，他们“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一切”而显示出不同民族中的其他人，这种观点是如此的不严肃，简直是不值得一驳）。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因为不愿意革新已经过时的各种结构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代世界朝着加强多样化，而不是使之同一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倾向不仅出现在全球范围内，而且也出现在每个国家的生活中。波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是例外的。

以伙伴关系为结构的执政模式观点并非是笔者的重大发现。实际上，它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1971年2月）的讨论中和当时通过的工作纲领中，以及（主要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里，都不难找到。当时通过的一些决议和党的主要活动家的许多公开言论所阐明的主要内容中，有下列一种见解：官与百姓享受共有的、同等的民主；又遵守统一的纪律和具有共同的责任感。然而，为了使一些负责的领导同志免于被指责为惯于放弃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口号并无视其引起的后果，我想加以说明的是绝对不能小看这样一类的问题：如果反社会主义的自发势力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伙伴关系，那将会怎样呢？总的说来，我们是否会背离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呢？尽管——我们承认！——这种模式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和阵地遭到削弱的起点在何处呢？这类问题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一方面，站在原地不动，或者躲在已经夺取到的阵

地里，同样在社会的内部也不能排除政治的各种动乱和削弱我们工作效率的演化进程。因此，只有充分讨论这一初具轮廓的思想认识，认真研究一切赞成的或反对的意见。

大概在90年前，恩格斯在倍倍尔的书信中谈到了（社会民主党）党的报刊的方针问题。他写道：“你们在党内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过去给予的行动自由不仅足够了，而且由于规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处。你们自己同时也使党对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在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①

我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党的刊物问题的思想方法，可以用于我们的思考之中，即思考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执政中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页。

第三章 立场和习惯

教育的成果

我们对波兰——它正面临又一个新的 10 年——进行思考的时候，不能回避波兰人当前的教育水平对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及对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评价国内外发生的许多现象所采取的标准的影响。

波兰人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带来了社会成果，在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到几个根本性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经常提起它，是为了说明我们建设和创造的一切是多么伟大——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 8 万。1928 年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 100 万，增长 11 倍多。同一年的年鉴指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中等文科教育和职业教育——超过 500 万。即使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中等和高等教育面向民众的深刻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曾一度使教学水平下降，然而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现在我们已拥有了巨大的智力潜力。这样的局面在波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必须补充一句的是，这种潜力还在逐步增长（可惜的是，由于计划不周到，越来越多的文科毕业生用非所学）。

100 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兰人和 500 多万受过中等教育

的波兰人，无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成就之一。我们教育制度的民主特点，使得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有才干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机会。

一位有影响的、能为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关系创造最有利条件的政治家，不能不经常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人才使用的情况如何？许多有才能和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人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国民经济领导体制成了充分利用他们所积累的知识的实际障碍。一位《快报》周刊的政论家在写到日本的情况时说，这个国家已经认识到了人才流向国民经济部门的好处。他写道，“作为人类唯一的、真正的资本的教育水平，是日本成功的源泉之一……‘日本企业化’的神话归根结底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受到很好教育的人这一资本……”我们也拥有这样的资本。

关于没有充分利用受到教育的波兰人的知识的观点，不是在最近 10 年内产生的。在 60 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本 10 年的头二三年里没有听到过这一类的埋怨。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时期里，党向人民提出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纲领，不仅预示了经济生活领域的根本变化，同时也强调了我们的意志，要从社会生活中坚持不渝地去淘汰一切限制每一个创造者的主动精神的做法。党处处要求社会积极参加制定加速国家发展、加强和深化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方案。波兰知识界带着关心和充分满意心情接受了爱德华·盖莱克的演说，他在这些演说里号召人们要具有“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和“进行创造的不断工作的

热情”。

当时知识界的活跃，成了国家加速发展的根本因素。那是党的伟大成就，预示了我们要走上一条最大限度地利用1945年后在波兰实现的伟大教育革命的成果的道路。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当波兰开始以专断的方式作出经济和社会决策的做法有了明显的发展时候，当顾问和专家们不过是起到装饰作用的时候，起初一度在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活跃气氛便开始消失了。有人把这看成是波兰“稻草火焰”的一个典型例子。但是，党的领导不认为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适当的，即他们——作为领导力量——的活动是否偶而导致产生（从解放一切创造力的观点看）这一不利的形势呢？如果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对70年代波兰社会上非常重要的几部分人的政治意识作出似乎是有趣的结论。

这是一些什么样有趣的结论呢？在数百万受过教育的波兰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越来越多了。因此，他们是在人民波兰成长起来并受到教育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绝大部分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六年计划期间大批涌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他们是属于战时的一代人。他们上大学的准备不足，疲惫不堪，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现实的概念。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要比70年代年轻的波兰人少得多。他们要求不高，没有想到欧洲旅行，没有幻想小汽车和舒适的成套住宅，他们不知道消费这两个字的概念。他们把权威当作自然的事物来接受。他们毫无任何反抗地站到那些写有同富农、帝国主义、马铃薯病害甲虫、国内反动派进行斗争等等口号的旗帜下。他们获得的知

识水平没有 70 年代的波兰人那么高。如今，50 年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也是六年计划的积极的共同制定者，都已经“接近”50 多岁了，而 60 年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也都是 40 多岁的人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多数都参加了制定国家发展方针的有关工作。但是，在他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力量的一群波兰人，这些人在大学的校园里和中学的高年级时代遇上了十二月事件。他们是波兰工人党党员、波兰社会党党员、华沙起义者、“商业战役”的参加者、诺瓦·胡塔钢铁联合企业建设者那一代人的子女，他们不同于自己父母的是具有更好的职业准备，能更好地完成委托给他们的职责。他们同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如果他们对工作条件不满，那么就不仅仅满足于批评迟钝的工长或笨拙的主任，而是要探索更高领域的问题。他们的探讨精神首先是政权的职能机制。每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或政治的比较重要的决策，都要受到他们批判性的剖析。如果他们发现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的态度是尖酸刻薄的，甚至是不怀好意地进行嘲弄的，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言词和保证。他们对一切观念或是抉择性的建议都公开表明态度。这不仅是对波兰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而且也包括国外出现的一切观念和抉择性意见都采取这种态度。在这一代人的视野里可以找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模式观念，例如匈牙利的模式观念；欧洲共产主义所宣传的思想和纲领；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组织原则，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方式和政治结构、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工具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的生活方式，等等。当

然，这并不是指整个一代人都是这样的情况。然而，以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所有人都以同样的程度来关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局面。

在本 10 年里，受过教育的波兰人——他们构成了庞大的生产大军的队伍——以及那些还在高等学校学习的人，在评价自己的情况和国家的形势的时候，喜欢使用比较的方法。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而且越来越经常地同社会主义国家作比较。这是本 10 年的很有特点的新现象。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也使用比较法，主要是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从而引起了党的宣传战线的领导的关注。今天，形势的变化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从现行的宣传模式的观点看公布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情报，在政治上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使用比较法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同 60 年代相比不同的是，在本 10 年中有数百万波兰人在使用这种方法。这是党在十二月事件后的政策的功劳，这一政策明显地扩大了波兰人同世界的联系。不论是公务出国还是旅游出国，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数百万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是个事实，显然，我们每一步行动都应考虑这个事实。我们如果忽视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就会加深。人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表现在一系列方面：表现在越来越重视社会正义上（特别是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表现在评价一切有关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决策时使用的标准的合理性上；表现在越来越轻视不合理的种种口号上；表现在越来越严格地要求言行一致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执

政者不能“说话不算数”）；表现在要求真正共同管理国家、随时准备对国家的发展共同负责上（但是，只有在满足了前一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表现在越来越关心整体、而不是仅仅关心本职工作上；表现在越来越自信上；表现在趣味和态度的千差万别上等等；也表现在随时准备承认真正的权威这一问题上。

由于教育革命的成果，波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一年比一年更加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更加认真，更加详细地对政权机制进行研究。这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赞成社会主义，然而却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的剖析来表现的。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迫使波兰人放弃自己决定自己对待社会主义态度的这种方法。

在70年代后半期，波兰社会上受过教育的和有思想的那一部分人不是对社会主义提出异议，只是怀疑许多管理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党的责任就是消除产生这些怀疑的原因。如果我们担当不起这一责任，那么或迟或早，在不断增加着的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大军中，就会出现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改变局面的力量。

知识分子队伍

在70年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小，然而这一发展也使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增多了，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总结。党和社会上一部分政治态度积极的群众都必然要从知识分子所支持信赖的知识界领导核心那里获得

对许许多多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答案，这种种问题是在实施纲领性计划原则过程中产生的，或者涉及到我们没有预料到而产生的那些事件和局势。

那么，这种种计划之内和未能预料到的问题和事件有多少？我们从中得出了多少须向党和社会说明的结论呢？数量肯定很多。可以举些主要的。那种使专业农户、也就是使农民致富的方针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致富的界限在哪里呢？信仰与政治之间是什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呢？在最近 10 年中对天主教教会的地位问题有何想法？即将来临的 10 年中波兰工人阶级状况如何呢？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态度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党、管理干部、工会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等等。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容许的最大差别是多少呢？目前存在的分化状况是否破坏人们的感情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有什么样的界限呢或者说是否应当有一个界限呢？赋予党宪法特征这一事实对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民族的好高骛远正在构成对我们的威胁吗？等等，等等。

这类问题还可以提很多，但我想说的毕竟不是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我们的回答是否会得到有关方面的赞许。我不认为对于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可以作如下的回答：当然，我们有某些缺点和弱处，但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生活的搏动是加速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专家、科学家、创作人员的态度是极为积极的。不过，在本 10 年中产生出有趣的作品和提出有意思的理论总结的这块土地上，耕

耘得并不是很好，非常浅、同时又没有使用适当的工具。

在本 10 年的开头时期，要求立即着手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大堆，我们实际上是全力以赴了。必须迅速作出决策。但是，集中精力抓决策，我们亲身感觉到这是不够的。所以在十二月（1970 年）转折之后的头二年成立了许多由政治学、法律、国家学说、历史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的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组成的团体、委员会，这不是偶然的。这些团体、委员会和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因此，人们曾以为这种现象会永远存在下去，人们曾以为当时所开始的这种思想活跃会创建一支党的知识分子队伍。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场运动失去了它的发展趋势。然而，是否必须如此发展呢？

也许波兰需要经历一个使务实主义占有荣誉位置的时期吧？然而，我们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思想灿烂发展的时期，我们还把这些灿烂的思想传播到了外国。但后来又怎么样呢？它为我们“赢得独立”没有帮多少忙。如果存在上述这样的看法，即使是非公开化的，那也是错误的。任何真正的政治，包括日常所经历的政治和远景的政治，没有知识分子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发展的，这对波兰来说尤其是这样。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的民族在自己的思想中和行动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只讲务实主义的民族，它总是高度重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总结的。这是由一千多年的历史把我们铸成的。我们的先辈也的确十分重视创造性的探索。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政治条件下，从波兰的左派势力中也产生过在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令人十分敬仰的人物。有一大批社

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是一批杰出的政治作家、理论家和政论文作者，写出了铿锵有力、富有说服力的争论文章和令人敬佩的总结。这些著作不是拾人牙慧，不是拾人唾余的平庸之作，也不是毫无特色地重复别人的话。人们曾经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听取他们的演说。他们的言论曾经是热烈争论、甚至激烈争吵的题材。而且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是如此，在工人中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讲，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知识分子运动。

今天我们说，这些人已为我们建立了美好的传统。这倒是事实。可是在这一传统和今天之间是否有一条稳固的桥梁呢？肯定不能说桥梁，最多只能说有一块木板，而且是一块很窄的木板。我们常常大谈活跃思想生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可别自欺欺人！发表文章数量大，根本不说明它们都有质量。成千的文章，对劳动人民来说，犹如大河中的流水在他们身旁流过。从何处可以找到引起激烈争论、激发热情的文章、作品和书籍呢？更有甚者，在我们的活动中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就一些政治、社会等重要问题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往往是领导层的同志。今天，当这样的人发表文章（这种现象近几年来已越来越少了），那末人们就知道，那只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而且往往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政论文章，使用的是圆滑的词藻，而且几乎都苍白无力，可它们充斥着我们的报刊，象野马一样横行无阻。其中许多文章，如同不少公开报告一样，都是一些按照一些固定格式写成的平庸之作。我们的口头辩论，例如在议会中，显得笨嘴拙舌，甚至使人受窘。从根本上讲，我们已

经忘记了什么是政治斗争。如果我们认为需要争论——例如同《标志》派议员争论——，那末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只会采用警告和使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您说得不对！”然而，“争论”必须事先商量好，要以真理和采用温和的态度来压倒一切。可我们象是一批掉光了牙的老翁。偶然，在党的报刊上也许会象陨星一样掠过某些令人较为感兴趣的東西，那一定是有人冲破了现行的公式。正是这种公式有效地压制着政治作家，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家和政论文作家向未被研究过的、充满问号的领域深入进行探讨的胆量和勇气。人们是无法打入这些领域的，因为在通向这些领域的道路上已经装上了信号灯，这些信号灯难得发出绿色信号，经常亮着的是红灯。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这些红灯亮得特别耀眼。因此，毫不奇怪，在这源源不断的政论文章洪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谈论一些枝节问题。这样的著作是不可能赢得巨大社会声望的，其作者也不是社会所期待的。这样的人只会激怒社会，使人们生气，但同时也迫使他們去思考：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构成了党和知识分子的队伍，是这样一些人在抬高党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党必须每天都为赢得社会的支持而奋斗。谁如果认为争取民心的唯一办法和最有效手段只是给予物质利益，那他肯定错了，尽管物质利益给得也不多。

前面提到的那种公式也导致产生了写文章吞吞吐吐的特殊习惯。写文章的人在提出一种较大胆的思想时，总是拐弯抹角、想方设法来掩饰它，指望读者自己有很强的理解能力。让我们想一想，要是物理学家在一般公式中有某种新的发现

也遮遮掩掩。那么技术进步会是什么样呢？物理学家不可能这样做，但搞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人员却必须这样做。有人暗暗地用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向他们进行提示。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一个编辑人员和政论文作者的经验。我本人有多少次划掉了别人写的东西，或者别人把我写的划掉了，用那些维护这一公式和宗教戒律的人（这样的人倒也不少）的话说——不符合他们对正确与错误所理解的思想。

对本 10 年中所执行的文化政策也需要作出批评。文化政策的制订者们，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排挤那些最有才干的创作人员，而一味热衷于依靠才能一般的作家和一个劲地提拔那些只有唯一特长——听从使唤——的庸人！这样的政策，无论过去和现在，从我们民族利益考虑，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一种不允许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财富的政策。

我们正在沿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前进。我们党需要有开拓性的、充满生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党需要善于对十分复杂的现实生活一再向我们提出的大量问题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回答的理论家和政治作家。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勇敢尝试摒弃当前的做法，那我们将面临对它们束手无策。党应该培育一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酵母”。只有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我们的实际目标——局部的和全局的——才不致于是“鼠目寸光”的。但是，知识分子，也包括艺术家，如要施展自己的才干，成为党和人民坚强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为政治家们提出能够在其政治活动中值得加以利用的分析和总结意见，那他们必须信服：1. 他们确实受到了象伙

伴一般的对待，而不是象服务合作社中的伙计；2. 政治家要尽一切努力使上面提到的红色信号灯尽量少开一些；3. 他们有权利犯错误；4. 与众不同的观点不能成为他们犯了七大罪状^①的依据。

我们是否能够在最近 10 年中有所作为，避免人云亦云和高谈阔论等？对这样的问题目前很难作出圆满的回答。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再继续埋头于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公式的禁锢之中，那末迟早会有人去关切当代的重要问题，并向我们作出回答。这种回答也许违背社会主义的原则。

责 任 问 题

在大多数波兰人始终感兴趣的问题单子上，责任一词肯定名列前茅。政治家、政论家和科学工作者经常就责任问题发表意见，在党的、工会的、家庭和其他的会议上人们讨论责任问题。几乎每天、每一步都可以听到号召加强责任感的声音。人们既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同时又在局势安定的时期，都谈论责任问题，并就此发表文章。例如，责任问题是 1971 年 2 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既然人们就责任问题讨论和写得那么多，既然它总是一个现实的议题，那么便无可辩驳地产生一个想法：显然，这是一个令我们非常头痛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

^① “七大罪状”，是 70 年代流行于波兰社会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弊端。——译者

我们不会给予如此大的注意力。

那么，这一责任感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对于形势并没有产生这种判断，即引起了我们的不满。70年代波兰报刊就此题材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出自反乌动物，即不断重弹老调的那类记者之笔，还有的则是很多政治家的讲话。从这些讲话和文章可以编制一份舆论的目录，老实说，是一份自相矛盾的舆论的目录。这简直是一部最经常重复的老调集。在波兰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均不负责任……因为有150年波兰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波兰人也就不需要加强什么责任感……波兰人是炽热的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因此把责任感视为自己的命运，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应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有责任。波兰人喜欢谈论责任感，但是涉及到具体责任时他们则推给同事或把视线向上——一切坏事应由上面负责……既然大部分决定，无论是大的抑或小的，都在高层、经常是在最高层作出的，因而下面就不能完全负责……我国管理和领导国民经济的体制就是这么一种类型，它不利于追究个人责任，总是可以躲藏在规章、决议等等的后面……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个人的责任溶化在集体责任之中……要追究责任很难办，因为没有严密的法律界限……关于基层以及中层领导机构的责任说得很多，关于最高层的责任问题谈得很少。

我同这些舆论中的任何一个舆论均无关系，甚至我也不认为仅仅其中的一种舆论是中肯的。似乎每一种舆论中都含有一部分真理。然而，我无意就每个波兰人对国家命运抑或

赋予他的那份工作负有责任问题撰写批评性的学术著作。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题目上道德课。正如经常说的，每一个具有公民责任感的波兰人应该为人民波兰的进一步全面发展而作出努力（在这里，接着就是具体的任务和目标的问題）。

关于责任问题，我想必须透彻地加以说明，因为在阅读所有谈论这一问题的报刊、杂志时总不能摆脱一个印象，即我们总是在这一问题的几个观点上徘徊，并竭力回避这一问题。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在责任感问题上完全并始终一贯地使用绝对平等的原则。如果社会深信不存在个人的责任感不受追究的领导层，那末处于领导岗位——不仅仅是这样——的每一个人的责任感便变成完全另外一种情景了。波兰社会认为不存在这种平等的看法并非从今日开始。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地位越高，个人责任感就越难以追究。我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就责任问题发表过意见，格罗什科夫斯基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然而可从文章中得出一种看法：战士和老百姓首先应对失败和输掉的战役承担责任，而指挥官和指挥部则几乎什么责任也不承担。”另一位读者在评论我关于投资战线过长的意见时写道：他感到，他对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困难没有责任，因为他没有签署决定。他写道，有计委、政府、中央委员会，因此正是这些地方决定给什么人、给什么单位以投资。克拉科夫一工厂的工人在1978年12月底给《政治》周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

“关于我们社会所有的痛苦，我片面的看法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应对人民中目前松懈的状况负责……对工人可

以在每个小时和每个岗位上进行监督，并且做到这一点无需特殊的本领。然而谁对我们的领导实行监督呢？

谁制定各个项目和各级的计划呢？

谁制定方案、进行购置、实施投资呢？

谁来考虑经济的基本原则呢？

谁购买专利，引进多年被搁置不用、挥霍浪费、老化却不能用于生产的机器呢？

谁建设那些多年未竣工、尔后又被陆续偷光的工厂呢？谁拿国家的钱财进行试验，谁决定给予那些有关的人优先权，并保证向他们提供材料、生产加工能力和积累的呢？

难道工人对某些商品匮乏、某些商品过剩承担罪责吗？

为什么直到不久前，波兰人还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家、现在也仍然热爱着它，然而劳动却又如此之差呢？这是怎么可能的呢？怎么会导致如此失控、酗酒和道德败坏？是否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工人，还是在于具有决定权的人？”

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对责任问题的看法。

如果党不想对现实熟视无睹的话，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上述的反对意见，并考虑给予令人信服的答复。仅有一种答复，那就是要改变人们现有的感觉、认识，而且还要对每个波兰人责任感的加强产生影响，也就是要懂得在我们的人民国家中，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责任以及领导集体的责任必须坚持不渝地受到监督。我们不是为上帝涂脂抹粉的人，也不是对上帝和历史负责，而是对劳动人民，对那些从事艰苦劳动并依然生活困苦的劳动人民负责。参与执政不仅仅是一种光辉的经历，获得崇高的声誉，更重要是完成一系列非常不容易的

职责——特别是道义上的责任。当然应该想到指挥官的责任比战士的责任确实大得多。

上面所概述的主张需要通过某种评论来加以实现。这对于许许多多人来说就是对他们责任感的监督，不等于把一个人从其所占的岗位上撤下来。这样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是不能排除的——考虑问题一切取决于错误的大小及其经济和社会后果，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撤职，而在于当众认错（如果对某个人虽然提出过警告，他依然重犯错误，这可表明其无力改正错误，或者是不乐意听取有关自己责任问题的批评意见，只有在此时，才撤其职务）。社会想了解谁对错误的投资、使千百万人的生活造成困难的决定、计划中的失误、暗地里涨价等具体做法承担责任。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无可辩解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局一再采用“超过了投资计划”、“超过了工资基金”等等无人称的概念来表述事情，使社会上这样一种信念不断得到加强，即“上面”想对什么人隐瞒自己的责任。因为这种无人称的表述在广泛地运用着，而我们对困难原因的评价往往与它不相协调。它们为小道消息、臆测、往往是没有根据的怀疑敞开了道路。这样的管理风格，确切地说推诿责任的风格不能再持续更长的时间了。在人民波兰出生和受过教育的公民数量一年年地在增长，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在追究责任方面越来越顽强地要求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尤其是针对那些在我们国家中担负领导职务的人。

下面谈谈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象一台旧机器那样结构松松垮垮，和发出支离破碎的呼叫声，那末要求每个波兰人增强责任感的呼吁就只能是无

效的空话。假如不是质量而是数量决定计划的完成与否，假如工人得到的原料比预想的要坏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的话，那么就不能每天反复号召人们加强责任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不值得多费口舌。对国家来说情况与此相类似。假如在某件事上对公民不公正，那末我们就不要指望他们会对国家的命运感到有共同的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以漠不关心，甚至高高挂起的态度来回答。

会议和委员会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会议获得了社会的公认。它是在种种场合下人们愿意利用的一种习惯做法。各级国家机关、党的组织、工会组织等都举行会议。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会议将是什么样的情景。看来，会议的倡议者在召集会议时，大概相信按报告——讨论——总结（经常是事先写好的）的传统模式进行的一天会议，对会议的参加者起到一种动员的作用，可以激励他们进行更为积极的活动，以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报告，还有讨论时的发言和总结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公式。通常第一部分是列举成就，第二部分谈困难，第三部分，即结尾部分是结论。报告经常是很正确的，同时又往往是非常一般化的。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例如，在全国讨论能源形势的会议上，很难谈到切实的东西。讨论中的发言应该是富有道理的和具体的！会议的组织者要求做到这一点！似乎他们并没有掌握自己所领导的经济或社会生活每天所发生的问题的种种报告。不过，让我回避这一情况提出如下一个

问题：讨论者是否当真对会议的题材提供了什么新颖的、新鲜的内容呢？根据多年的经验，我说没有。往往是重复众所周知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坐在主席台后面的人。更糟的甚至作一个小小报告，也要事先征得单位领导的认可或经会议秘书处的仔细审阅。几年前我参加了全国社会经济积极分子会议。在我对面坐了一位弗罗茨瓦夫某联合企业的经理。——我刚刚赶上开会——他说。——为什么？——我问道。——喏，您、编辑要知道，我的发言稿必须征得我的部长的同意。为此，我派了干部去华沙。不走运，他返回时乘坐的火车晚点两小时。假如再迟一小时——他缓了一口气说——我的火车就要开了。——我说——必须同部长办公室就此事取得一致。要知道，您的发言可能华沙等着……

在会议或大会举行前，早早就指定发言人也成为一种规律。领导指定谁该讲话和谈什么题目。

各种会议、会见、全会等等的发言要征得同意或者要通过经这种机会而成立的秘书处的认可，这已不是灾难，而是既为党的委员会、又为国家行政机关所普遍接受的习惯，各种发言的检查员们删掉他们认为不恰当的、“不符合”会议精神的词句，建议那儿加些什么，考虑着强调些什么以及排列发言中提到的姓名的次序，等等。我困惑莫解地观察着这些令人难堪的习惯。在人民波兰第35个年头里，从那些未经审查的发言者们那里会听到什么不好的话呢？难道某一位走上讲台会号召暴动吗？而另一位则发表异端邪说？以这种方式组织的一切会议都是不必要的，实际上把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引向错误。但是，这一类做法在政治上的有害作用还不仅仅如此。

每一次按这种原则组织的会议在会场之外自然又有议论。在那里可以畅所欲言，在草地上叽叽喳喳谈论不休。同一个人刚刚站在讲坛上向我们讲些很圆滑的意见，常常在那里说的则是事情的真相。

谁需要这种做法呢？无论是人民波兰抑或是党，都不需要。我们不应该带着这种不幸的习惯进入 80 年代，因为除了道德上的损失之外，它还降低了我们政策的可靠性。我建议恢复到战后最初几年的状况，那时候同志们走上讲台，说的内容都是受理智和心灵的指使。我们摆脱这一习惯绝非坏事。当发言人在讲台上从口袋里掏出已经写好的讲话稿时，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同志最好表露出不乐意的脸色。其结果我可以担保。在政治上并非都要通过决议。姿态、脸色等等已经足够了。在卡托维兹逗留期间我坚决反对念稿的态度达到了顶峰。有一天，接受几百名青年入党。在授与证件后，一位年轻人走上讲台，将目光环视大厅，把身体转了半圈，以便能看到主席台，把手伸进口袋，从那里抽出几页纸，开始念起来：“……与我们同志们在一起，我深受感动……”我个人当时感到受到了触犯。

我想，抛弃这些陋习，并不需要召开专门的会议。而是直接地废除这一习惯，当然也需要消除这样一种观念：这种习惯是一种好政策，它可以对每一个走上讲台的人进行充分的监督。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无需充分论证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本性。

然而，说到会议，我并非认为它们根本不需要。不过应该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举行。随意召开全国性的和省的会议

是不必要的浪费时光，并且也是把宝贵的金钱扔向大海。

各种委员会当然也成为当局工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成了一种特别普遍的机构。有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一些委员会存在的时间已很长。其他的委员会或刚建立几天，或建立一周，或建立一个半月。最常见的委员会的成立方式如下：在某机关领导层会议上（在此情况下，机关的名称不重要），讨论某一件事。在讨论过程中，主席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多的意见，既然如此，那么提出一个意见：同志们，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等等。这种方式重复数千遍。因此，整个波兰，千千万万的人都来致力于委员会了。他们以参加这些委员会来证明我们政权的集体特征。

无疑，没有委员会不能对付的各种事情。有许多这种情况，某一个特定的问题确实不能由一个人，而是需要集体来加以筹备的。然而，不幸在于在很多的情况下，成立委员会仅仅是为了把早应解决的问题推出去——我们这里有传统的众所周知的踢皮球技术。委员会可以把事情大化小、小化了。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单位的领导，因为由于各种原因自己不想采取决策而成立委员会的。我国数千个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属于单位领导应该办的事情。委员会作为屏风为其服务。如果由专家们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做出“不”或“是”的决策，那末这一单位的领导人懂得：对于决策所引起的可能是不愉快的结果，他就可以平安地对付，因为谁又能预料到“上面”对最后的决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也有这样的委员会，它们通过的决议是平淡无味的空话；还有这样的委员会，它们从未公布过工

作成绩。这些委员会是畸形的怪物。各种会议和委员会的数量应该大大减少，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因为参加这些会议和委员会而常常使那些对于社会来说确实是重要的、富有价值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当看到那些令人高兴的有关召开会议和建立委员会的倡议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这里正在对实际上与现时代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毫无共同之处的形式主义活动进行限制。

活 动 方 式

在本 10 年中，可以观察到被某个政治活动家称之为政治生活戏剧化的实际盛况。实际上，外交部所采用的外交礼仪被引用到党和国家生活中来。不仅需要几十个人去迎送重要人员，而且还要按事先安排好的模式进行。在这个模式中，每个人都有指定的位置。自己不能随便改变。领导人视察工厂、机关和学校时，被一大堆侍从人员包围着，实际上无法同群众进行诚挚的谈话。值得注意的是，同领导人谈话的人也是事先指定的。本 10 年初的 1972 年，一个大投资项目的负责人告诉《政治》周刊编辑部说，在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同志进行访问前的两个礼拜他就接到指示，要他指定几个谈话人事先站在被接见的群众之中，提出事先确定好的问题。再举一个“摆布”人的最明显的例子。1978 年，爱德华·盖莱克会见什切青造船厂工人。原定在 13 时会见，11 时就把人们赶到大厅里进行迎接尊贵来宾的总演习，演习时高呼口号，规定了何

时应当鼓掌，等等。正是这同一个造船厂，8年前，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同造船工人们进行了重要的真正直接的谈话。可惜的是，地方上对领导人的视察进行预先导演已变成了不成文的法律。

在党内生活中，称职呼衔之风也曾风靡一时。比如，只称呼“××同志”是不够的。每次都要称呼谈话人的行政职务或党内职务，比如说“书记同志”。如果党的活动家比你职务高，那么，在公共场合要称他为“您”，当然还要加上他的头衔。因为权力的尊严要求这样。有些同志把自己手下的人（秘书、助手、办公室主任等）视为仆从，直呼其名或称之为你。当手下有人以同样方式对待他时，则感到非常吃惊。这种“假”老子作风完全不是党内生活中所有共产党员一律平等原则得到加强的证明。这种宫廷作风在党内曾蔓延到如此地步，甚至一个省委书记指示手下的工作人员，叫他们暗中向各种会议的参加者规定，当他步入会场时，所有人都应当起立。人们于是也就都站起来了！

宣传工具向公众报导党政领导同志的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确定的职务排列顺序。甚至曾做过专门的规定，确定各工作岗位上人员报导的顺序。也曾做过特殊规定，规定报纸上哪些版面可以发表，比如政治局委员到地方上活动的消息。对某些有名人物的生辰的报导字数和照片的大小，也有严格规定。

上述对党的生活给以矫饰的现象甚至也表现在葬礼上。在中央书记以至中央书记处这一级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党的领导人中哪些人有权参加杰出活动家的葬礼。在排顺序先后

的事情上,甚至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人员,比如中央某部的部长,在参加各种会议、会见等的报道中,尽管他不是该单位的成员,但他却排在政府部门的部长前面,哪怕政府部门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本 10 年中,我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互相说恭维话和表示感谢、崇敬及问候。看看报刊的报道吧! 国家计委成立 30 周年之际,“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请求塔坦乌什·沃然什契克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部长会议主席彼得·雅罗谢维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为什么不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不向议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国家计委所做的一切。”有意思的是,他们为计委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而应当给他们特别的感谢呢? 要知道,那些同志并不拥有绝对领导人的地位,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感给一些人惠爱,却把另一些人打入监狱。重视计委的作用,为它的工作人员创造好的条件,使其能准确地规划波兰的发展,这完全是政治领导和国家领导人的义务。在这种场合下,那种致敬性的宣言完全是多余的。如果此类宣言不是象雨后春笋般地蔓延的话,我也不会注意它了。只要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或庆祝活动几乎是接连不断的。

公众舆论极其吃惊地注视着党和政府领导执行的为自己授勋的政策。50 岁的中央书记们就已经是人民波兰最高勋章——人民波兰建设者勋章——的获得者了。难道不是早一点了吗? 一级劳动红旗勋章的获得者们经常是那些公众一点不了解、在领导岗位上才工作了几年的人。

特别令人痛心的、也是十分害羞的是某些同志利用占据的工作岗位谋私利的情况。

社会学家的任务是研究那些导致本10年中宫廷生活方式不寻常地演化发展的原因，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同共产党员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所憎恶的。从政治观点看，这种生活方式是与社会主义极相矛盾的，它在领袖和群众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冲突如何形成

在整个政权或其中某些领导成员同全体人民或其中一部分、某些行业、团体、地方，甚至于某些单位之间，引起冲突的方法有成百上千。在古代政治思想历史中，在中世纪、在近代，甚至直到今天，能找到成百上千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一老生常谈的发现的确实性。

引起冲突(不必要的)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引起冲突的人必须具备一系列的精神特点，没有这些特点就不可能同任何人争吵。当然，我们所说的人是有权做出决定的人，首先这个人肯定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人则是不正确的，是愚蠢的，不了解全部情况，看不到远大前途，把长远利益混同于眼前琐事，沉浸于不必要的反复讨论，等等。别人也可以被认为是软体动物，是对生活永不满足的臭知识分子，是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政权应当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个人认为，他比别人更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总是占有全部真理，他总是借助于这些真理来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

做出决定时总怀着这样的信念，正是我，只有我才是正确的，对这一决定所涉及的人都瞧不起，这已成了习惯的自信。但是，我们还是再拿出些篇幅来进一步研究一下引起冲突的人的精神特征吧！从现实生活中找出的例证更有教育意义。

诚然，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可以引起冲突。但是，有一些特别容易引起冲突的领域，即干部政策，文化政策（尽管评价艺术创作的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的标准是非常不固定的）以及经济政策。

在干部政策方面造成冲突并不难，只要采用“从公文包里带来候选人”的方法就足够了：这是××同志，从今天起他就是你们的厂长！我们了解他，对他有好的评价，因此，我们认为，他是这个厂长最合适的候选人。当然，也经常是那样，这个人事实上也适合这个岗位，所有人也满意。但也经常出现不同的情况。人们了解到，××同志所以能当厂长仅仅因为他是联合企业头头或者更高的什么人的朋友。在另外一种场合下，“好同志”对任命起决定作用。这经常是一个极其不确切的表述。如果事先征求一下接受任命单位的意见，他们中间是否有能胜任这项职务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感到精神上 and 威望上的一种满足。如果人们能对“公文包里的同志”提出一些进行了解性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实际上参与了共同管理（不用担心，这种提问将不会是“不知趣的”），或者人们起码应当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考核，看他能否胜任领导职务。在实践中，此法很少采用。

70年代后半期，某一个人（称呼是“纳”吧）成了上述政策的牺牲品。当时曾决定叫他担任一个很高的国家行政职务。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很有天才。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听了 he 关于自己的同事、关于一些事件的议论，这些议论充满了嘲弄和讽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悲剧在于，他要领导和监督的单位的大部分人都反对他。因为他已当过几年领导人，根据已积累的经验，这个单位的实际领导人担心，“纳”在新的非常有影响的岗位上将会导致单位的分裂，将会造成紧张局面，等等。问题在于，他无疑是一个可靠的人，但他做决定所依据的论据却使单位的许多人不能接受。观察他的活动时可以得出一个印象，他所掌握的渊博知识妨碍了他同人们的关系。他的创造性的思想使他肯定可以胜任各种领导职务，起码可以胜任委托给他的职务。决定问题的中央机关听了该单位非常出名的代表们的意见后只是沉默，有时仅仅随意附和一下。人们暗地里已打听到，当局并不想让步。该单位大部分人同当局的冲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增长着……整个事情的结果是个没趣的局面。要知道，事情完全可以办成另外一种样子。如果决定问题的中央机关能积极地接受群众的意见，社会主义的波兰就不致于遭受苦难。当时出现冲突的根源在于力图向群众证明政府是有道理的。

遗憾，干部政策经常是按照上述种种情况执行的。

让我们看一看文化政策吧，这里也是极容易酿成冲突形势的生活领域。导致这种事情的出发点可以是，比如使劲地重复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这样一种口号：艺术创作要向我们提供能够激起讨论、迫使人们进行思考的作品，等等。一句话，我们反对令人作呕的、献媚的、驯服的作品；我们还要求要有现代化的题材。这些号召，作者们很愿意倾听。过了一段时间后，

出现了一批电影，不是历史片，而是现代片。《大理石人》影片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瓦依达的电影是第一部清算个人崇拜的艺术尝试，即清算人民波兰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党的历史学家、评论家、政治家很少谈到的历史时期。可以理解，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就能把那些年代的事情给一个完整的客观的表述，这可能需要由几部作品完成。可能10部就足够了，也可能需要20部。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喜欢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每部关于这些年代的作品都会引起争论，这是需要的，但事情的实质在于，为了评价这种影片，应当在没有围攻和武断的气氛中进行。

正象预见到的那样，《大理石人》被认为是各种观点的大杂烩。我不想具体地评价该影片，我仅仅确认一点，似乎电影里没有一个镜头是所有人都赞同的。影片引起了各种意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引起冲突形势的地方在哪里呢？但是，冲突还是造成了。

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们号召大胆地创造，写出引起争论的作品，等等。但是，电影还没有交公众评论，就被认为是虚假地描绘了当时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形势。电影创作者吃惊地问，为什么先前要求写出引出争论的作品，而后又由于作品不符合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观点就遭到否定。作者没有意识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造成冲突形势的原因——决策者的意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只有决策者是正确的，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说来，什么是好的，而什么又是坏的。

显而易见，这位决策者事先就认为，他周围的人赞同他

的立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就肯定会去谴责那部《大理石人》电影。这并不使我感到新奇。他们居于高位而以不容反驳的腔调宣布：安德烈·瓦依达歪曲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十分把握，因为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才使电影禁演了。从今后若干年发展来看，今天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非常可笑的。最初是决定推迟公演的日期，当需要公演时又力图挑选观众，把华沙许多工厂的工人和积极分子拉了来，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些人会高声抗议瓦依达的作品。结果完全相反，被挑选来的观众为电影鼓掌。后来，对肯定该电影的评价和要求给电影授奖的意见进行封锁。所有这些活动并未减低该电影在群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提醒一下，这个电影肯定是一个不同意见的电影，是使观众对现代波兰历史上最困难时期感到骄傲的电影。1978年，瓦依达的这部影片在西欧到处被放映，遗憾的是，它成了政府不喜欢的电影的代表作。

那末，同《大理石人》题材有关的舞蹈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扎努西的影片《保护色》的状况也与舞蹈相似。）一方面是不满意的怪现象，另一方面是痛苦的感情。

对这两部电影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进行客观的观察，不能不提出问题：对这两部电影进行压制的政治意图是什么？要知道，影片中所包含的不能强行消除的价值只有时间才能检验。波兰的全部文化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党内负责监督文化事业发展的人们的义务，首先应是为民族文艺和文化的繁荣创造最优良的条件，同时密切注意，不让在银幕和舞台上散布种族仇视、宗教仇视、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凶残、人鄙视人

和民族鄙视等。然而，甚至最伟大的政治评论家们也没从这两部电影中发现任何上述列举的思想。

如果一个人有权做出政治的、行政的（财政的也一样）决定，严肃地对待民族文化的继承性这一概念，懂得需不断地用新的价值去丰富它，那么，就不应当凭个人的口味和好恶去干涉文化创作。只有有利于创造思想的多样性，只有不按机械工业的方式对待文化生活，即事先确定生产机械的型号和用途，那末，这样的政权才能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经济本身有造成冲突形势的很大可能。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的大量篇幅阐述。这里仅仅简单举出几个最高领导人实际做出的“指示”。

价格！我们可以向人们允诺说：我们完全控制住价格，不允许提高价格，以影响实际生活水平；同时却悄悄地逐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改变产品等级或质量来提高价格。

要求节约！我们号召工人们节约原料、设备等，因为每个格罗什都是重要的。而同时，一个草率的决定——十几个人、几千或几万人人都知道这种决定——就会浪费上百万兹罗提。

自发的义务劳动！工人们自己主动提出要求为纪念各种周年（逢五逢十）而多生产一定数量的钢、煤、水泥等，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自发的倡议是产生于三个部门：工厂经理部、工厂党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或者产生于更高层。

形成冲突的形势还有如下的种种因素：颁布使工作倒退的指令；天天制造这种种命令，它们使中央一级的官僚主义更为严重和人的主动创造精神受到限制；或者还发布这种种指示，它们使人们得出结论政府包揽一切，而其所有的人是不诚

实的。

大概这已经是清楚的事情了,关于干部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引起冲突的原因,我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这是实践的总结。这种实践是不好的,对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它降低党在社会中的政治威望和道义威信。

第四章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 各种不同观点

如果把波兰70年代那些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是重要的现象和事实，记录下来并加以分类的话，那处于首位的是那些与党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与党在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党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存在的，专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因为党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它们也确实常常对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国内政治气候、人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党的群众性问题。70年代下半期，党的领导执行了一条加速扩建党的队伍的方针。1978年底形成了“我们的300万成员的党”，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根据党章的规定他们应该是社会的先锋队，应该是社会经济生活每一领域里的进步先锋。现在每7个18—65岁的波兰人中就有一名是党员，而在30—50岁的人中间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党员。特别是1977年更大规模地开展扩大党员队伍的运动。中学毕业班的青年，也就是那些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青年受到最大的关切。很难说，到底有多少中学生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入党的，又有多少人是想使自己更容易进入大学才入党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大量吸收中学生入党这一行动

的组织者们并不隐瞒，他们这样做是想加强党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因此，如果党员中学生比非党员中学生更容易考入大学，那么入党是觉悟、道德与思想上的选择这一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入党是为了谋生和获得知识。如果这些青年都是5分获得者，那么事情还好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社会将会增加不少具有中等水平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们口袋里都装着党证。发展党的队伍所采用的官僚主义方法真是令人惊讶！

吸收这些青年人入党的方法也是独特的。从我们这一代加入波兰工人党那些年代之后，世界上的变化确实很大，但也不会有这么大，以致于加入共产党需要在聚光灯、电视摄影机下进行，一句话是在那经过安排的激动人心的气氛下进行的。我现在还记得，一次就接受了几百人入党的场面。谁需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真的想使我们党仍然是保持高的思想觉悟水平的组织，那就应该使入党仍然保持个别吸收的程序。这里根本不需要电视聚光灯。总算好，这种作风过了一个时间就被抛弃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党的生活戏剧化不应该掩盖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波兰统一工人党队伍的质量问题。

到底是100万、200万党员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还是400万或500万党员更有利？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有当党的最高当局把党员队伍的数量问题和申请入党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的质量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来研究的时候，党才可能有收获。要知道，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有许多实质性和重要的问题。例如，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的才能

不足不能升官而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采取什么样措施才能避免这些钻营家混入党内？300万成员的党是否可以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协会呢？有多少党员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先锋队成员？现在与两次危机即1956年危机和1970年危机时差不多，在激烈搏斗的战场上一般说党的积极分子的队伍是不大的。

看来，在进入80年代的时刻，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了。科学技术文明发展在生产组织及社会生活领域中提出的极其复杂的任务，首先要求存在一个由先人后己的人们组成的党、一个思想和行动都能经得住考验的党。问题是，我们的思想教育活动是否使我们更易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仅以主要由中央委员会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部印刷的许多小册子做例子，那回答必然是消极的。多数情况下，这些小册子都是中央全会或是其他会议上报告的汇总。既不能讲清许多实质性问题，也不能使人进行讨论和争论。在这些印刷品中所使用的语气都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命令和要求。

与党的群众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是党外人士的作用问题，对此我在伙伴关系的章节中已有说明。根据宪法，结合社会要求公正的感情，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多次强调过：“我们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事务和社会活动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事实，但问题是，这个正确的原则在一个敏感的领域里即干部政策中是如何执行的。在最近10年里，为党员保留职位的趋势明显地增加了。职位的内定名单越来越长。甚至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华沙某一居民区的一名退休女教师想为退休者开办一个

活动室，也被告知说这个单位的主任职务必须留给党员来担任。区委书记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不应该把这种事直接告诉这位女教师。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几乎每一个任命（例如任命副部长）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总是写道：“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应该考虑一下这种坚持把尽可能多的职务安排给口袋里装有统一工人党党证的人的政治目的性。问题要求我们认真地讨论一下并做出明确的决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过渡的时期中哪些国家职务可以由无党派人士担任，而哪些不能。整个社会特别是刚踏入生活的青年人应该了解这一点，以使他们不要过分失望。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执行一条开诚布公的政策。假如上述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就会对我们造成下列危险：1、我们的盟友（农民党和民主党）对统一工人党的政策的失望情绪就会增长，到一定时候他们中的反对派倾向就会公开显露出来；2、追求个人名利的分子就会更多地钻入党内。

党应该经常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党内民主上来。归根结底，一切问题、也就是党行使领导作用的能力问题都取决于党内民主。党行使领导作用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群众的创造力和蕴藏在群众中的热情，保持国内不出现紧张和冲突的政治局势，使波兰在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及世界上具有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党内的团结以及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的团结。在“党内民主”的范畴内有许多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试看一下某些问题。列在首位的是政治局一书记处一中央委员会这一三角的关系。很清楚，政治局只有在取得中央委员会信任时才能真正行使自己的职能。如果失去这种信

任，党就进入政治危机时期。1956年是如此，1970年也是如此。在这两次事件中，政治局就受到了领导作风不民主以及忽视中央委员会成员们意见的指责，特别是指责它作为执行机构，在一段时间以后实际上把中央委员会仅仅当成是政权的象征而已。当然，这种指责并不是涉及整个政治局，而只是它的一部分人。随着出现事件，就改组政治局。刚开始时，政治局得到中央委员会成员们的充分支持。这种支持能够保持多久取决于这经过改组的政治局不追求专权。而专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制止它是不容易的。因此，应该考虑一下怎样来防止政治局的同志不要重新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对党及其他有关方面都是不好的。我呼吁大家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迄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证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和谐地共同工作的体制。我们以如何向中央委员会通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这一件重要的事情为例。最近几年来，中央委员及党的积极分子了解政治局工作情况的主要来源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政治局会议每周公报及党中央书记处的通报。在这种通报里有关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消息都是极其审慎和一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根本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既不了解决议的动机，也不了解是否一致通过。一句话，中央委员只知道政治局讨论的题目，而不知道它的实质。任何个人、或单位、或集体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在党内建立起一个常设的、有章程的、相互督促的体制。首先，中央委员会应该得到政治局会议开会过程的内部消息，而不是报刊上公布的那种通报。这种消息不应在政治局会议举行后一个月才提供，而应在会议结束后

的一二天之内提供。中央委员应该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治局应该对此作出解释。政治局和书记处应该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自己的一个阶段的工作报告。它应该包括代表大会决议中确定的那些问题。这些事情应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所做出的干部任免决定的理由，有关社会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对同盟力量及天主教教会的政策等方面的决议。报告对这些问题应有一个详细说明。因为含糊其词是我们党活动中的一个通病，多年来深受其害，政治局工作报告不仅应包含整个政治局的工作，还应包括各个成员所负责监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领域。政治局的集体主义不应体现在中央全会时大家都在主席台上保持沉默。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即把政治局委员们都置于第一书记的背后，在实践工作中党不能观察到组成整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位同志。党应该了解，每个政治局委员代表什么，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等。当前的现实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非常贫乏。因此，也应考虑一下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每次中央全会上作主要报告的习惯的目的性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并不是什么都知道。譬如，为什么不能由主管农业事务的中央书记来作农业问题的报告呢？难道不把第一书记放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位置上就会降低他的威望。把第一书记在党内的威望估计得过于高贵，只能达到使他“碾成碎块”的结果。

根据迄今的经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我们这个政治制度中的作用问题。事实上，他是国家的实际首脑，而不是集体领导的主席。1945—1970年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因此这已不是某个个人特性的问题。当然个

人特性有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第一书记的班子。任何个人,甚至包括那些最英明的人都不能只靠一批助手来治理国家,而必须有一些伙伴来共同工作,理论上他们是政治局的委员们,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承担这种职责。他们对“第一书记”是笃信的,这也表明实际上集体领导党和国家是不可能的。慢慢地、然而确定不移地围绕着第一书记就形成了一个宫廷式的气氛。周围的人就开始猜测他的意愿,不久他们就会很了解,头头喜欢哪些消息,哪些是他不愿意听的,等等,对他的意愿公开提出质疑,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把第一书记的意见拿到政治局去表决就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甚至被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等等。第一书记的政策以及他的决定在政治局成为公开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在危机深刻时期。因此,如果不能把政权的中心即第一书记的班子纳入到集体监督和集体领导的体制中去,那就会不可避免地重现那些“过去时期”受到认真批评的种种现象。

为了实行集体领导,才设立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也有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集体领导(譬如由15个同志组成)的思想是对政权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的看法。一个代表这种意见的人在交谈中争辩说,如果整个政治局能严肃地遵守集体领导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承担集体的责任的话,那过一定时间从这个集体中就会出现二个,三个或四个实际的掌权者。就是说,从资历相等的优秀分子中必须产生出超优秀分子。不能不承认这种结论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我个人认为现在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出现这种毛病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领导集体变

成一个人数更少的集体，而事实是根本排除人们对他们活动提出经常批评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批评已成为他们每天必需的面包，如果随时可以撤销这些同志所担任的职务的话，那么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政权核心并不会对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造成任何威胁。但是，要达到这种要求，就必须对目前的执政方法进行根本的改革。

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也应该行使相互监督的职能。担任重要政治职务的中央委员也应该在中央全会上不时地总结自己的活动。政治局也应该集体地、不断地对每个中央委员的工作做出评价。这种做法至今在我们党内还没有过，因此，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有目的地丰富地开展我们党内的民主，并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党内民主。在这些活动中，中央委员会当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1年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全会的活动受到尖锐的批评。那时我们认为，中央全会已成为一种生产会议。在令人难忘的八中全会（1971年2月）上对这个问题已有过不少非常辛辣的和尖锐的语言。那时，党领导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该是一个坦率和真诚地讨论各级党组织感兴趣的所有事情和问题的论坛。但实践证明，光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中央全会又重新变为生产性会议，变成一个只按事先拟定的图式作报告的讲坛，首先是摆成就、赞扬党的领导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再讲一讲困难，以便在结尾时可以讲已完成了上届中央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实际上，中央全会的召开只是为了确认早已由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矛盾的。实际上，这里只有集中。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作

用，需要对这种政策进行实质性的修正。必须恢复中央全会的工作程序，即先是讨论，而后才是决议。还应该抛弃人为的、不真实的“一致同意”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想使党再出现周期性的冲突，那么中央全会就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讲坛，即每一个中央委员可以在这一讲台上毫不犹豫地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中央委员，而是几个甚至十几个中央委员对某一问题提出不同于政治局的看法。在一个政党里，这种情况应该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事情。分歧或意见不同应该通过投票加以解决，从这一刻开始，应该执行一条铁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

70年代是不断取得成就的时期，在中央全会的讲坛上对领导通过令人愤慨、与共产主义谦虚精神格格不入的赞歌进行吹捧。这一时期中央全会的组织工作也达到了顶点，发言人的名单一般都早已安排好，发言人也是根据既定的方针特意挑选的，多数发言稿都是在他们发表之前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里宣读过的。这种方法当然也被沿用于代表大会及全国会议。

虽然经过检查，但如果某一中央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并侵犯了相互崇拜的原则，那就上升到英雄的角色，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正面的，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反面的。假如在他的发言中出现对领导的某些批评意见，当然很少是直接的（要知道我们都是说“请”的大师），那主席团就会感到非常惊奇。然而，在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事情。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不是这样！奇怪的是：这种发言一般不会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反驳，他们仅表示沉默，为什么？难道他们没

有自己的意见？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党内民主的最重要观点，也就是说，应该给每个党员和党的各级积极分子创造这种条件以使他们能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各级党委全会上毫不犹豫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讲到会议，应该看到某同志站在讲台上讲的和他在会场外讲的一般都有很大的差别，这可能被我们积极分子指责为表里不一。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政党必须向每个党员提供条件，以鼓励党员能直接地把他心中所想的讲出来，首先是领导要承担创造这种条件的责任。假如没有这种条件，就不能要求同志们学习“莱伊塔”^①所做过的事。在我们党内，莱伊塔主义是不可能受到欢迎的。

政治局委员们的上述沉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党内生活的特点之一就是党员的个性被一些主要活动家精心地抹去了。例如，对于公众来说，政治局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如果在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仅仅是外表的不同而已。

中央全会的种种材料要单独地加以说明。公布在报刊上的讨论时的发言不仅被删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经过特意整理的。读者必然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全会的参加者是由一些思想绝对一致的人组成的。而历次全会讨论的结论也是这一类型的一致性，它充斥于专门出版的有关全会的材料之中。党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全会召开的

^① 塔坦乌什·莱伊塔是18世纪波兰贵族共和国议会的议员。1773年他坚决反对议会确认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共同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为此曾躺在议会大厦门口以阻止议员们进入议会大厅，以后自尽。——译者

真实情况，他们只得到由中央委员会相应的部门准备好的复制品。

这方面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央十二中全会的材料汇集。在这一集子的“讨论”这一章中甚至于都不加以注明：它收集的是报载的讲话摘要。确实，这同党内民主又有何共同之处！很难理解。问题是它给党带来什么好处呢？值得回顾一下的是40年代时，当我比现在弱得多的时候，这种情况要比现在少得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推到现在——人民波兰成立40周年时这种地位的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极为迫切、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我们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要求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对我们国家和党的命运负有极大的责任感，而这首先需要领导集团与积极分子之间的真正团结一致。上述的事实——每个中央委员都是很清楚的——肯定不能够使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80年2月召开），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批评性的分析，并使我们摆脱这一切。

最后一点肯定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延续的时间越长，纠正起来就越困难，每一个修正意见都会立即被解释为是离开了现行的路线或是被解释为是领导机构中斗争的反映，等等。

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最大弱点之一是对国家当前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课题不感兴趣。中央委员会不研究这些问题，如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70年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模式，宣传方案，党中央各部的活动以及社会、

政府的活动等等。同我交换意见的一个人听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讲话后，说：“不错，中央委员会没有管这些问题，首先应该由政治局管这些事情。”

根据党的被选举机构的职能及改选的条件方面的多年经验，下届党代表大会应该对任职期限的长短作出决定，规定一个任职期限是必需的。应该接受这样的原则，即政治局和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不能超过两任。这个原则也应该适用于省委和企业、乡、市委会的执行机构。所有执行机构的成员都不能实行终身制。唯一可以例外的是党中央第一书记，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延长他的任期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为了使这个原则不致于剥夺那些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明智的和组织能力很强的活动家及有才能的同志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应该规定执行机构的委员在过了4年之后仍有权再次进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省委执委会等领导机构中去。

党组织及企业、乡和省委会的独立自主界限问题也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最近几年，以省委书记的选举为例，选举已完全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他们是由政治局“推荐”的（特别是政治局做这一决定时没有与中央委员会进行协商过），实际上这与任命并没有什么两样。还没有遇到过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这种被推荐的同志。通常，在党的各级组织机构中都存在这种“推荐”。应该把党的机构对党内生活发展的越来越大的干预视作最消极的现象。区委会的指导员批准党的基层组织执委会的总结—选举报告，当然他对“选举”党的基层组织第一书记也拥有决定权。总的可以说，70年代党的基层组

织和各级党委的独立自主权是非常有限的。对党的发展负有责任的同志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首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列宁主义的集中这一方面。

党内通报的性质和内容也是与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在党的生活中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象其他国家一样，在我们国家中某些事情是需要保密的。不怀疑这个原则并不等于目前的情况是正常的。在十二月事件之后，曾多次说过应该改善这一方面的状况，也就是说对于中央的积极分子要通报更多的党内信息。诚然，1971年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部门向中央的积极分子提供了许多党内工作的重要消息。中央积极分子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真实消息，如社会和工矿企业中的状况及罢工提出的社会要求、反对派的活动，等等。由于了解了这些情况，不管是工作在意识形态第一线的活动分子，还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商业部长都能根据整个国家的状况，而不只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部门的状况来完成他的工作。

到1972年这种党内消息就开始越来越少了，而到下一年就完全消失了。现在，中央的积极分子仅得到中央书记处的通报，它包括各种不同的文章、记录、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国外访问的报告，等等。这些材料无疑是有用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了解目前国内形势的消息来源。如果某个党的活动家或国家高级官员不仅对他工作的情况、当然是真实的情况感兴趣，还想了解当前的政教关系，国家的负债情况以及工人阶级的情绪等，那实际上他必须自己设法去得到这些消息，必须从他的朋友、同事那儿得到，或注意阅读那些非常关心这些情况的书籍、报刊。因为，一般我们党和国家的活动家都很忙，

甚至包括那些兴趣广泛的人，过一段时间也做不到这一点，不得不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事务及烦恼堆中去。多年的观察，发现不少中央活动家的同志被关在自己的庭院里。许多同志对自己工作范围之外的情况的无知程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许多同志对党的整个政策的责任感会有什么增长。

对党中央委员、政府成员，总之对几百名在党和国家中担任要职的人进行明显的消息限制不是一个偶然的步骤。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它的依据是：对那些在报刊上没有公布的消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拥有绝对的优势。当时在同一位政治局委员杨·什德拉克进行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了无线电截听问题，他提出对以前我们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进行讨论，说：“你自己不久前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那些拥有充分情报来源的人，才是真正的执政者。”那些主张把党中央委员、党和国家中央一级的积极分子排斥于获悉党内情况的大门之外的人，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利用无线电截听的材料编汇的消息参考是各种谣言的温床，这种论点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对无线电截听采取措施以后，谣言根本没有减少。要知道，如果政治生活的重要领域死气沉沉，如果不同那些我们认为错误的、假的、甚至是敌对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而只是处处主观地用想当然的真理、或是我们称之为老生常谈的东西来取代消息，那末谣言才是令人可怕的。

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听到：中央活动家的身上、也包括中央机构是产生谣言的主要发源地，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

在“闹内部纠纷”以及其他种种丑事上。这样的指责是根据不足的，这种情况，直至上述的党内通报的方针未发生变化之前都将是如此的。应该摆脱目前的这种做法，因为它与目前的需要是非常矛盾的。经验证明，以很少一部分人的心腹和那些对领导保持无限信任的一些人为基础的管理方式，早已过时了。采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对集体的责任感大大下降了、党的积极分子同党的领导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很久以来就执行着的党内消息严格分级保密的做法，在1976年价格事件的前几天达到了顶峰。在公开宣布提价方案前三天，在中央委员会大厅召开了由百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参加的会议，会后他们将要出席各省委执委会和某些大工矿企业的代表会议，目的是向积极分子说明改变食品物价结构的必要性。但是在大厅里开会的人们并没有被告知提高价格的细节！这些细节是少数人的一种“甜蜜的秘密”。与会者只得到一份预先准备好的、由他在省委执委会和大工矿企业领导成员会议上宣读的报告。这份别出心裁的文件理应得到重视，因为它是当时执行的通报党内消息的方式方法的极妙写照，从中反映出70年代中期公民的权利。我们当时还曾经说过：“为了使那些坏人不能利用价格的变动掀起一个抢购商品的投机倒把浪潮和制造混乱，请同志们对今天的会议内容绝对保密。”

当时，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即屋顶上的麻雀已经开始对计划中的提价发出吱吱叫声、而新的价目表已经印制出来的时刻，向与会者宣布上述文件。甚至还不止于此，最有意思的是“绝对保密”的关照，要是把这一点公诸于众就会使人们对

这种管理方式大为吃惊。了解波兰现实的人知道，这是一种陈腐的管理方式，早就注定要失败的。文件宣扬了自己的成就，只向积极分子介绍了提价的几种可能的方案。文件还包括这样的内容：“主要问题是希望大家就价格政策变动的范围出主意”……种种反映有：一种意见是“根据经济原则要变动所有食品的价格”；另一种意见是“根据我们价格体制的弱点及不合理性应对所有的价格做总的变动，并对整个价格体制作一次性的调整”；还有一种意见是“把涨价只限于那些亏损最大的商品，如肉类及其制品……”接着，文件还说：“向同志们公开介绍的这一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生活水平，但问题又必须解决，因此我们想请你们就提价商品的范围，涨价的幅度提出负责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评论，既要考虑到社会的看法，也要考虑到补贴问题。根据至今工作结果并考虑到你们的意见，政府将很快做出最后的结论。”然而问题是，就在征求大家意见的这一天，整个事情早已做出了决定。涨价的方案包括其所有的细节都已由政府制定出来并已得到政治局的确认。总之，事情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如果三天之后要向准备召开的议会会议介绍涨价的方案的话，那事情很清楚，仅仅是这一原因，这一方案也要早一些准备好。也应说明，议员只能在议会开会过程中才能了解到涨价的意图。何况，给议员的文件全都是编了号码的，每个议员都必须在专门的单子上签名，才能得到文件。

我用这样大的篇幅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目前所执行的这种党内信息的做法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下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党实施其领导作用的形式。除了我已论述过的关于执政当局在我们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以外，还值得就这个非常复杂、且常常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种种看法。

70年代在政权范围内有两种发展倾向在相互矛盾着。一种是由执行机构所代表的倾向，它力图加强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的影响。在这种倾向下，如果执行机构首脑的种种个人特征要发挥某些作用的话，那末有关的客观因素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它就是要求具有精明能干、有效率、能够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的执行机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执行机构往往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而没有同政治权力的中央机构进行协商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被怀疑有专权的欲望，执行机构的代表都很愿意向政治中心提出希望听取他们对执行机构意图的看法，而更重要的则是“赞同”，这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做法加了一层保险。另一种倾向是，各级党委及其机构传统地习惯于过多地干预国家的日常行政和经济活动。70年代党的机构越来越认为，执行机构在领导国家事务上的独立性逐年增强，因此有必要经常提醒一下老的传统。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并不大，只能引起各级党委、而特别是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这当然也包括省委一级机构。

各级党委及其机构干预过细在政治上是有其不利的一面的，即各级党委首先要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事、组织决定，地方的行政管理及经济组织管理的方法承担责任。按理它应该是社会更高利益的代表者，而不应是每一个具体决定的共同

制定者。这种共同进行行政管理的意愿使行政机构产生错觉：党的活动家热衷于权、热衷于日常的领导事务和经济管理的具体任务。同时使党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基本作用。这些基本作用就是制定计划，确定社会目标，关心行政机构行动的纯洁性，使各个部门的活动、需要及利益与整个社会的目标相协调，把政治思想影响深入到生活中去。

因此，80年代坚定地把各级党委的工作方向转到自己的首要任务上去是非常必需的，这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及其主导地位 and 责任感。这就要求摆脱对行政机构的细小事务的管理，而对行政机构为实现党制定的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总的领导和检查。党的机构的作用首先应该为各级党委编写分析材料和准备纲领草案，而不应当去从事干预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决定。现在，在不少情况下，党中央的督察员不仅干预并决定他们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任务，而且占据比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委更直接地处理事务的地位。这样，一个党中央的辅助性机构就变成了一个职能性的机构，实际上则处于各党委之上了。

在我们这个体制中，要接受党机构作用的上述方案就要对干部政策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革。最近几年，党的机构已大大年轻化了，涌现出一大批硕士、工程师、博士、甚至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党的机构作为他们开始从事国家行政、外交及其他生涯的中间站，或作为整个航道中的一站。如果说党的机构应该从事检查和分析研究的职能，那末就应该由那些在经济、行政管理及外交职业中已有丰富经验的同志来充实党的机构。

本文作者当然了解，方针的变动是最难达到目的的，因为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已存在了几十年的政权观念。众所周知，党的机构过去总是，现在仍是政权的**核心**，那些党的“职业革命家”所具有的列宁主义思想成为党的机构“不可侵犯的神圣东西”。首先要使党的机构深信，为了党的利益它应该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变革，以符合它在党和人民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拒绝这种迫切需要的——自觉完成的——变革，就会或迟或早地使党群关系更加紧张、更加危险。

在考虑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而创造条件的时刻，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不能忘记一个十二分重要的问题，即青年工作。众所周知，青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事业——它是我们在1944—1945年开创的——的接班人做好思想和政治的准备。党和青年，是一项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和各个范畴的课题。然而我只提及几点，可以认为，在当前对本10年进行总结、同时又为80年代准备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案的时刻，我所提及的几点是应该牢记的一些重要的意见。

关于年轻的波兰人的特点，我已在“教育成果”一章中论述过了，没有理由再去重复它。但是，为了使下面所提的评价和建议不至于给大家一个脱离现实的印象，我想提醒一下，年轻的波兰人——最后两个年级的中学生、职业学校毕业的工人、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最大特点是：对现实采取批判主义的态度，而且还能大胆地公开提出批评意见。当然，这不是指整个年轻人队伍。一部分青年人采取不问政治的态度，还有的人则采取无耻的极端享乐主义的态度，等等。然而我

们关切的首先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青年人。既然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那就应该来回答:现在所实行的青年教育政策和现在存在的青年组织机构在何种程度上为消除上述的遭到批评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事实是这样的,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比青年组织机构更为差的了。从1943年建立“青年战斗联盟”开始,人民波兰的青年运动史是一部组织上创建、解散、联合和分裂的历史。总起来说,波兰青年组织曾有23个名称,这对只有35年历史的人民波兰来说是太多了。最后一次的大变化是在1976年,那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农村青年联盟合并为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这两个青年组织曾经各自存在19年,无疑这是它们的巨大成就。在中央集权倾向占上风时它们就合并为一个组织。主张合并为一个青年组织的人借口这样可以把两个组织的力量联合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能不同意他们这一意见!关注青年运动的观察家不能指责这种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青年活动家和《青年旗帜报》都公开阐明了这种愿望。然而对两个组织合并的目的性未曾经过严肃的讨论,只是随随便便地交换了一下同意或不同意合并的观点。

问题是,我们从两个组织的联合中到底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两个组织之间真诚的竞赛肯定被取消了。这不是值得赞扬的理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应该从各方面努力保持这种相互竞赛的结构。同时,还要加以说明的是,两个按照思想原则各自开展自己活动的青年组织的存在,可以丰富波兰的特征,我们应该保持并加强这种特征。波兰大学生联合会——在这一支队伍中产生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活动家——

也被改组了。很难一下子找到回答，为什么这样一个组织（其思想—政治行动纲领也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活动的可能性的组织）要被改组。改组的结果是，部分波兰大学生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积极活动的意愿，而那些被大学生认为不能保持波兰大学生联合会传统的人，却被“引进”了改组后的学生组织的领导机构。把波兰大学生联合会改组为波兰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推动了天主教会主教团要求成立天主教青年组织的想法。主教团认为，波兰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宣言关闭了天主教大学生加入组织的道路。正是在波兰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建立后，到处成立了反对派组织——大学生团结委员会，也就不是偶然的現象了。

我们通过对青年运动改组结果的评价得出结论，近几年内，青年组织对其成员以至全体青年的思想的影响是不会扩大的。不管是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或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波兰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家的宣言如何夸口，青年组织的政治思想生活的脉搏是很微弱的。简单地说，我们没有感到这些组织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起到什么作用。然而，他们应该是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的先锋队，无疑，提出批评意见是青年的优先权利。青年活动家向我们保证他们是党的战斗助手。也可能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乐于听到这种保证。然而事实是，这种战斗性的保证又似乎不愿或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更何况是，它们的组织生活是令人厌烦的，也往往是无效率的。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给公众的印象是一些希腊的元老，在发育时按照各自生活经历斟字

酌句。一句话，我们的接班人不是一些毫不妥协的战斗员。

为什么在青年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而不能是另一种情况呢？党比任何人都更加能够回答好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那么最持批评态度和最富有独立思考的那部分青年将会非常不满，从而对政治丧失兴趣或者去寻找其他的对他们关心的人，或去充当其他人的助手。也有可能陷入对他们本身和国家都很危险的极端主义，从而也可能导致他们去否定过去和最新的历史经验。

我认为，首先应该考虑一下青年组织在社会主义波兰的作用和地位。还必须抛弃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即安排青年们及其组织来颂扬我们的活动。如果我们能以谅解的心情来听取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进一步允许他们对一些我们认为不能动摇的原则提出异议，并与他们进行争论，甚至对他们感到生气或对他们不妥协的批评有时感到无法对付，而这时候我们又确认这是青年人的权利，那么这将是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我们往往拒绝青年组织的这种权利，我们想把它们看成是党的幼儿园，这种模式的青年组织已经过时了。应该寻找一种可以保证他们对老一代拥有充分自治权的模式。也应该放弃试图用 50 年代的教育方式来活跃青年组织的想法。波兰青年联盟和“为波兰服务”时期的方法、气氛都已经不能重现了。应该把积极丰富青年组织的内部民主作为计划中的首要任务。党应该鼓励青年在选举体制上及政治活动中实施日常的民主化。

这一切就是我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跨入 80 年代时提出的一些意见。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勿庸

置疑的，即目前波兰社会主义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形势之下。1971—1980年期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巨大的比例失调和矛盾，这些情况使百万劳动人民感到越来越大的苦恼。然而，最令人不安的现象还不是比例失调和矛盾，而是人们对国家的责任感越来越淡薄。波兰流传的一句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已成为人们唯一行之有效的原则。

波兰的社会主义需要明智的、深思熟虑的和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的改革。我不主张突然的、急剧的变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要求这种改革应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主张有控制地渐进地发展，发展的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并加以验证。当然，也可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也就是至今我们走过来的这条道路。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看到党的领导作用将会进一步遭到削弱，危机的局势将可能形成，结果是到一定时候社会的不满就会危险地爆发出来。

使我们的政治制度适应于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是当今时代的命令。我们必须竭力来完善这种方针政策，即它能够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创造力，以及汇集蕴藏于人民之中的知识和能力。

结 束 语

我向读者们介绍我所思考的这些结论，不是没有阻力的，这些结论我在70年代下半期已经提出过。目前的现实正是这些结论的根源。1980年8月之后对以往10年中的许多问题的评价，都是以我那时候提到过的批评意见为背景的。

我决定公开发表这一著作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使人们了解，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批评意见早在1980年8月之前已经有了；第二，因为我与某些方案的制定是相联系着的，例如伙伴关系的方案；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中央集权的界限；等等。